

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月刊 · 一九八四年二月號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簡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宣告成立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文件：章程、宣言等

· 10 ·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A SPRING DEMOCRACY MOVEMENT

NEW YORK 1983 12 27-30

美國 紐約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A SPRING DEMOCRACY MOVEMENT

NEW YORK 1983 12 27-30

美國 紐約



1



2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圖片集



3

1. 汪岷代表大會籌委會致開幕詞

2. 王炳章代表大會籌委會作工作報告

3. 波蘭赴美藝術家協會主席 Victor Sawicki

4. 全美支援波蘭團結工會主席 Ralph Schoenman

5. 大會會址

6. 小組討論

封面：大會第一會場



5



6

一九八四年的第一步

社論

一九八四年來臨了。

我們以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召開及「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的成立迎來了這新的一年。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七日至卅日，來自澳洲、港、澳、日本、歐洲及北美洲的五十餘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代表和特邀代表，歡聚於紐約。大家總結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來的經驗和教訓，制訂了新的戰略和策略，成立了自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第一個以大陸為背景和基礎的持不同政見的民主團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並選出了她的領導機構。

自運動開展後，我們被問及最多的問題之一是：民主是人人嚮往的，目標正確無疑，但你們怎麼能在強大的共產黨專制面前達成這個目標呢？你們將循什麼途徑呢？

我們的回答是，我們崇尚合法手段，崇尚法律層次的奮鬥。我們可以把策略毫不隱晦地告訴共產黨人、國民黨人及海內外同胞，那就是：

第一步：成立持不同政見的民主壓力團體。國內暫時不允許，就先在海外做起。這一步我們已經踏出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已告成立。「中國民聯」有她明確的政經綱領和奮鬥目標，將把認同者團結起來，形成力量。

第二步：「中國民聯」及民運人士將要求與國、共兩黨對話及和談。在適當時候，「中國民聯」將派出代表團與大陸共產黨政府及台灣國民黨政府正式公開接觸，彼此溝通觀念和認識。

第三步：「中國民聯」將派出考察團赴大陸及台灣，考察兩地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民情，提出意見，促進雙方改革；同時，考察也可豐富我們的理想藍圖。

第四步：「中國民聯」將正式要求在中國大陸及台灣註冊，成為合法社團。要求其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在大陸及台灣合法註冊、出版和發行。在這種法律層次的運作中，「中國民聯」有着得天獨厚之處：我們的主要負責人多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大陸公民，我們的成員中也有很多是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公民。

第五步：「中國民聯」在大陸、台灣正式取得合法地位，成為壓力團體，監督執政黨，並廣泛參與政治生活。這五步一步比一步艱難，可能順序進行，也可能交叉進行。

在趙紫陽總理一九八四年元月七日至十六日訪問美國時，我們把握時機，開始了上述法律層次的運作。我們散發了給趙紫陽總理的公開信。除了對他訪美表示歡迎外，並堂堂正正地提出了四項要求：（一）要求「中國民聯」在國內註冊為合法社團；（二）要求「中國之春」雜誌在國內出版、發行；（三）要求釋放在獄中的民運人士及不同政見者；（四）要求與中國政府對話。在一些場合，我們把給趙紫陽總理的公開信、「中國民聯」的簡介及「中國之春」雜誌大大方方地送到了中國代表團成員的手中。

雖然趙紫陽總理對我們的公開信沒有正面回答，但他在元月十三日在舊金山與各界僑胞談祖國統一問題時的表態，對於民運人士循合法途徑向大陸推展民主，却是十分有利的。他說：「我們歡迎你們（指僑胞）多回大陸去看看，同我們交換意見。就是和我們看法很不相同的，我們也一樣歡迎。祖國的大門對所有的炎黃子孫都是永遠敞開的。」既然如此，祖國的大門對「中國民聯」也應該是敞開的。

一九八四年來臨了。我們要用行動扭轉人們對奧威爾描述的一九八四年的印象。我們已經邁出了一九八四年的第一步，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們共同邁出第二步、第三步……。

中國之春

一九八四年二月號

第十期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

目錄

大會文件

選登

社論	3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章程	6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新聞公告（第一號）	8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新聞公告（第二號）	9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新聞公告（第三號）	9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開幕詞	汪岷 10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工作報告	王炳章 11
對中國目前形勢的一些看法	本刊編輯部 29
致趙紫陽總理的公開信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45
致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公開信（之一）	林希翎 46
致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公開信（之二）	經鐵木兒 48

文藝園地

老Q新傳（續）	柏仁 49
---------------	-------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New York,

N. Y. 10185. Tel: (212) 728-7008

回國探親記 (續)	江心 56
再致鄧小平 (續)	方丹 62
旅美雜感 (續)	王魯生 69
我夢見海上有一艘大船 (詩)	寄客 71
一個中國的奇蹟 (詩)	(法國) 張弄潮 72
大陸漫畫選	英韜等

封面：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第一會場 (攝影)	武煒 1
封底：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第二會場 (攝影)	武煒 76
封二：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圖片集 (攝影)	武煒 2
封三：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圖片集 (攝影)	武煒 75

英文版面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日程表	73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致趙紫陽總理公開信	74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章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

第一章 總 綱

- 第一條：本組織定名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其機關刊物為「中國之春」雜誌。
- 第二條：本聯盟以獨立自主為準則，聯合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國、共兩黨和其他政黨在內的民主力量），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
- 第三條：本聯盟現階段之主要政治和經濟主張為：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保障私有產權，提倡多元經濟。
- 第四條：本聯盟現階段之工作重點是推展中國大陸民主運動。近期奮鬥目標為：取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釋放一切被捕的持不同政見者；爭取持不同政見的民辦報刊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提倡自由競選各級人民代表。
- 第五條：本聯盟為和平民主統一中國而努力，中國的統一須有國、共兩黨以外的政治力量及人民層面的廣泛參與，不容任何政黨包辦。

第二章 盟 員

- 第六條：凡認同本聯盟之章程者，由至少一名盟員介紹，填寫申請書，獲基層組織或總部批准，交納盟費領取盟員證，即成為本盟盟員。
- 第七條：盟員有遵守本盟章程、保守本盟機密、執行本盟決議、宣傳本盟宗旨的責任，以及交納盟費介紹申請者入盟等義務。
- 第八條：盟員加入本組織三個月後有選舉權，半年後有被選舉權。盟員有參加所在組織的一切活動及提議、表決、質詢、上訴等權利。
- 第九條：盟員如違背章程，依情節輕重，本盟將採取說服、暫停活動、勸退和開除等項措施。凡被勸退及開除者，由基層組織上報，總部批准並書面通知本人。

第十條：凡要求退盟者，須向總部或基層組織書面提出，備案即可。凡一年不繳納盟費，按自動退出論。

第十一條：本盟有責任照顧因參與本盟工作而發生事故的盟員及其直系親屬。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二條：本盟組織原則為少數服從多數，決議一經做出，大家共同遵守。要尊重少數人的意見，允許反對意見存在。

第十三條：本盟設總部、分部、支部和小組四級結構，上級協調下級。分部及支部之設立，須經總部批准。未設立分部之地區，支部或小組直接受總部協調。各級機構，須報總部備案，特殊情況下，某些盟員可與任何一級協調機構負責組織工作的同志直接聯繫。

第十四條：本聯盟最高協調機構為總部委員會，由主席、副主席（1—2名）和委員若干人組成。總部委員任期暫定二年，連選連任，但主席一職，連任不得超過兩屆。在總部委員會閉會期間，由總部常務委員會行使總部委員會之職責。總部常務委員會由總部委員民主選舉產生，分工負責。總部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亦為常務委員會之正、副主席。主席、副主席由聯盟代表大會選舉產生。

第十五條：分部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分部委員任期一年，連選連任。

第十六條：支部委員會，由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一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支部委員任期一年，連選連任。

第十七條：小組設小組長一人，任期一年，連選連任。

第十八條：各級委員會由同級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聯盟代表大會（即世界代表大會）為本聯盟之最高權力機構，兩年舉行一次，分部及支部代表會議一年舉行一次。聯盟代表大會之代表由各地推舉及總部推荐相結合產生，各級代表大會在特殊情況下可提前或延期召開。

第十九條：本盟設監察委員會，以監督制衡總部委員會之工作，由聯盟代表大會（即世界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任期二年。

第二十條：各級委員會之委員，如不稱職，由同級代表大會罷免，三分之二以上票數生

效。

第二十一條：各級委員會之會議做出決議時，至少要有三分之二委員參加生效，決議必須獲得全體委員之半數通過生效。同意和否定票數同等時，主席或主任委員有最後裁決權。

第二十二條：若分部委員會或支部委員會認為總部委員會決議不妥，可召開本地區盟員大會討論。若本地區盟員超過實有人數三分之二否定總部委員會之決議，分部或支部委員會有權抵制總部委員會之決議。

第二十三條：本盟總章程之修改權歸聯盟代表大會，解釋權歸總部委員會。

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

第一號 公告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決定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在美國紐約召開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

本屆大會代表是來自歐洲、澳洲、美洲、日本和港澳地區全世界二十多個聯絡站推選出來的代表和特邀代表。

一部份外賓和來賓將出席大會。

本屆大會將發表大會宣言、成立民主運動的正式組織、通過章程、進行選舉、並討論一些關於「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重要決定。

本屆大會將有若干文件向公眾公佈。

本屆大會期間將有規定時間向中外新聞界開放採訪。採訪者請預先聯絡。

聯絡電話（212）728—7008

「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 第二號 公告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在美國紐約正式召開，出席代表共五十三人，來自台海兩岸、香港、日本、歐洲、美洲、澳洲等世界各地。會議在熱烈和民主的氣氛中進行。

大會由汪岷同志致開幕詞，宣佈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適時召開，呼籲大會代表以民主的方式，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進行總結和探討。

王炳章同志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執行小組向大會提出工作報告，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來的工作作了全面的總結與檢討，並對今後的工作提出意見。

大會還聽取了汪岷同志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執行小組提出的「關於祖國當前形勢的一些報告」。

全體代表討論了以上兩個報告，並對今後的工作任務及如何推動民主運動，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

大會代表對「總章程」熱烈地進行了討論，在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之下，逐條通過。

「總章程」規定本組名稱為「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本聯盟以獨立自主為準則，團結一切民主力量，努力實行「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宗旨。

本聯盟主張：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提倡多元經濟，促成民富國強。

本聯盟致力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反對任何政黨包辦。

大會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了「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領導機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以及正、副主席。

在大會發言的還有美國支持波蘭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 RALPH SCHOENMAN，波蘭民主運動活動家、波蘭旅美藝術家協會主席 VICTOR SAWICKI，中華人權協會主席闕君飛，「國際反極權聯盟」代表 OLGA SVINTSOVA，東亞人權協會主席 JAMES SEYMOUR 等。林希翎及未出席代表作了書面發言。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上八時四十分，閉幕式由新任主席王炳章主持。他指出，大會在民主的氣氛下圓滿完成，新組織的成立標誌着中國民主運動已進入新的階段。王炳章同志希望所有代表把熱情和民主精神帶到各地，推動今後的工作，為完成中國的民主化而努力。

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 第三號 公告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宣告「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成立，並選舉產生了新組織的領導成員。

選舉結果公布如下：

主席：王炳章

副主席：汪岷

聯盟常務委員：（按姓氏筆劃）

王炳章（大陸留學生）

汪岷（大陸留學生）

吳儉祥（大陸留學生）

林樵清（香港留學生）

姚月謙（大陸新移民，日本）

南明（大陸留學生）

馮斌（大陸新移民）

葉小健（大陸留學生）

劉萬禎（大陸留學生）

聯盟委員：（按姓氏筆劃）

少軍、王炳章、尹重光、希民、沙林、汪岷、李國鵬、吳煥章、吳儉祥、林木森、林樵清、馬汀、金陵、怡文、武偉、南明、姚月謙、郭曉佐、陳光、高春泥、黃仕中、楊云、楊士心、梁偉實、馮斌、張翔、葉小健、劉梓森、劉萬禎、劉曉萍、蘭劍（港澳委員四名待定）。

聯盟監察委員：

汪洋、李然、李一譔（日本和香港委員各一名待定）。

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 開幕詞

汪 岷

各位代表、各位來賓：

首先請讓我代表中國之春第一屆世界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執行小組，向各位代表和來賓致以最熱烈的歡迎。（鼓掌）

幾年前，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行列裏，我們早就想望着這一天，能夠和四面八方的朋友共聚一堂，討論國家大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可是我們不能夠。一年前，在紐約開始延續受迫害的民主運動的命運之後，我們又走過了曲折艱辛的路程，在這一年裏，我們還是無時無刻在想望着這一天，每當遇到困難的時候，每當受到挫折，糊塗起來的時候，每當感到個人的孤獨，需要集體的溫暖，我們是多麼想望呵——多一個，多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來談談吧。今天，這個日子終於來到了，讓我們每一個與會者，都為自己能參與這個歷史盛會而鼓掌吧。（鼓掌）

有兩件事，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第一件，今天參加大會的五十三個代表，有來自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有來自港澳的中國人，有來自歐洲、美洲、日本、澳洲的中國人，我們之中有六十多歲的，也有剛好滿廿歲的。這麼多不同背景、不同年齡的中國人走到一起，討論中國的政治，要成立一個多元化的民主團體，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第二件，目前號稱四千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們在一隻小船上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他們的代表才只十二個，今天看一看我們的會場，是他們的幾倍。我們可以自豪地告訴他們，時代不同了。

各位朋友，人生幾十年，能夠參與有意義的事情的機會，並不是很多。光是這一點，就足以令我們在座的每一位感到興奮。

各位代表，我們從運動一開始就意識到，民主運動要辦的，並不單是一個同仁雜誌，更重要的，是想推動一場變革。我們今天從五湖四海來到紐約，是想坐下來談一談，然後組織起來。

各位代表，我們不像共產黨，每次召開代表大會都吹噓說「這是一次團結勝利的大會」；我們不是來評功擺好，我們不習慣於歌功頌德，我們是準備來聽批評的——批評我們幼稚、批評我們無知，我們到這裏是來爭鳴、爭辯、搞民主的，我們不像現在台灣海峽兩岸執政黨開會一樣，只有舉手通過的權利。這裏的一切，全只有建議，都未有決議，一切都等待着各位代表來做，等待大家來決定，這就是我們這個團體的特色，也是這一代中國民主運動不同以往五千年任何一次革命的地方。

有些人說，民主人士辦不成事，就是因為他們太民主。各位代表，也許我們開完這個會後能告訴他們，民主人士也辦得成事，因為我們崇尚理性，崇尚協調，我們尊重少數，服從多數。我們相信多元化並不是一盤散沙，每一次的均衡都會比上一次推進。

就上述所說，我預祝大會的成功。

最後，請允許我，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宣佈：中國之春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三十分正式開幕。（熱烈鼓掌）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

——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王炳章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各位代表：

我代表中國之春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委會執行小組，向大會做中國之春一年總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

在中國，爭取民主向來是一項極為艱鉅的事業。

在國內，北京之春民主運動遭到壓制後，1982年11月17日，由一批留學北美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國內民運人士發起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樹起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旗幟，是「北京之春」的自然延伸和發展，也是中國人民近代爭取民主的事業的繼續。運動開始時，有人曾預言：“他們成不了氣候，頂多三個月就完了。”但是，今天的大會宣告了這個預言的破產。中國之春堅持了下來，而且逐步有所發展。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得以克服重重困難而召開，顯示了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強大生命力，也以實際行動表明了我們決心把民主運動向前推展的堅定信念。

一年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有不少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值得總結。下面，談一下一年來運動的收穫、出現的問題、遇到的困難及應該汲取的教訓。最後，在總結正反兩面經驗的基礎上，就今後的工作任務提出建議。

一、 理論宣傳工作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通過下述途徑進行民運理論的探討和民運信息的傳播。

(一)首先是創辦「中國之春」雜誌。「中國之春」雜誌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喉舌，創刊時是不定期刊物，從第四期起轉為月刊，現已出九期。有一點值得驕傲的是，「中國之春」雜誌始終是由一群沒有辦過專業雜誌經驗的留學生主持的，後來，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創辦了「民心」，配合了「中國之春」雜誌的宣傳工作。

(二)借助中外新聞傳播媒介。在運動開展初期，中國之春籌備者和支持者有步驟的計劃，充分發揮了中外新聞傳播媒介的作用，在造成聲勢、擴大影響方面，做得是相當成功的。自運動發起，中國之春共舉行了十次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並多次會見中外記者。除中國大陸外，世界上幾乎所有地區的華人報刊對中國之春都進行了報導和評論。值得指出的是，外文傳播媒介曾給予中國之春比較廣泛的報導。美國的「時代周刊」、「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巴爾鐵摩太陽報」、「匹茲堡消息報」(Pittsburgh Gazette)、「華盛頓時報」，加拿大「環球報」、「蒙特利爾消息報」(Montreal Gazette)，日本的「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產經新聞」、「世界報」、「自由」雜誌以及法國「解放日報」等，對中國之春都有過不同程度的報導，引起了國際間的注意。

(三)舉辦講演會及座談會：中國之春先後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斯坦福大學、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休斯敦大學、南邁阿密大學(South Miami University)、德州農工大學、馬利蘭大學法學院、喬治華盛頓大學、伊里諾理工學院、匹茲堡大學、康乃爾大學、布朗大學、哈佛大學法學院及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等進行了講演或參加了有關座談會。通過一系列講演和座談會，各界人士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有了進一步了解。

在理論探討方面，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汲取了新的政治營養，突

破了馬列主義的窠臼，較北京之春民主運動深入了一步。這表現在如下幾點。

(一)「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字宗旨的提出：這八個字，簡潔、鮮明地概括了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宗旨，一經提出，引發了熱烈的反響，呈現了巨大的凝聚力。這說明，中國現時政治最缺乏的就是這八個大字所具有的內涵。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在數次座談會上及「中國之春」雜誌在若干文章中曾對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涵義及其相互關係進行了初步探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最近又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并否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人權問題，正好表明「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字宗旨打中了中國大陸專制制度的要害。

(二)多元化理論的闡述：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主張“廢除一黨專政，提倡多元政治”。中國之春運動不單單把多元政治的思想運用到對“一黨專政”的批判上，而且公開宣稱，民主運動本身也是多元化的，不可以有大一統的思想。

(三)對“公有制”經濟理論基礎的挑戰：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認識到，要動搖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體系，必須對“公有制”的經濟理論基礎進行分析批判。若干發表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的論述經濟的文章，從理論上肯定了“私有制”的價值，剖析了中國大陸現存所謂“公有制”和與之相適應的中央集權經濟的不合理性。無須置疑，與多元化民主政治相對應的，必然是多元化經濟體制。

(四)對「四個堅持」的批判：中國共產黨提出并强行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中國走向民主化的巨大障礙；按中國共產黨自己的說法，也是維持現有專制制度的“四根擎天柱”。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將批判矛頭直指“四個堅持”，明確指出，只有取銷這四項基本原則，中國的民主化前途才有希望。

下面談談理論研究及宣傳工作上的不足。

(一)一支民主理論的研究隊伍尚未形成。要擔當起轉變專制制度

爲民主政體的歷史使命，就必須破除專制制度賴以存在的理論依據，也必須闡明在中國實施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這項任務，須有一支宏大的理論隊伍來承擔。目前，我們只能說，某些民運積極份子已經開始注意鑽研新的理論，以圖適應歷史轉變時期民主運動的需要，但民主運動遠未形成成熟的理論隊伍。

(二)理論研究顯得無力：在一些座談會上和在「中國之春」雜誌的某些文章中，我們曾觸及到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但尚談不上深入的探討。整體上看，理論工作顯得蒼白無力。對於一些重大的理論課題，民主運動尚未加以系統分析和研究。例如：中國專制制度長久存在的原因，馬列主義爲什麼能在非資本主義的中國取得勝利，中國爲什麼會出現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現象，共產黨宣傳的社會主義民主觀的實質，民主化與四個現代化的關係，民主是否有階級性，“四個堅持”爲什麼在中國行不通，中國共產黨目前推行改革政策可能產生的結果，民主政治爲什麼可以適應中國的國情等等。

(三)宣傳工作缺乏扎實的作風：自運動開展以來，宣傳工作表面功夫作得多，實際內容上下功夫少，給人的感覺是不夠深沉、不夠踏實。某些人批評我們，有文革期間紅衛兵大轟大鬧的作風。例如，在某些場合，我們的同志說話或有假大空的現象，或有“唯我獨尊”的態度。這種傾向，尤以運動早期較爲嚴重。

(四)「中國之春」雜誌沒有充分體現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目的、立場、觀點、方針、政策和策略，沒有辦出機關刊物的特點及水準。

有一點需要指出，我們強調理論研究的重要，并非是像有的人建議的那樣，中國之春應創造出一整套完備的理論，提出一個什麼“主義”，爾後強力推行，最終在中國實現這個“主義”。我們要反覆向世人說明，民主運動的目的之一，是開創一個多元化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種政治局面本身要允許各種理論、各種思潮、各種主義、各種哲學觀念都能夠自由地表達，并在平等的地位上以文明的、和平的方式互相競爭。這是中國之春主張的多元政治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鼓勵任何人，包括中國之春的成員，提出自己獨特的理論或主義，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世界上過去沒有、現在沒

有，將來也不會出現一個完善的、不變的、絕對正確的理論，能夠解決中國和世界上的全部問題。那種“廢除百家，獨尊儒術”、“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及新老“凡是派”的排他性大一統觀念，正是專制制度的思想基礎。民主運動要用具體的政治、經濟主張，要用靈活的戰略和政策，達成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的長遠目標。如果問中國之春最崇尚何種理論，我們的回答是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理論。我們所強調的理論研究工作，是要在理論上論證中國專制制度終將結束的必然性，論證在中國民主政治一定代替專制制度的規律性，并在理論上闡明當前正處於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化的大變革時代，從而堅定民主運動必勝的信念。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也可以說是一項困難，那就是：很多有名望、有造詣的香港及海外的學者及知識份子，雖然在某些場合對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表示同情與支持，但基本上尚持觀望態度，未能公開給我們的雜誌提供高水準的理論性和思想性文章。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國內專制制度過去對於僑胞及其國內親屬的迫害仍使人們心有餘悸外，主要是由於我們運動和雜誌自身的水平不夠，尚不足以喚起他們的認同感。因此，我們需要一個良性循環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就是我們自身素質的提高。通過學習和求教，自身水平提高了，自然會增加民主運動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虛下心來，向那些水平比我們高，認識比我們深的朋友們，承認我們的幼稚、承認我們的弱小、承認我們的不足、承認我們已經犯了不少的錯誤，并向他們講明，正因為如此，我們亟需他們的幫助，亟需他們的指導，更亟需他們的介入，以提高整個運動的素質。

二、 運動的推展及組織的籌建

拓展一項旨在改造社會的運動，非要有組織的推動不可。做為一種手段建立的組織，必須促進運動，造成時勢，才具有生命力。一般說來，運動推展與組織建設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在順序上，或先發起運動，如形勢需要則建立正式組織，再由組織推展運動；或先建立正式組織，再推展運動，擴大團體。中國之春從運動走

向組織，採取的是前種方式。

因此，在這次代表大會之前，中國之春尚未建立一個正式的組織，她只是一個有廣泛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的運動。在運動中，各地湧現了一批有理想、有獻身精神、有全局觀念、有一定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以這批積極份子為中心，各地建立了聯絡站。在國內，原有的及新湧現出來的民運積極份子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國之春取得聯繫後，也組織了一些聯絡網點。這樣，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總部——各地聯絡站——運動積極份子的組織雛型逐漸形成。

運動初期，雖然湧現了大批的熱心份子，但并未急於成立正式的組織，主要是考慮當時成立正式組織的條件尚不成熟。建立一個以變革中國現有專制度為目標的民主團體，至少須具備三方面的條件：一是時代需要；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礎；三是有一批骨幹積極份子。從一年運動的實踐可以看出，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收到了相當大的迴響，說明中國即將發生根本性變革的大時代已經來臨；在繼承過去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理論的基礎上，民運積極份子們對“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真諦有了進一步了解，思想認識已較北京之春時期有了相當的提高；運動經過高潮、低潮、曲折乃至反覆的過程，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已逐漸聚集在一起。在這種水到渠成的形勢下，推出有形的組織，也就顯得十分自然了。

從第一批聯絡站建立起，中國之春便進入了半組織狀態的、向正式組織過渡的轉型期。現在中國之春已在日本的東京、橫濱、名古屋，在香港和澳門，在澳大利亞，在歐洲的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在美國、加拿大的各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洛杉磯、休斯敦、芝加哥、波士頓、華盛頓、匹茲堡、新澤西州、蒙特利爾、多倫多、溫哥華等地建立了聯絡站。在國內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國之春也建立了聯絡網點。總之，一個國內外相聯系，遍及全世界華人社區的組織架構已逐漸形成。目前，是我們共同努力，將這一架構定型，并使之豐滿的時候了。

在組織籌建方面，民運積極份子中，曾出現過兩種極端的意見

。一部份激進者提出，應該立即組黨。理由是：既然中國之春鼓吹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新的政治實體的形成和崛起，就意味着將來要走上組黨的道路，不如現在一蹴而就。另有人認為，當前工作重點是傳播民主思想，以辦雜誌為主，沒有必要成立正式的組織。介乎兩者之間的多數人的意見則認為，根據現在的思想及組織條件，中國之春應首先成立一個包容量很大的泛民主的群眾團體。今後，這個團體向什麼組織形態發展，將取決於未來形勢的演變。

在運動向組織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是有過深刻教訓的。

第一、有急躁情緒。比如，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下，總部機構膨脹過快，脫產人員一下子增加太多，曾一度造成騎虎難下的局面。

第二、在選拔幹部方面，未能做到適當考核，未能發揮各人所長。

第三、在半組織狀態的擴展過程中，未處理好精英路線與群眾路線的關係。本來，現階段應採取精英路線及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式，重點在精英路線。也就是說，要以聚集精英人材，組成骨幹隊伍為主進行組織工作。在此基礎上，再以骨幹為核心，逐步通過群眾路線的方式，凝聚一大批力量。由於總部對於上述原則掌握不夠，有的聯絡站曾出現精英隊伍尚未建全而過快膨脹的現象，雖人數眾多，但沒有戰鬥力。過快膨脹還加重了內部摩擦，使精力浪費在協調內部矛盾上。

在這裡，我們還應該深刻地檢討一下中國之春運動總部的工作機構內曾出現過的二次分裂，以便總結教訓，提高認識。

從歷史上看，一個機構出現分裂，往往有如下原因：(1)思想意識上的嚴重分歧；(2)人員的素質不夠。所謂素質，似應包括有否抱負和理想，有否獻身精神，有否涵養性和顧全大局的精神，有否正確的工作方法以及認識水平的高低等等；(3)制度不夠健全；(4)外界勢力干擾。

上述因素也是促成中國之春民運總部工作機構內出現分裂的原因。總部負責人應承擔的責任是：選用幹部不慎、民主修養不夠、未能及時健全各項制度以及對個別人員的工作安排不妥。中國之春民運積極份子們，在這兩次事件中，對以下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一)民運人士要在運動中不斷加強自身的民主意識。

應指出，我們不少同志對專制制度深惡痛絕，下意識地進行反抗，乃由於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的本能所趨使。“四五天安門運動”和西單民主牆，就是專制制度自發“異化”出來的和專制制度本身相對立的力量。然而，自發地反抗專制主義並不等於自覺地追求民主，這兩者之間還有一條很深的意識鴻溝。自發地反抗舊有的專制主義，如果引導得體，可以成為追求民主目標的起點；另一方面，如果不把反抗專制主義提高到自覺追求民主的層面，即使鬭爭取得最後成功，也至多是新的專制取代舊的專制，雖然“民主”、“自由”可以成為新專制主義向舊專制主義挑戰的口號。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奪取政權，就是在爭取民主的口號下，以新的專制主義取代舊的獨裁統治的例證。這個歷史教訓，不得不使我們深思。我們必須承認，參加民主運動的一些人，包括某些負責人和積極份子，思想意識還停留在自發地反抗專制的層面，對民主的真諦缺乏了解。主要原因是，我們很多人長期受舊傳統的薰陶，尤其在中國大陸專制制度下生活了數十年，受的是共產黨集權主義的教育，思想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不自覺地打上了專制、獨裁的烙印，思想方法不少地方仍是共產黨大一統觀念和單元思維那一套。因此，雖然我們在運動一開始就公開聲明要用民主的方法從事民主運動，但在真正的實際運作中，共產黨教育遺留給我們的影響還不時地不自覺地發揮作用。例如，有的同志因受共產黨“鬭爭哲學”的影響較深，對待同志間正常出現的一些意見分歧，往往採取過激和無綫上網的態度，動輒稱之為“路綫鬭爭”，其結果，難免傷害同志間的感情。

今後，我們要十分注意在運動中不斷洗刷自身的非民主觀念，洗刷卅多年來專制主義的影響，加強自身的民主意識。要認識到，民主的涵意之一就是包容，要承認思想不能絕對統一的事實，要尊重與己相左的意見，要學會與不同意見和平共存和平競爭。要切記：民主應成為民主運動自身的一種生活方式和追求的目標，而不能像共產黨所說的那樣，民主僅能做為一種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

(二)民運人士要樹立正確的民主觀。

要注意民主立法與行政執法的不同。立法，即討論決策時，

要充分商量、討論，少數服從多數；執法，即貫徹決議時，要~~不~~折扣，無商量餘地。有人把民主理解為事事公開，事事都要知道，事事都要表決，這顯然是較為狹義的。

(三)民運人士要勇於面對矛盾、面對現實。

縱觀有史以來世界上任何一個團體，尤其是政治團體，都經歷過或正在發生着新陳代謝現象，即有人離去，同時又有人加入，這是一個團體有生命力的表現。如果把有些人的離去稱之為分裂的話，那麼，分裂則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是一種常態，而不是變態。既然，中國之春總部的工作機構出現過的分裂已成為事實，我們就必須正視它、研究它。可是，過去總部在此問題上却採取了駝鳥政策。首先是害怕分裂，不是積極地去面對矛盾、解決矛盾，不現實地希望矛盾能自行化解，掩蓋問題。結果，矛盾越積越大，最後終於爆發；其次是不相信廣大成員的判斷力，當矛盾已經暴露，而別人問及時，通常是以共產黨的慣用語“形勢大好”加以迴避。如果早些將問題挑開，讓廣大成員都積極參與意見，或可緩衝矛盾，抑制一下個別人的激動。至少使聯絡站心中有數，不至感到突然。

當然，也不能否認，過去總部工作機構問題的產生，與正式組織尚未成立有關。選舉制度及任免制度尚未健全，難免在組織工作上出現問題。

總之，若是要問：“根據你們一年運動的體會，你們認為開展民主運動的最大障礙是什麼？”我們坦誠地回答：最大的障礙來自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本身，來自我們自身的非民主、非法治的觀念。我們堅信，隨着從事民主運動人士自身的非民主、非法治觀念的不斷克服，民主運動才會真正蓬勃發展起來。

一年多的運動實踐告訴我們，拓展民主運動，還必須不斷克服民族性的劣根性對我們的影響，其中之一則是中國人難於團結的“一盤散沙”的傾向。一位積極份子深有感觸地說，日本人在一起，九件事意見不合，只有一件事意見一致，就可以團結一致做這一件事；中國人在一起，九件事意見一致，僅有一件事意見不合，就要分道揚鑣。中國之春必須敢於正視這種現實，承認這種現實，進而改變這種現實，才能不斷克服「一盤散沙」的傾向，逐漸將民主力

量凝聚在一起。

三、公共關係

一年多來，中國之春在拓展公共關係方面，進行了一些努力。

運動一開始，我們就與“東亞人權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East Asians' Human Rights），“美國工人和藝術家支援波蘭團結工會委員會”、“國際特赦”等組織建立了聯繫。

今年五月份，中國之春應“國際反集權聯盟”（Resistance International）籌備處的邀請，派出代表團參加了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國際反集權聯盟」成立大會，中國之春為該國際組織的顧問委員「國際反集權聯盟」主要是由蘇聯、古巴、波蘭、東德、越南等共產黨國家持不同政見者聯合組成的國際性團體。她的成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異化出來的反對力量的首次聯合，是共產主義運動走向全面衰落的標誌。該國際組織得到了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人士的大力支持。中國之春進入她的領導機構，說明已獲得國際上的承認。

此外，中國之春與北美、日本、香港等地的很多華人社團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以越、棉、寮難胞組織為首的舊金山各界僑胞的籌劃下，中國之春在舊金山舉辦了第一次籌款餐會。爾後，紐約各界僑胞又幫助我們組織了另一次籌款餐會。我們知道，由於國共兩黨長期對峙和祖國長期分裂，海外華僑社團常被認為非“左”即“右”，彼此難於溝通。可是，在中國之春的籌款餐會上，持不同觀點的僑團可以聚餐於一堂，並且都表示大力支持民主運動，顯示了民主運動的凝聚力。立場不同的僑團，能以在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前提下坐在一起，不能不說是一個可喜的開端。中國之春將繼續在促進僑社團結方面做出獨到的努力。

運動開展以來，各地大學的東亞及中國問題研究機構、華裔學者及關心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中國同學會和香港同學會等，為舉辦中國之春的講演會、座談會，做了不少工作，我們要經常與他們保持聯繫，繼續進行合作。

運動開展以來，很多關心國家前途的同胞、新聞從業者、教授

、學者、作家對中國之春一直表示關懷、同情和支持，我願借此機會代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向他們表示衷心謝意。

過去一年，我們在公共關係處理上，也有不少缺失之處。如一些社團和知名人士曾欲與我們聯繫，或願意保持經常性接觸，但由於我們經驗不夠、人手不足，未能安排適當時間向他們求教，或未能做到經常性的聯絡，使一些朋友感覺中國之春有架子，甚至感覺與中國之春之間有隔閡。在有些與外界接觸、交流的場合，我們中間有些人顯得年輕氣盛，傷害了一些朋友的感情。我也想借此機會向他們致以歉意。

四、 財政工作

自運動一開始，我們就呼籲各界給予我們財力和物力上的支援。感謝那些慷慨解囊的同志們和朋友們，由於他們的鼎力支持，中國之春運動才得以不斷擴展，今天的大會才能以順利召開。

過去，中國之春的經費來源計有：

- (一)「中國之春」雜誌的訂費及贊助訂費；
- (二)講演當場募捐；
- (三)舉辦籌款餐會；
- (四)會員費及成員贊助費。有些聯絡站成員及積極份子在正式組織成立之前就主動交納會費，或承擔聯絡站的開支，表現了高度的熱忱。
- (五)台灣人民的捐款。運動初期，台灣人民反應熱烈，踴躍捐助。報紙上報導的捐款數目不一，我們也難以獲知確切的數字，至今已有三筆捐款寄轉到中國之春，并已在新聞界公佈。
- (六)來自世界各地僑胞及僑社的捐款。
- (七)來自外國友人的捐助。

使我們感動的是，有的熱心支持者定時給我們捐助，有的將其收入的一定比例捐助給我們。有的人其親屬在大陸或和大陸有貿易往來，他們默默地支持我們的事業，不為名，不為利，不求任何報答，只求替他們保守秘密。他們除了希望我們把運動搞好之外，沒有任何附加的條件，這些人是最可敬的。將來，待民主運動取得一

定成效時，在徵得他們的同意後，我們會以某種方式感謝他們的。

更使我們感動的是，一些公費留學生和訪問者，也將本來就不多的生活費節省下來，寄給我們表示支持。

還要特別指出，這次大會主要是由兩位僑胞贊助的。我願借此機會向他們表示感謝。

運動初期，由於人手少、工作多，很多捐款者未能及時一一回信致謝。在此，我願向他們補致謝意。

我們在運動開始時曾宣佈不接受以政府名義和執政黨名義的捐款，目的是爲了保持運動的獨立性，我們過去恪守了這項原則，今後仍恪守這一原則。

在籌款方面，我們還是十分缺乏經驗的在西方，籌款是一門學問，人們從小也有捐款的習慣。募款的形式多種多樣，如用義賣形式、用文藝形式、用尋求專款專用的贊助形式等等。今後，我們仍要在籌款問題上多下功夫，要把籌款的過程，看作是發動群眾的過程。

在財務的開支方面，由中國之春財務小組全權掌握。開支的原則是做到三項保證：(1)保證雜誌的經費；(2)保證一定數量的香港聯絡站的經費；(3)保證一定數量的國內活動經費。其餘活動的開展則取決於隨時的籌款數目。

應當指出，目前我們的募捐數目與我們所要承擔的工作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每一個成員都要重視這個問題，每一個成員都有募捐的責任。

五、 今後的工作任務

在闡述今後工作任務之前，有兩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問題值得一談。

第一是堅持獨立立場和維護獨立形象問題。這是中國之春的生命綫，每個成員都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中國之春的獨立立場和獨立形象。過去一年，中國之春堅守了這個原則，我們並沒有看任何政府的臉色而行事。我們深切體會到，只有堅守這個原則，中國之春才有存在的價值，中國之春才能不斷發展；喪失了這個原

則，中國之春就等於結束了她的生命。這個原則我們知道，其它政治勢力也明了。

過去一年，各種勢力對中國之春進行的干擾也集中體現在破壞她的獨立立場和獨立形象上。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及中國領使館到處散佈，尤其是在大陸留學生中散佈，中國之春是台灣策動出來的，是台灣出錢支持的，以迷惑我們的同情者，分化我們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有些不明智的台灣國民黨人則力圖把中國之春納入他們的“反共”陣營，甚至策動中國之春的個別人員投靠台灣。幸好，來自這兩方面的干擾都被我們一一排除了。但排除了一次、兩次，并不意味着今後不再發生，對於此點，每個成員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第二是注意策略和政策。我們要仔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台灣國民黨有人、有錢、有軍隊，在海外的勢力也很大，近年在經濟建設上的成就又遠大於大陸，為什麼卅多年來在與共產黨的鬭爭中節節失利，處於被動地位？答案是明顯的，除了複雜的國際因素外，國民黨人未有掌握正確的鬭爭策略是重要原因之一。那種僵硬的反共八股宣傳，把共產黨人不加區別、統統打倒的論調，對大陸全面否定的態度，都難以贏得大陸廣大人民的支持。

中國之春要從國共相爭中汲取經驗和教訓。要用理性的態度分析問題，要用靈活的策略達成目標。比如，我們就公開地宣稱，要團結國、共兩黨中開明的、民主的力量；只有把對手瓦解到最孤立的程度時，才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中國之春今後的工作任務是：充實理論、鞏固後方、支援前綫、推進入主戰場。

(一)加強理論建設和宣傳工作：

要逐步建立一支理論研究隊伍，加強「中國之春」雜誌的理論內容。即將成立的中國之春宣傳組將把曾經發表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的重點文章滙編成冊，并擬譯成英文出版；將出版簡訊性內部刊物，報導國內外民運活動及刊登「中國之春」雜誌上重點政策性及理論性文章，發給留學生、中國駐外機構及國內重點單位，同時，要編輯一些政策性小冊子。在這裡，我們順便宣佈一下，「中

國之春」將試辦理論版，充實理論性文章。

(二)鞏固後方：

中國之春是利用海外民主、自由的環境發展成長的。國內民運同志指出：民主革命歷史都有過運動重心從國內移到海外，再反饋回國內的普遍歷程。中國之春在美加地區成立和擴展，亦標誌着中國的民主運動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具有民主、自由環境的海外，在中國之春得以在國內公開活動之前，無疑是中國之春的後方基地。我們要求得進展，做到出師有力，一定要站穩足跟、鞏固後方。爲此，至少要做好四件事：

第一，以精英路線和群眾路線相結合的方式慎重地擴展組織，當前，特別要注意求賢訪能、聚集人材。要認真加強組織建設，逐步健全各項制度。

第二，廣開財源。要相信和依賴被孫中山先生譽爲“革命之母”的廣大僑胞。只要廣大僑胞認同了民主運動的目標，確信我們的奮鬥不是爲了私利，而是爲了中國真正民主政治的實現，并對我們事業的必勝產生信心感時，慷慨解囊的人是愈來愈多的。過去，愛國僑胞曾資助了偉大的辛亥革命。今天，他們也完全有能力在財力上支援當代的民主運動。

很多朋友建議，中國之春在有能力時，開設小企業，踏開以企業養運動的路子，爭取做到經濟獨立。這方面的工作，已着手進行。

第三，民運組織各級機構及成員要遵守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向當地政府機關表明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目的，是爲了推進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并不干涉所在國的內部事務，以取得當地政府及民衆的諒解。

第四，繼續尋求國際支持。我們要鞏固原有的關係，擴展新的關係，尋求更多的國際組織、國際人士同情和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

國內同志們希望中國之春有一個穩固的後方，他們說，後方基地穩固了，他們心中才會踏實，才會信心十足地開展工作。

(三)支援前綫：

毋庸置疑，港澳是當前民運工作的前綫陣地，是海內外民運聯繫的樞紐。香港因她的特殊地位，在過去的中國民主革命史上曾發揮過重要作用。現在，面臨着1997的問題，香港更給民主運動的推展創造了空前的機會。形勢的發展將是：越迫近1997，香港同胞就愈擔心失去現有的自由，對民主政治的嚮往就愈強烈，就會愈來愈體會到，只有大陸有了民主，香港的繁榮、穩定才會真正得到保證。最近，我們高興地看到，香港人民要求“組織起來，當家作主”的意識愈來愈高。這些，都是民主運動在香港扎根、發展的良好條件。

自中國之春成立起，中國之春民運總部就成立了港澳工作組；并先後數次派人抵港活動。港澳工作組配合中國之春港澳聯絡站，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後，我們的方針仍然是全力以赴地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港澳，保障前綫。

爲使今後港澳地區工作開展得更好，似應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中國之春要虛心向港澳地區老民主人士們學習。很多港澳同胞曾走在中國之春前面，都有豐富的經驗。我們要以後學者的姿態向他們虛心求教。

第二，中國之春要走出自己的圈子，與港澳同胞爭民主的運動及香港學生運動相結合。

(四) 推進大陸主戰場：

中國之春是一場海內外配合的民主運動。自運動一開始，我們就反覆強調，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重點是在中國大陸。由於國內執政者當前對民主運動及持不同政見者採取鎮壓政策，所以，中國之春在海外搞得轟轟烈烈，而國內的工作却只能穩健地、逐步地開展，目前，多採取秘密作業的方式。工作的艱鉅性，是一般人所難以想像的。儘管如此，民運戰士們仍克服重重障礙，在北京、上海、廣州、四川、湖南、河北等地，建立了聯絡網點，并通過各種途徑傳播中國之春的信息。

如何進一步在國內擴展民主運動，將是我們這次大會研究、討論的重點課題。我願把一些聯絡站和民運人士在這方面工作的經驗總結一下：

第一，在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積極開展工作。大多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是同情和支持民主運動的。不管他們是否組織上加入了中國之春，只要接受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觀念和意識，回國後就會成爲民主思想的傳播者。有些積極份子一直把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開展工作放在首位，他們千方百計地把「中國之春」雜誌傳遞到留學生手中，有的還和留學生們搞座談、交朋友。留學生工作是送上門來的、將民主思潮傳向大陸的工作，今後一定要加強而又加強。

第二，在回國探親、旅遊、講學、定居及從事其它活動的海外僑胞和學者中積極開展工作。有的積極份子一聽到有人去中國大陸，不管去做什麼，都主動地設法與他們聯繫，希望能傳遞信息，那怕是口傳也好。不便攜帶「中國之春」雜誌，就托他們帶些西方介紹民主思想的書籍，這或許是更具有意義和更實際的。

第三，在中國大陸出國探親者及各種外出訪問團中積極開展工作。中國之春的積極份子們要利用一切機會主動接近他們，一方面向他們了解最近國內的動態和民心；一方面技巧地宣傳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法治、人權的觀念。由於這些人員在國外停留時間較短，人生地不熟，他們急於有個嚮導帶着他們多聽、多看、多了解外面的情況，這就給我們的工作提供了條件。

第四，請自由進出中國大陸的外國朋友給予協助。

第五，利用其它一切與中國大陸發生聯繫的途徑。

總之，只要我們心中時刻想到，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使民主思潮進入中國大陸這個主戰場，那麼，就可以群策群力地克服困難、創出辦法了。

各位代表，過幾天，我們就要進入一九八四年了。以「一九八四」這本書聞名的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曾在數十年前就預測一九八四年集權國家中人們的行動受監視、思想被禁錮、人性被摧殘的局面。中國大陸的現狀已跌到了奧威爾所描述的境況的邊緣。的確，自從「一九八四」這本書發表後，一九八四年就預先地在人們的心目中投下了陰影。可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要向全世界宣告：農曆甲子的一九八四年正是我們大顯身手的一年

我們滿懷信心地預言：在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中國最可能首先突破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局面，最可能首先結束奧威爾所描述的共產黨國家集權專制的狀況。我們之所以敢於做出這種預言，是因為中國具備一些良好的條件。

第一，中國人民迎接社會大變革的心理準備已初步完成。三十多年無產階級的實踐，尤其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淋漓致盡地暴露了中國社會制度的黑暗面。人民普遍地認識到，中國問題的癥結是制度問題。應該承認，中國大陸的三信危機在共產黨國家中是少見的，人民變革慾之強烈，也是少見的。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已把中國幾千年來的專制制度推到了極端的程度，物極而必反，現在，專制制度向民主政體的轉機已經來臨。

第二，中國有台灣和統一問題。我們不認為台灣政府是一個民主政體，但我們必須看到這一點，即：台灣的存在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鉗制的力量。國共兩黨的鬭爭給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提供了空隙。中國的統一需要國共兩黨以外的政治力量和人民層面的廣泛參與，這給民主政治在中國建立提供了機會。

第三，中國有香港的問題。香港是國內外民運聯繫的樞紐，繁榮的香港是大陸專制制度的一種無形的腐蝕劑。

第四，中國有二千多萬海外華僑，他們是民主運動的海外後盾，他們和國內各階層的廣泛聯繫給民運向國內的反饋提供了渠道。

第五，中國大陸在海外有近二萬多名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他們會把自由、民主的思想，把法治、人權的觀念帶回國內。

只有我們充分利用上述四項條件，民主運動是大有可為的。

各位代表，我們必勝的信念還建立在世界潮流總趨勢的變化上。如果說，一百多年前，馬克思主義的創立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是人類試圖用一種理想社會取代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從而克服後者弊病的一種嘗試的話，那麼，今天我們可以初下結論，這種嘗試并未成功，人類在這次嘗試中付出了代價。現在，人們開始思考，甚至連不少共產黨人都在詰問，他們的革命成果為什麼違反了他們原來的初衷。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發展到

頂峯，然而，隨着共產黨國家的人民，特別是佔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大陸人民的覺醒，世界潮流的總趨勢開始轉向，其結果，共產主義運動必將被它異化出來的民主運動所戰勝。中國民族，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古老民族，將在這次歷史的轉折中給人類的文明重新做出貢獻，并同時贏得自己的新生。

同志們，世界上還沒有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實現民主政治的先例，就讓第一例爭取在我們手中開創成功吧！

預防被驅

史宝剑



倒垃圾

赵伟



原載《諷刺與幽默》

夫妻识字

王凯新



雪人就怕太阳晒

哈哈笑



對目前中國形勢的一些看法

本刊編輯部

各位代表及各位來賓：

我謹代表「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作有關祖國目前形勢的報告。我們將討論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與經濟形勢，經濟改革的成效與趨向，國家政治生活在經濟與政治改革中已經、正在和必將引起的種種變化等等。對於台灣問題，我們要談的，主要是圍繞祖國的統一和台灣的前途問題。談到香港，我們覺得有必要發表一些針對1997 問題的看法和香港同胞面對1997 如何自處的建議。

第一部份：中國大陸形勢

(一) 經濟形勢

① 農業

近兩年來，中國國內的農村經濟，相對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了。根據官方發佈的統計資料，1982年全國的農業總產值已經達到2785億元，無論比1978年的1459億元及1981年的2312億元都有了大幅的增加。這種成績的獲得，無疑地，是由於推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如生產承包責任制、鼓勵個體戶大力發展養畜業和其他副業生產，允許農民從事一定程度的營利性質的各種工商活動和提倡「萬元戶」和「發家致富」運動等等。這些措施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長期以來受公社體制所束縛的農村生產力。

然而，我們不能不充分了解到，此一成績的背後，隱伏着一些問題，日益表面化與嚴重。按照現有的形勢發展下去，整個改革，將進入轉折性的「異化」階段。

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之所以要推行其經濟改革政策，根本的原因在於：第一，被國內面臨破產的經濟形勢所迫。第二，被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所迫。第三，被黨內各派系的傾軋所迫，誰能緩和一點人民的不滿，誰才能掌權。第四，被

海外形勢所迫，西方世界、台灣和香港在近十幾年的飛躍發展，與大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四個「所迫」，迫使了當局實行向資本主義作「一定時間內」的讓步政策。

上面說過，這幾年國內在農業生產方面之所以能夠取得一定成績，主要是因為改革措施解放了農村勞動力並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然而，分田包幹和鼓勵個體戶發展工商副業不是農業經濟改革的根本措施。等到在目前結構下能解放的勞動力都解放了，能刺激起來的積極性都刺激起來了，生產發展就達到飽和程度步調也就會停頓下來。如要整個農業經濟的結構型態再有突破性的變革，就要打破一切阻碍生產發展的帶有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框框套套，河南省信陽公社黨委書記劉玉齋甚至大着膽子提出取消人民公社。顯示人們對這種束縛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組織形成的不滿。

再有，共產黨當政者允許個體農戶從事營利性的各種工商副業活動，並鼓勵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就出現雇工與窮富兩極分化的現象，同時，既然政府把田地租給各戶，同時又允許各人根據自己的條件實行專業化生產，結果自然難免會有一些農戶或集體單位依照個自的利害觀，從農業生產中脫離出來，使政府的計劃生產受到衝擊，也使土地的租耕與買賣現象成為難以遏止的新趨勢。儘管中共中央在過去幾年來一直反復強調其禁止買賣、租賃土地的法令，但是效果却微乎其微。這逼使國務院在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再次發出「關於制止買賣、租賃土地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來，一些農村社隊、國家企業事業單位等，違反國家法律規定，買賣、租賃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土地的情況不斷發生……，一些農村社隊把土地當作商品買賣、租賃，撈取大量錢款和物資。」據報導，有些社隊給社員分發賣地款，每人平均得一千元甚至一千五百元以上（見「人民日報」1983年12月2日第二版）。買賣土地是自由化農村經濟的一個重要突破口，這個口一打破，「私有制」將一瀉千里，所往無前。

又據「人民日報」報導，這幾年來，農村的宗族勢力大大抬頭，而「宗族勢力起來之後，突出表現是干涉婚姻自由和組織鬪毆」。許多鄉村正在徵款、募捐，以便修築宗廟、撰寫族譜等等（見「人民日報」1983年11月5日第八版）。宗族勢力的抬頭，當然與體制改革有關，例如，責任制的推行，尤其是分田到戶，使黨對於農民的控制力大大減弱。而私有經濟的恢復一方面使人不期然產生變了天的想法，一方面也使各農戶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大大增加起來；變天觀引起復舊潮，驟然增加的衝突則迫使大家不得不集結勢力以便自保。於是，宗族勢力便乘機抬頭。而宗族勢力的抬頭，則必然會進一步削弱黨對於農民的控制。

還有，因為目前的改革實際上是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否定，所以免不了會產生加深信仰危機的反效果。「三信危機」，加上黨的控制力的減弱，自由經濟的恢復，還引生了別的許多社會問題，例如迷信和賭博活動的盛行等等。這些社會問題，顯然不是搞一兩個「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便可以解決得了的。可以預見，等到改革促成的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程度而停步不前時，上述政治與社會方面的反效果便將大大地突出起來。那時節，改革派必將兩面受敵，他們一方面要接受來自黨內左派的反改革挑戰，一方面又將面臨來自民間要求徹底改革以打破現有的一切體制框框（如「四個堅持」）的壓力。事情發展到那一地步，改革派也就大勢已去，跟着發生的會是什麼，自然十分值得我們注意。

② 工 商 業

與農村經濟改革相比較，工商業方面的成就顯然遜色得多。尤其在工業方面，因為改革所涉及到的問題比較複雜，所以改革的步調也顯得比較緩慢。

以管理體制的改革為例，早在1978至1980年時期，一則由於改革派對於企業管理的民主化改革的趨勢及反效果估計不足，二則由於社會上的民主思潮正在高漲，改革派為着順應潮流，也為着借民主之名與尚未全倒的「凡是派」決鬪，所以同意並提倡在企業管理中實行群眾參與的民主化改革。當時，職工代表大會的形式和職權獲得充分肯定，有人認為，職代會掌握企業管理的決策權，實在是使企業管理民主化的最有效辦法。許多單位紛紛組織職工代表大會，有的還煞有介事地選舉起廠長之類的行政領導來。想不到這種辦法一經實踐，馬上證明不符合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基本原則。因為，一旦職代會的權力獲得確認，民選領導擁有實權，黨的領導便將無從體現。而要堅持黨的領導，則職代會便會失去實際的民主價值。尤其在波蘭工運發生之後，中共當權派為怕玩火自焚，乾脆將職代會問題擱置了。代之而起的，便是「黨政分家」，由黨委實行集體領導以防止官僚主義，充份發掘和起用專家和知識份子等措施。可惜，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措施還沒有收到多大實效，因為實行黨政分家和集體領導都有它們的難處（這一點我們在政治形勢中將會談到）；要重用知識份子也不是輕易辦得到的，因為現在當權的人不願交出權力，同時也因為知識份子「皮上的毛」，是不可靠的。

何況，就算知識份子和專家真正掌握了企業大權，只要現有的體制架構不變，他們實際上也很難有所作為。這一點，改革派也許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明白過來。正如他們在提倡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企業管理方法時那樣，很顯然，他們忽略了這一點，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管理方法，大部份都與它的經濟制度分不開。企業擁有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利益在合約範圍內隨意雇用或解聘任何屬員，在國有

體制下，各級人員的任免却往往要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試想想，假如國內的企業領導亦有權隨意雇免員工，黨的階級路線與人事政策不就受到很大衝擊了嗎？社會人才一旦進入競爭市場，若加上各企業自負盈虧的經營原則，員工們的政治質素便根本得不到任何保障。同時，只要各企業真正承擔了盈虧自負的責任，它們要怎樣發獎金、怎樣整縮或擴張業務，政府實際上很難管得住，這涉及到計劃生產和社會體制問題。共產黨一方面要搞活企業，一方面又抓住「四根擎天柱」不放，今天反對濫發獎金，明天強調計劃生產，現在又搞起清除「精神污染」來了，這與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如何協調得起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企業主是企業資本的所有者，利害攸關，他們怎能不關心生產管理上的任何一個細節？反觀現存國有體制下的企業領導，只要他們掌握了較大的自主權，誰能擔保其不會在個人利益的支配下幹出損害企業利益的勾當來？反正企業資本不是他們的，縱然搞垮了企業，於他們本身，也不會有多大損失。單就這一方面而言，人們就很難相信，中國的企業能從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中學得多少東西。就依人事任用為例，誰相信共產黨的企業領導者能夠像企業主那樣在最大限度上排除感情上的干擾呢？

此外，儘管中共的改革派也知道自由競爭對於刺激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但是，就整個社會而言，任何一個行業的自由競爭，都將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行業的連鎖反應，工業界的自由競爭必然導致商業及交通運輸等行業的競爭，甚至連教育事業也免不了會受到影響。而且，真正的自由競爭必將導致經濟、社會及政治結構的大改組，如欲使現存的各種制度和結構在本質上不受到衝擊，中國企業根本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自由競爭。

舉例而言，由於體制改革使各個地方政府有了較大的自主權，財政上的自負盈虧責任也加大了。爲着開闢財源，不少地方都就地取材，紛紛開設工廠。這些計劃外的新開工廠大量消費原材料，使計劃內的舊廠處於吃不飽的饑餓狀態。由此出現的種種問題，至少有兩個效果：其一是新開工廠質量過不了關，又不按計劃生產，造成市場上劣貨充斥，以至供求又很不平衡；其二則爲國營的原有企業，因爲缺乏原材料或者無法與造價較低的新企業競爭，以至面臨倒閉危機，而如何處置原有的員工和設備便成爲當政者極感頭痛的問題。他們既然沒有勇氣放任形勢繼續發展并用自然淘汰法去全面改組現有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當然只好以扼殺新生企業的手段去解決問題，以致自由競爭的長處得不到發揮，官僚主義作風也掃除不了。

最後是關於自由經濟的問題。

爲着刺激工商業的發展，也爲着解決嚴重的失業問題，改革派容許甚至鼓勵私人在允許的範圍內開辦小型的工商業，還提倡將經營不善的國營單位承包給私人。於是，城市中也出現了私有經濟和雇工問題。私有制正在向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核心思想——公有制，發起了前所未有的進攻。

在這些問題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私人經營的工商事業在管理方法及時間安排上比較靈活，主人又總把自己的命運與事業聯繫在一起，處處盡心盡力；而他們的對手則多半是官僚主義化的國營工商業，這就造成了對私有工商業十分有利的形勢。私有工商業亦將在這種情況下迅速發展和壯大起來，對現有的經濟體制發出挑戰。這時候，領導階層中反對改革的人固然會千方百計地阻撓和扼殺私有經濟的壯大，甚至連改革派本身也不得不處處設防。他們隨時隨地都會依據自己既定標尺甚至臨時的感情變化去對私有工商業作出種種規限。而發展中的私有工商業的所有者，則必然會依賴自己手上的資金，運用各種手法，包括賄賂當權派和利用大大小小的社會矛盾，繼續擴展自己的事業。只要當局不沒收他們手上的錢，他們就一定會千方百計地去爲自己的資本謀求出路。尋求他們經濟上的代言人的。

值得提出的是，很多共產黨國家都有過向資本主義作一點讓步的時期，以求穩定局勢，例如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列寧就提出過「國家資本主義」時期，捷克和波蘭在動亂之後，也對人民實行了一些讓步政策。但是，這些時期都是短暫的，這些修修補補的政策都不能根本改變國家的經濟面貌。

更值得研究的是，經濟是有週期性的，短命的回升一旦過了它的頂點，跟着而來就是下坡路，事實上，國內個體經濟的回升，由於「四個堅持」的束縛，官僚階級的抵制，已經接近共產主義所允許的頂點。改良派是無法抗拒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週期性危機的。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說，國內的經濟形勢事實上一點也不樂觀。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至少到目前爲止，國內的經濟形勢與政治形勢相較，還是比較可取的。因爲，在經濟上，改革派的確做出了一點可見的成績。在政治上，他們到底給了我們什麼呢？

下面就來分析一下政治形勢。

（二）政治形勢

① 黨內矛盾

在經濟改革的同時，當權派確實也曾想到並且嘗試過進行一些政治改革，例

如搞黨政分家、提倡集體領導、從事法制改革、整頓領導班子及降低階級鬭爭的調子等等。但是，這些改革，幾乎沒有一個具有實質意義或者收到過實效。

先說黨政分家。在「四個堅持」的大前提下，黨與政根本就不可能分家。如果硬要分，而且分成功了，原來的黨委領導人，便必然會被架空，而名義上屬於行政首長的黨員則實際上取代了黨委書記的職權，如果他們不是黨員便連堅持黨的領導也會落空。道理很簡單，一個單位的黨政領導分成兩個人，在制度上如果規定黨委書記可以干預行政並且擁有最後決策權，那就無法保障行政領導的權限不受侵犯。每逢黨政領導意見不一時，行政領導最後一定得服從黨委書記。久而久之，行政長官也就會發覺堅持己見是無濟於事的，於是不得不去做書記的附從，造成人分職不分，黨政實際上並沒有分家。

反過來，如果黨政分開後，彼此各自成綫，行政首長擁有絕對的施政權，請問黨委書記如何去體現其對於業務的領導？有人說，在這種情況下，黨委的領導主要體現在對於方針政策的制訂。對此，我們不禁要問，既然行政首長擁有絕對的權力，就算黨委制訂的方針，他不是也可以不接受嗎？遇到這種情況，黨委書記能有什麼辦法？向上級黨委告狀，上級黨委不是也不能干預行政嗎？向上一級行政長官告狀，聽不聽却在乎人家，因為黨與政不在同一條綫上。這時，如果行政首長是民選的，只需要向選民負責，則堅持黨的領導根本就成為不可能。就算他們是上級委派的，如省長委派縣長，國家主席委派省長，而中央一級也搞了黨政分家，上下一綫，黨委書記的領導還不是成了空話？

談到集體領導，我們的看法是，在現有的體制結構下，這種形式對於改善國家的政治運作不但無益反而有害。事實上，真正的民主只在於人民有沒有權力選擇或罷免自己的領袖，而不在於領袖是多元的還是單一的。美國只有一個擁有最高行政權的總統，人們却不會因此而懷疑美國政體的民主性。相反，在中國，就算我們有一百個毛澤東或者鄧小平，大家也不一定認為這就是民主。依照中國現有的政體，搞集體領導不但無助以促進民主，還可能發生行政效率降低和加劇權力鬭爭、造成政局動亂等問題。

還有法制改革、整頓領導班子和允諾不搞大規模的階級鬭爭之類，其成效如何，相信大家心中都有數。搞了這麼幾年法制宣傳，也立了一大堆法，到頭來，只要鄧小平一句話，藉維護社會秩序之名限額殺人的事還是發生了。殺人者甚至還振振有詞地說：「這就是階級鬭爭，對敵人就是不能手軟，不能仁慈！」搞了大半天法制，鄧小平居然名不正言不順的做起我們的領袖來了。是鄧小平提倡要

搞黨政分家，要使幹部年輕化，但是鄧小平今年多大年紀？如果「國家需要」可以成爲鄧小平不退休的藉口，葉劍英或者其他張三李四不也可以不退休嗎？誰不知道今天的鄧小平是中共最高層唯一身兼黨政兩個要職的軍委主席？如果鄧小平真有一點心思爲國家着想，他應該了解到，正是他，把國家的法制搞得紊亂不堪了。由於他在權力鬭爭中一早就憤然表明不想做黨或國家領袖，後來言出難收，黨國領袖做不成，只好死死抓着兵權。他把中央軍委的領導權從黨、國領袖中分割出來，自兼黨中央和國家軍委兩個主席銜，使軍隊既不受黨的總書記指揮，也不受國家主席的領導，軍隊由是獨立於黨、國之外，難道鄧小平意識不到，這種體制，實際上隱伏着重重危機？

鄧小平利用大家對毛澤東實行個人獨裁的憎惡感，以提倡集體領導爲名，首先藉黨政分家削弱了胡耀邦總書記的權力，然後再用國家主席及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職去使趙紫陽總理在職級上大大貶降。而在制訂憲法的時候，又特意將國家主席的實權嚴加規限，卒之造成群龍無首的局面，而身兼兩個中央軍委主席銜的鄧小平也就替自己製造了掌握實權的最有利條件。然而，鄧主席有沒有想到，像這樣的權力結構，到他自己一旦受召去見馬克思之後，會給中國造成何等的禍患？

鄧主席主持整頓領導班子，他的原則是：凡是文化革命時被鬭爭過的幹部都有提上領導班子的優先權，凡是文化革命時期屬於造反派的，都應該清除出領導隊伍，這是何等奇妙的革命邏輯！依靠這樣的「凡是」思想，怎麼能夠整頓好領導班子？鄧主席說要發現人才、培養幹部，要人家以他爲榜樣，跑到工廠或別的基層轉了個圈，把王兆國一類的千里馬挑選出來，並且做了個示範，一下子便將王放進了團中央書記的寶座。試問，如果所有當權者都去做鄧小平式的伯樂，誰知道今後會有多少王洪文式的火箭幹部出現？誰知道各個單位中會出現多麼嚴重的拉幫結派現象？

鄧小平說不能搞個人崇拜，現在中共出了「鄧小平文選」，宣傳機器上天天在宣傳鄧選。各級領導還用行政命令要求幹部和群眾反復學習。這算不算是搞個人崇拜，搞新的造神？

既然鄧小平是這樣的人，而我們國家今日的命運却正好掌握在他的手上，難道這裡面沒有任何值得我們擔憂的地方嗎？

中國共產黨目前正面臨着嚴峻的政治考驗。複雜多變的政治與經濟形勢，缺乏更有能爲的領袖，黨內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中央與地方之間，上級與下級之間，或

貌合神離，或同床異夢。當權派想通過整黨去排除異己，把各級幹部的思想統一起來，使大家在政治上與中央保持一致。究竟整黨會整出什麼結果來？如果這次整黨不會走過場，那麼，會不會演變成爲各派之間算總賬的大決戰？如果當權派沒有勇氣在目前情況下挑起總決戰，則整黨運動始終免不了會在妥協中不了了之。

這就是今日中國共產黨的黨內形勢。

② 社會矛盾

在社會矛盾方面，我們將簡單討論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是在社會上的民主思潮、「三信危機」與「精神污染」等問題。

我們都知道，國內的民主思潮，這幾年已經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物極必反的自然現象。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個人生活的充分社會化與社會生活的高度組織化，使政治的功能大大提高。由於現代社會中政治對人們的經濟及文化生活影響太大，人們對於政治的參與慾也就相應增強。加上愛自由是人類的天性，而自由與民主却是一種事物的兩個方面，實際上很難分開，於是，民主便逐漸成爲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份。

尤其在中國國內目前的經濟制度下，社會財富基本上都變成了國家或集體所有，如果沒有民主政治與之相適應老百姓很自然就會變成政府官員的附從者甚至奴隸，政治運作上的種種弊病亦將由是而生。過去三十多年來慘重的事實，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教訓，我們都已深深體認到，政治上的民主化至少與經濟上的現代化同等重要。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在四個現代化上加個政治民主化，將四化變成五化的原因。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亦有足夠的力量去迫使統治者在我們強大的民主浪潮中屈服。我們的民主運動正在方興未艾，中國有成千上萬的魏京生，萬里長城是我們不倒的民主牆，我們深信，中國從事民主建設的前途是光明的！

「三信危機」已經替我們的民主建設準備了條件。過去三十多年來，共產黨的所作所爲，已經使我們廣大的同胞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本身失去了最後的信心。曾幾何時，有些人把希望寄托在毛澤東死後的共產黨；等到毛澤東一死，四人幫一倒，他們歡欣鼓舞，對華國鋒爲首的新的領導班子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後來鄧小平一班人取代了華國鋒他們的地位，大家的希望即刻又升了一級。然而時至今日，鄧小平要整黨清除異己了，「清除精神污染」及嚴懲「社會犯罪份子」之類不是運動的運動也搞得滿城風雨了。人們看到報頭上鄧小平指着胡耀邦的鼻頭

訓話及胡耀邦、趙紫陽、彭真等黨國元首在盛大場合遠遠跟在鄧小平背後的奇妙照片，看到連篇累牘學習「鄧小平文選」的報導及論著，一顆心已經完全涼透。共產黨的希望到底在哪裡？過去，我們等毛澤東死，等了那麼漫長的一段歲月，現在我們再等什麼？很顯然，中國的問題根本不在於人而在於制度。馬克思替我們構想了一套頗為完整的經濟制度，但是，他並沒有同時構想出一套系統可行的政治制度來。共產主義社會是在高度理想化的人的秉性的前提下構想出來的。馬克思並沒有告訴我們，共產黨要怎樣才可以在一黨專制的政治環境下不使自己腐化變質，並且將名符其實的民主自由帶給整個社會。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作為前提，任何經濟上的集權國有化都只能導致少數人奴役多數人的惡果。實踐已經對馬克思主義做了無情的檢驗，人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已經發生危機。

失去信仰的人會對前途缺乏信心，對前途缺乏信心的人會感到格外徬徨，而處在徬徨不安中的人則最容易在不良社會傾向的引誘下墮落犯罪。尤其因為近年來中共實行對外開放，外面花花世界的一切，對長期處在閉塞中的人的魅力特別大，大家發覺自己受騙了，原來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像共產黨向來所宣傳的那樣醜惡。在崇洋心理和政府新經濟政策的刺激下，許多人都在藐視權威的心態下拚命追求力所不能及的現代化享樂，大家一切「向錢看」，造成一連串社會問題。黨、國當權派在手足無措之餘，不得不拋掉不搞運動的承諾，雷厲風行地搞起「維護社會秩序」和「清除精神污染」等運動來。運動一旦展開，就難免會有人公報私仇、濫開殺戒。維護社會秩序，本來是社會問題，有人却硬把它說成是政治問題，「紅旗雜誌」還發表評論員文章，把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份子的鬭爭說成是「政治領域中的嚴重對敵鬭爭」，把偷、搶、強姦份子都歸類為階級敵人。而對於「精神污染」的解釋也由「道德污染」轉向為「政治污染」，把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人統統打成「精神污染份子」。「三信危機」因此而加深。

共產黨的前途究竟在哪裡？中國的前途究竟在哪裡？有人說，走蘇聯的道路可能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唯一出路，這裡的所謂蘇聯道路，顯然是指大家熟悉的「修正主義」。如果從這一層意義上說，中國不是已經走了幾年比「修正主義」更加「修正」的蘇聯道路了嗎？誰不知道中共領導人這幾年來所搞的一系列改革在許多地方都比蘇聯走得更遠以至更加資本主義化？為什麼前途不但不見得光明却反而越來越顯得灰暗？

蘇聯是集權專制體制，中國也是集權專制體制。蘇聯的現有體制已經存在了將近七十年，在邏輯上，單是因為已經存在了七十年並不足以得出永世長存的結

論。何況，就算以蘇聯現有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現實為依據真能得出蘇共政權可以長存下去的結論，也不見得就可以因此導引出共產黨政權足以長存下去的結論。在理論上，先出現的東西，不見得一定要比後出現的東西早些覆沒；後出現的東西，也不見得一定不可能比先出現的東西早些消亡。

中國和蘇聯都是共產黨領導，但是，這只是諸多異同因素裡頭的其中之一。根據國情，中國有很多不同於蘇聯的地方，其中的幾點特別容易理解，那怕你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對蘇聯問題並沒有作過特別研究，也不會覺得難以明瞭。歷史上，斯大林和毛澤東都犯過一連串類似性質的嚴重錯誤，但是，斯大林時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儘管已經不是黃金時代，却仍然處於發展階段。當時，斯大林把蘇聯搞糟了，蘇聯人民却並沒有馬上意識到問題的根本所在是制度和主義而不在於斯大林個人，所以，當時的蘇聯並沒有普遍出現「三信危機」。中國的情形却有點不同，到毛澤東死時，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到了日落西山的階段，大家已經不再將毛澤東的錯誤看成是純粹的個人問題，有識之士已經在尋求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了。這種情形使得中蘇兩國在毛澤東和斯大林死後的善後工作出現了不大相同的效果，這是研究中蘇局勢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大因素。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目前自由化傾向較蘇聯更為嚴重。根據資料，蘇聯的自留地比例是3%，中國是6%。中國的私營小工商業突然上漲到八十萬家。農村的兩極分化迅速。城市的通貨膨脹率（不明顯表現在價格上）是15%，失業人口是二千六百萬，這些都走得比蘇聯遠。這些經濟因素終將產生經濟新興力量，新興階級。這個新生力量將會尋求它在政治、經濟上的發言權和管理權。

第三個，非常重要的不同因素是：中國有一個五百萬人的香港和一千八百萬人的台灣，還有兩千多萬散居世界各個角落的愛國華僑。這四千多萬人大多數不讚成甚至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他們中，有錢人多的是，德才兼備的人亦多的是。出於他們的愛國心，也出於自保自救的潛意識，他們一直都在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向共產黨施加壓力。尤其這一兩年來，1997問題將香港人的政治警覺大大提高了，人們開始活躍起來。儘管各人的動機和途徑不盡一致，但是都對共產黨形成一股壓力。香港人利用地理上的有利條件，通過各種方式同國內同胞進行思想意識上的溝通，其影響之深遠，實在是難以估量的。

台灣在地理上雖然不及香港有利，但是那裡有數倍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台灣同胞恐懼共產黨。無論是執政的國民黨，還是黨外力量，都不願意共產黨控制和佔領台灣，爲了自救，他們遲早會知道應該爲促成國內政局的演變做些什麼。

第四個不同因素是：中國曾經發生過一場震撼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使國內今日的青壯年普遍接受了一次洗禮。這次文化大革命不但使我們對共產黨的本性有了深一層的認識，也替我們鍛鍊了一批人才。

第五個不同因素是：蘇聯與西方的接觸是長期緩進的，中國却在閉關有年之後突然打開大門。這幾年來，中國紛紛派學者或領導幹部到世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去，廣東現在還在組織到香港的探親旅行團，這些幸運兒驟然間眼界大開，對西方物質生活羨慕者有之，對大陸專制主義大表不滿者有之，自感過去受騙上當者有之，大受民主自由之感召者有之，決心回國搞改革者亦有之，這種爆炸性的突發因素，對於正處在「三信危機」中的中國社會顯然是一個重大威脅。

正是根據上述的種種不同因素，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不見得可以通過走蘇聯的道路，靠修修補補修出一個新局面來，這是我們討論中共政局時不能不充分了解到的。

簡單討論過國內的經濟與政治形勢之後，現在我們就要轉入台灣與香港問題了。

第二部份：台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問題

首先應指出一點，今天的中國問題，其癥結主要在於大陸。只要大陸問題解決了，台灣及祖國統一問題、香港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其次，我們必須聲明，我們對台灣島內形勢的分析，遠不如對大陸形勢分析來得確切。很多材料是間接性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在重要的問題上表明態度。

（一）對台灣政體及民主化過程的基本認識

海內外多數政治學專家都認為台灣國民黨政體不是民主政體，而是獨裁主義或稱權力主義政體（Authoritarian System）。大陸共產黨政體為專制或極權主義政體（Totalitarian System）。外國權威性的人權組織在評定大陸與台灣人權情況時，大陸被排為最末一類，台灣被排為末數第二類。我們認為，上述看法是有其道理的。

過去，台灣執政者實行自由經濟政策，執行專家路線，比較尊重經濟發展規律，結果，取得了較大陸顯著得多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準已達到相當的水平。這些，連中國共產黨也是不能否認的。目前，台灣處於經濟轉型期，即由加工、出口型工業向現代化、機械化的製造業演化和提升。這種轉型，必然伴隨着觀念

的轉變，同時，也必然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經濟轉型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觀念轉變和政治環境兩大因素。

與經濟發展相比，台灣政治發展情況顯然要遜色得多。

首先是長期軍事戒嚴法的實施，極大限制了島內民主的發展，給海內外同胞留下了惡劣印象。

其次是戒嚴法下的黨禁，已成為走向民主政治和多元政治的瓶頸。

第三是言論尺度仍牢牢控制在官方。官方缺少法治觀念，依自己的意願和需要，隨時可以查禁民辦刊物。

儘管台灣在民主化走向方面，需要突破這些瓶頸，做為理性的判斷者，我們也承認另外一個事實，即：民主化是相對的，與大陸相比，台灣民主化已在若干方面走在前頭。

第一是台灣允許民辦刊物，允許持不同政見者在一定範圍內批評政府的路綫和政策。

第二是容許黨外人士和執政黨競選縣級政權和民意代表。一些激烈的反對派人士已被當選。

第三是人身自由方面多於大陸，如遷居、尋求職業、出國等等。

我們認為，這些民主化方面的進步，是在台灣人民及黨外力量的奮鬥、壓力下，執政者中開明派對人民實行讓步政策的結果。

最近，我們看到，台灣島內局勢有了新的演變。一是國民黨內開明派在與八股派的較量中，表面上看，暫時佔了上風；二是由於複雜的內在及外在原因，台灣黨外力量在最近的選舉中，遭受到了暫時的挫折。我們正在密切關注這些演變對台灣民主化走向的影響。

總結起來，我們對台灣民主化進程的看法是：①比較而言，先於大陸；②台灣民主化方面的一些進步是人民爭取來的；③和先進民主國家比還相差甚遠，需繼續改進；④需要突破幾個政治瓶頸，才能結束獨裁主義政體。

（二）對台灣前途和祖國統一的想法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極為關注台灣的前途和祖國統一大業。

關於台灣的前途問題，我們的基本觀點是：

①我們認為，台灣獨立是不可行的，並反對台灣獨立的理論基礎「台灣民族論」和「台灣文化論」。但是，我們必須把要求台灣民主與主張台灣獨立嚴格地區別開來，絕不能把黨外勢力統統打成台獨。就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士來說，我們

也要加以分析。其中相當一部份人是因爲懼怕共產黨佔領台灣，又看不到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希望，才附合台獨論調的。我們要做這部份人的工作，把他們引導到反對共產黨集權專制的方向上來。

②我們認爲，穩定的台灣對鉗制中國共產黨、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是一個因素。但是，如何促進台灣的穩定，確是一個重要的、值得探討的問題。一種論點是，維持政局穩定，必須由戒嚴法做保證。開放黨禁會造成台灣大亂，因此，黨禁是開不得的。這種看法，我們不敢苟同。如果以中共威脅做爲限制民主藉口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不是也可以以蘇聯的威脅爲藉口，限制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嗎？我們認爲，台灣今日較爲穩定的政局，是不斷擴大民主尺度的結果。只有繼續推進民主進程，讓各種意見充份發表，給各種力量，各種派別和平競爭、和平參政的平等機會，才能促進社會的穩定。強權壓服，可以暫時穩住局面，但會埋下危機，釀成將來的動亂。

③台灣當局必須克服偏安心態。當我們和來自台灣的留學生和移民談起台灣的前途時，很多人都認爲，台灣當局目前有明顯的偏安心態，主要表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和談統戰宣傳應對無力，處處被動，採取了三不主義的作繭自縛的作法。結果，給人的印象是：台灣當局只想保住台灣，偏安於一隅，並沒有以民族大義和以祖國統一的大業出發，好像稍一鬆動政策，台灣就會亂掉了，連一個保身的地方都沒有了。

現在，台灣的出路有三：一是獨立，二是武裝反攻大陸；三是與大陸和平統一。前兩種可能性是很小的，只有第三種出路較爲現實。其實，談判並非共產黨的專利，談判並不意味着投降，談判桌是最好的攻心戰場和宣傳場合。

台灣的光明前途是自保和偏安換不來的。愈偏安、自保，結果愈是不能自保。台灣朝野，只有將保守心態轉爲開放心態，將偏安心態轉爲攻取姿態，將被動姿態轉爲主動姿態，才能有助於大陸問題的解決。大陸問題解決了，台灣才有光明的前途。

對待祖國統一問題，我們認爲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與國民黨進行兩黨談判即能解決問題的觀點是狹義的。祖國統一不是兩黨的私事，因此，葉劍英的老九條和鄧小平的新六條都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的宣傳。我們主張談判，但絕不限於國共兩黨，談判時應有其他政治力量和民意代表的廣泛參與，至少須有第三者的監督、評判。在這種多方談判的前期，海峽兩岸人民要加強溝通和了解，彼此熟悉對方的建設狀況、政治環境和民衆心態。在此基礎上，召開有各黨派的代表、民

意代表、無黨派人士代表、僑胞代表、港澳同胞代表參加的國民大會，制訂統一的憲法。爾後，多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在統一憲法的原則下，進行各級政權的競選，由人民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執政者。

所以，我們認為，國家不可能在一個主義下統一，而只能在一個法律下統一，這個法律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這個憲法本身要保障各種主義，各種理論有表達的自由，有和平競爭的權力。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也是中國之春追求的目標。以上是我們對祖國統一問題的基本態度。

第三部份：香港問題

香港正面臨着1997問題的困擾，不少香港同胞，還為此大感徬徨。香港要回歸祖國了，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爲什麼香港同胞一聽到共產黨要收回這個小島的主權與治權便顯得如此徬徨？當局把一切反對它收回香港的人都指爲不愛國，然則什麼叫愛國？

共產黨一向把國家與政權混爲一談，鄧小平也說，愛國不能是抽象的，總得愛一個實在的東西，而今天的中國人，要談愛國就得愛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根據這種邏輯，國家由政權加以具體化，政權由黨來領導，因此，愛國就等於愛政權，愛政權就等於愛黨，於是卒之得出反黨就等於反國的結論。這是何等奇妙的邏輯！難道鄧小平不知道，中國共產黨還只有幾十年歷史，而中國作爲一個社會組織却已經存在了幾千個年頭？共產黨可以或者在今天，或者在明天完全解體，而中國作爲一個國家却會持久存在下去。愛國者不但可以反對國內的政權，而且，如果那個政權是有礙於國家民族的存在與進步時，愛國者還有神聖不可推卸的責任要去反對它。

香港人一聽到共產黨要收回香港就感到害怕，爲什麼北京的當權派不好好想想：問題究竟出在那裡？

一個令自己的百姓一聽到就憎惡、害怕的政權，居然還有勇氣自認代表人民、代表國家，這怎麼不令人驚怪？

我們相信，香港同胞的擔心完全是道理的。也知道香港人反對的不是中國收回香港主權，而是共產黨接管香港。誰都知道，香港的繁榮是靠島上中國同胞的努力換取得來，「港人」當然有能力把香港搞好。大家不相信中共的「港人治港」辦法可以保持香港繁榮，絕不是人們對「港人」沒有信心。「港人」不是不可以治港，問題是在於中共的介入。一個國家有兩種體制雖然不一定完全不可能，

但是，希望在專制政權下出現一個超然的民主、自由體制，那倒實在是不可設想的事。任憑共產黨現在作出何等承諾，也不管他們今天許諾時的心態是否真誠，只要是以當局現在這樣的政權接管了香港的主權與治權，香港的繼續繁榮便是不可設想的事。

當然我們也知道，香港問題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鄧小平及其同伴不想做「李鴻章第二」，那當然非收回香港不可。然而收回之後怎麼辦？我們先假設收回後可以「保持繁榮」，到那時，當局必然會面對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所有別的城市和省區，都會振振有詞地要求走「香港道路」。反正是在一個國家之內，爲什麼香港人可以行的制度，他們不可以行？這一來，整個現有國家體制便被否定。

反過來，假設收回主治權後香港不能保持繁榮，人民馬上就會群起而攻之：香港已經不是爛攤子，連這樣一個繁榮的現代化城市落在共產黨的手上，在共產主義體制下都會迅速衰落下去，請問共產黨還有什麼足以證明跟着它走會有前途？還有，一旦香港爛下去了，共產黨如何安排島上的幾百萬人？弄得不好，這幾百萬人隨時都可能變成革命的火種。

看來，香港問題很可能成爲解決整個中國問題的突破口。香港同胞爲着切身利益，也爲着整個國家民族，應該表現得更加積極主動，徬徨是沒有用的，等待也等不出什麼好結果來。請願式的籲請延長租借期或者乞求如何在當局的「港人治港」方案中多得到一點自由、民主，都不是最好的辦法。十三年不是一個短日子，十三年可以做出很多事情來。與其老在「港人治港」的「小憲法」中打圈子，還不如協力促生出一個民主自由的大憲法來。只有整個中國搞好了，香港才會有希望，香港的民主自由，要以國家的民主自由爲前提。協力促進祖國在政治上的民主化，應該是香港同胞的唯一出路！

在現在的形勢下，我們主張香港各階層人民要組織起來，形成壓力團體，逐漸向政黨過渡，爭取在一九九七年時由各政黨進行競選接管香港，成立一個民主的地方政府，給整個中國民主政體的建立樹立一個樣版。十三年說來時間不短，香港人民可以大有作爲；十三年也不算太長，一幌而過，香港人民要立即行動，就從今天開始做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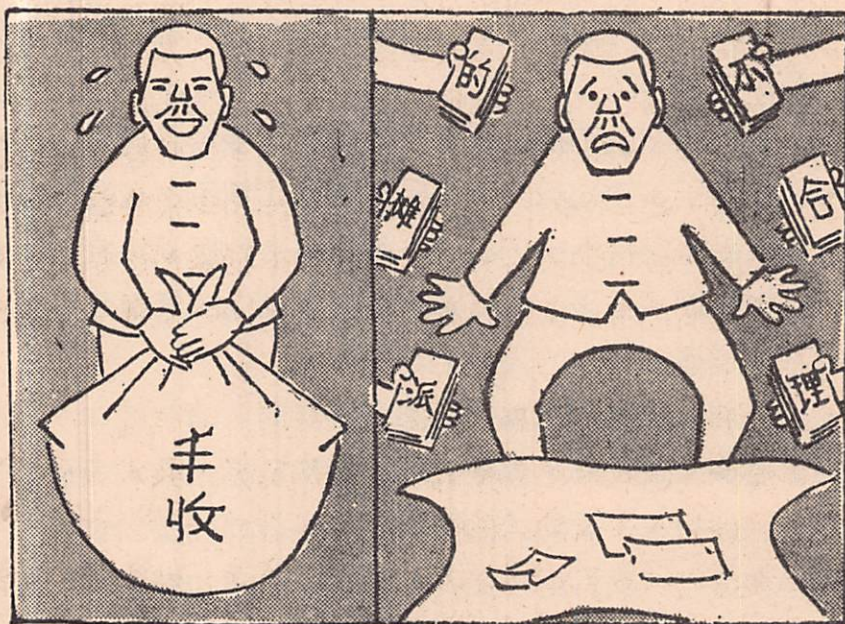
同志們，國內的形勢對民主運動的開展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我們不應該被

這種有利的形勢冲昏了頭腦，我們應該理性地、客觀地研究資料，科學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理論，恰如其分地決定我們的方針和策略。世界的政治潮流正在走向理性，一切感情用事，一切無知幼稚，都是無濟於事的。我們既反對無所作爲的悲觀主義，同時也反對心急冒進的盲動主義。只要我們掌握好分寸，腳踏實地，就能一步一步地把運動向前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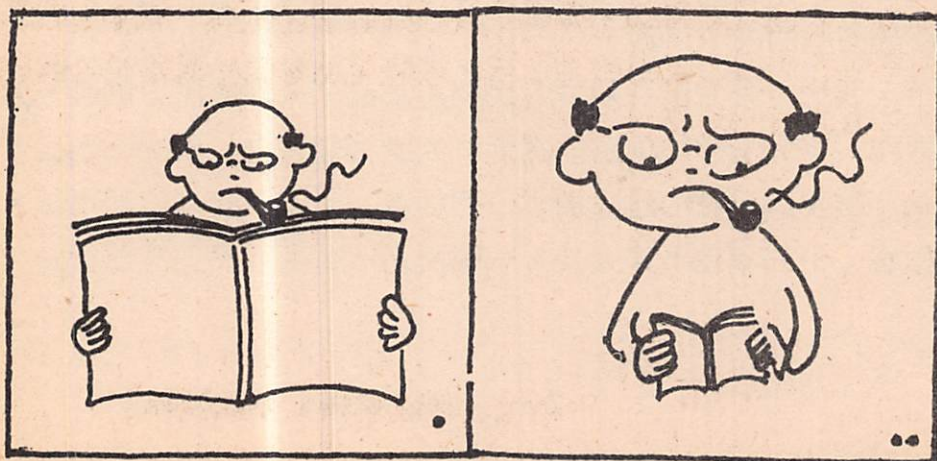
分析形勢是爲制定政策服務。希望代表們認真研討。

大包………干

陈跛子



原載《讽刺与幽默》



知识转移

毛铭三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給趙紫陽總理的公開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趙紫陽總理：

首先，我們歡迎您訪問美利堅合衆國。我們希望您的這次訪問，將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

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發起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一年來，獲得了海外各階層華人熱烈的響應和廣泛的支持。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來自北美、歐洲、澳洲、日本和港澳的持不同政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代表、大陸新移民代表、台灣和香港留學生代表、海外知識份子及各界僑胞代表，在美國紐約召開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一個新的持不同政見的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成立。我們組織的宗旨是在中國推行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權和自由，其主要負責人和很多成員都是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中國公民。我們認為，中國在過去幾年的經濟改革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要使中國真正走上民富國強的道路，必須從根本上變革中國現有的專制制度。

在您訪美之際，我們鄭重地向您提出：

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結社自由的條款，要求「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中國大陸合法註冊，做爲合法結社而存在；

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出版自由的條款，要求「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中國之春」在中國大陸註冊、出版和發行；

三、要求釋放在中國大陸獄中的一切持不同政見者。

四、「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要求與以您爲首的中國代表團會見和商談。既然中國共產黨一再提出願意與國民黨和談，那麼，就沒有道理拒絕與一個中立的團體會談。如果這次您率領的中國代表團行程已滿，我們可以等待中國政府今後組成代表團，在適當的時機與我們接觸。

順祝

旅途愉快！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

一九八四年元月九日

林希翎

致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公開信



同胞們！朋友們！

您們好！您們的邀請信我早已及時收到，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我未能如期前來出席您們的會議，很遺憾，請原諒。

當去年某月一個夜晚，我從收音機的“美國之音”節目中聽到“中國之春”成立的消息時，我的心情就像五七年參加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大鳴大放運動；一九七五年偷看到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一九七六年聽到天安門事件；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在北京看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和民刊一樣地來得激動和興奮，因為我又一次地看到了中國每個歷史時期，都必然會產生出一批覺醒者和先驅者，而這種角色往往都是由學生和青年來扮演的，從中

國的五、四運動以來直到您們，儘管各個時期的統治者在鎮壓民主運動、迫害進步學生和民主青年所採取的殘酷手段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民主運動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進步學生和民主青年則是鬪不怕、整不死、關不絕、殺不盡的。當然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而慘重的，但民主這個接力棒在前仆後繼中總有人會接過去繼續前進的。對於我這個也曾高舉過民主接力棒的老運動員來說，“中國之春”的誕生和成長，當然是一件值得慶幸和欣慰的事。所以儘管我迄今為止對您們還不夠了解，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對您們的觀點和主張也會有所分歧，加上我這個人的性格就是天生的自由主義者，受不了任何組織的什麼紀律約束，說話行事總是習慣於無拘無束，獨來獨往，因此我沒有也不想參加任何組織，（當然包括您們的組織。）但是我僅僅從感性和直觀出發，我感到并相信您們的動機是純正的，您們的精神是可貴的，您們的大方向是對的，您們是一群可愛的年青人，八十年代的民主戰士。我向您們致敬，向您們學習！我是您們天然的盟友，因此在香港和法國我都是敢於公然的支持您們的，我會去香港的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去巴黎的“中國研究中心”、巴黎第七大學的幾次公開演講中都提到過您們，為您們當義務宣傳員；我也會去一些對您們發生誤解的“權威人士”面前極力為您們辯護過，例如在港時我曾與發表過批判您們的文章的“鏡報”月刊的董事長徐四民先生在他宴請我時為您們的事當眾與他唇槍舌戰過，曾駁得他啞口無言和狼狽不堪。又如，最近不久前率中共代表團訪法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勛與駐法的曹克強大使一起會見我時，我除了對國內當前這股破壞民主與法制又向左轉的反右冷風，向中共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意見之外，也曾向他們提到您們的事，我表示要去

參加您們在年底召開的世界大會，習老很是反對，他說您們是接受了台灣國民黨的指示，搞的這個“中國之春”，雖然對於習老本人我是很尊敬的，因為他不僅是我的同胞，而且是我的難友（因他對我說，他被毛澤東也關了十六年，比我還多了一年。）他在百忙中能抽空會見我，對這位革命老前輩在塞納河畔與我結下的忘年之交以及他對我的真誠關心我是珍惜和感謝的。但是在如何看待您們這個問題上我和他還是發生了爭論，並且爭得面紅耳赤。我不知習老這種“情報”是從何得來的，但我是不能相信的，因為我想您們是一群生長在紅旗下完全是共產黨親自培養起來并包送出國留學的留學生，既然對連有着養育之恩的恩人的話，都會產生懷疑，也可以不聽，那難道對恩人的仇敵的話會深信和服從嗎？我相信您們肩膀上長的不是冬瓜，而是腦袋，這腦袋的功能是會獨立思考的。把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提意見者，不同政見者打成國民黨推到台灣一邊去，這是中共極左派官僚歷來整人的一種慣技，這當然也是一種最省力氣最簡單的辦法，別說在對付我們這些黨外的普通老百姓，青年學生中的不同政見者用這種辦法，就連共產黨的功臣，老帥彭德懷，毛澤東當年整他時也曾稱他是“蔣介石”。卅多年來共產黨就是用這一法寶給國民黨免費培養、製造、輸送了千千萬萬的“國民黨”，無怪乎蔣家父子黨怎能不欣喜若狂地統稱他們為“精神黨員”呢？其實共產黨這一法寶也不是自己發明的，恰恰是繼承國民黨的衣鉢，凡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過的老百姓都知道這一點，誰要是對國民黨的政治稍有不滿，發表了一點不同政見，國民黨就會給你扣紅帽子，說你是“共產黨”，當年的共產黨就是國民黨這樣所一手製造、培養出來的，當然，在許多方面實在是青出於藍勝於藍，所以，我常常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才真正是父子黨或兄弟黨，他倆雖然是冤家死敵，但却是同一個母胎——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裡脫胎而出的一雙難兄難弟。

最後，我想給您們提幾點建議和希望，以供參考。

（一）中國雖然仍是那麼貧窮、落後，很多地方還停留在中世紀的野蠻和愚昧狀態，近一個世紀以來她既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民主政黨，也未造就過幾個像樣的領袖，與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國家相比，中國民族近百年來所受的苦難是最深重的，但是她畢竟是我們的祖國，常言道“兒不嫌娘醜”，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兒女，炎黃子孫，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可忘本，更不可傷害她，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做個堂堂正正的有骨氣的中國人。

（二）從中國以及全世界來看，現在的歷史都是處於一個革命低潮和政治冷感時期，尤其因為以往發生過的歷次革命，付出的代價太大，造成的危害後果太重，而成果甚少，所以人們對革命已是普遍的厭惡和懼怕了，特別是在中國。所以您們千萬別在這時候鼓吹什麼革命，那是會把人們嚇跑了的，沒有成熟的客觀歷史條件，硬去鼓吹和製造革命，那只能導致犧牲和失敗，也給社會製造了動亂和破壞，我不贊成。

（三）現在關於建國以來中共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在體制上的各種弊病，凡明眼人都是可以看到的，連中共自己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承認和反省，所以毛病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問題在於怎樣醫治，有什麼捷徑、良方，中國今後究竟向何處去？怎樣改革？我希望您們在這方面多作些深入的討論，多提一些建設性的意見。

（四）我希望您們集中精力把“中國之春”辦好，以這個刊物為陣地在華僑中聯繫和團結一批真正關心中國命運的志士仁人、愛國者。要化一定的時間進行理論探討，過去現成的理論，有許多都已過時和陳舊了，有些老名詞，如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等概念已經不能科學而準確的反映現實了。新的名詞、概念，新的理論要靠我們去探討和創造，這就得好好的學習，希望您們切切實實地為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做些有益的事。

您們對我的關心和支持，我在這裡向您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最後希望您們的大會能開得熱烈，開得有生氣。美國我是一定要來的，但具體的日期現在還很難定，總之，我們一定後會有期。

遙祝弟兄姊妹們

聖誕快樂！

新年進步！

您們的朋友

林希翎匆草於
一九八三年
聖誕節前夕
巴黎

兒木鐵經

致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公開信

同志們：

我很榮幸獲得中國之春大會之特別邀請，但因賤務而暫不能出席，謹以萬分抱歉之意告罪及請求諒恕，同時以熱烈的祈望恭祝大會的會議成功。

蒙古民族及鐵木真家族是永遠保證尊重不同的意見，以真誠的友誼聯系海內外的中國人、各民族、及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及一切不同政治見解的黨派並及世界上待我以平等之民族，推崇為整體中華民族的確實有益與合理之措施。但誠懇地要求徹底取消「打倒」兩字及不使「惡意中傷」與「小丑把戲」的言行發生，這些要求的對象包括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在內。

我建議製訂一個“中華聯邦影子憲法”，這個憲法草案務求適合海內外中國人及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蒙古、哈薩克、維吾爾、滿族、藏族及

其他少數民族，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復興進步，望求在我們這一代開始。我不是什麼專家，只可勉強略有經驗，並承了家族在歷史成敗中取得的結論，敢厚顏毛遂自薦，笨鳥先飛，在六個月之內，草擬一份提綱，作為大家製訂的前奏。

無私的、友誼和平而坦誠的大家坐下來研討是好的，我希望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都能出席下一次中國之春的集會。

謹祝會議成功！

成吉思汗家族第廿三代內部繼承人

兒木鐵經

公元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

成吉思汗家族第廿三代內部繼承人

兒木鐵經



公元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

老Q新傳



柏仁

——續——

迎合時代 全憑天才

一些史學家悄悄評論：阿Q在偉大時代扶搖直上，青雲萬里，成爲時代寵兒，這是天數所定，命運使然。

這樣評論，未免抹煞了阿Q的天才。必須承認，阿Q是個天才。這一點，魯迅在「正傳」裡早有全面介紹。只要重溫「正傳」，便可一目了然。

譬如，阿Q雖然沒學過馬列主義哲學，但他却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從來就把物質放在第一位，而絕不把精神放在第一位。例如，阿Q喜歡喝黃酒，只要口袋裡有銅板，一定光顧「咸豐酒店」，絕不喝白開水，盡管白開水能培養克勤克儉的奮鬥精神。現今的唯物主義者，人人喜歡喝茅台（阿Q現在也不喝黃酒了），連二鍋頭都不屑一顧，盡管二鍋頭是勞苦大眾的飲品，偉大領袖還號召向勞苦大眾學習。同樣信奉唯物主義，阿Q比他們早幾十年。

阿Q不僅是徹底唯物主義者，更是辯證法大師。事事深謀遠慮，一切從政治需要出發。

例如，阿Q早已料到：在革命勝利，反動派被打倒之後，革命階級內部就產生敵我矛盾，對內部敵人，必須和對外部敵人一樣，絕不能手軟。所以阿Q早年要做白盔白甲的革命黨時，就已經想到，一旦革命成功，不僅趙太爺、錢太爺和假洋鬼子要殺掉，就連小D和王胡也不能留。後來在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鐵運動中，給他們扣上反革命帽子，便是根據辯證法採取的革命行動，絕非胡做妄爲。當代辯證法大師，在文革之中把同志和戰友定爲走資派，同樣是根據辯證法，但是也比阿Q晚了幾十年。

阿Q不祇是徹底唯物主義者和革命辯證法大師，且革命政治思想也早熟。他在二十年代的許多創造，人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今日，仍然遵照奉行。

譬如當代政治家的一個重要信條是：「永遠勝利。」所以任何時候都說：「各條戰綫都取得了偉大勝利！」、「形勢一派大好！」絕不說不好，更不說失敗；即使是完全徹底的失敗，也必須說：「全面勝利！」所以三十多年來，報紙和電台一直高呼：「戰無不勝」、「無往而不勝」或「永遠走向

勝利」。倘若失敗得昭然若揭，實在無法掩蓋時，也絕不承認失敗，而是另有招式。那就是把一切歸於階級敵人的破壞，從而對地富反壞右和一切牛鬼蛇蛇實行專政。這樣最後宣佈的，仍然是偉大勝利，因為對階級敵人的鬥爭是絕對勝利和永遠勝利。

這個信條也正是阿Q在未莊時代早已信奉的。只是那時阿Q不會說「勝利」或「失敗」，而是說「贏」或「輸」。那時阿Q就懂得，必須事事說贏，絕不能說輸。那怕是大把銀子流入別人的腰包，也絕不能說輸，而是用「精神勝利法」，化輸為贏。推而廣之，被人打了，也不能承認挨了打，而要說：「這年頭太不像話，小子打老子。」完全錯了，也絕不能認錯，而要說：「這世道太媽媽的了！」即便是輸光或被人打痛，而又實在不能自圓其說時，也絕不承認，而是另打主意——那就該靜修庵的小尼姑倒臺了。他會在可憐的小尼姑臉上狠狠地擰上一把，把一切惱怒統統發洩在她的臉上。小尼姑沒有反抗餘地，也不敢反抗，因此阿Q是絕對勝利和永遠勝利。

請看，前者後者，何其相似，但還是阿Q領先幾十年。

當代政治家奉行的另一信條是：「緊跟！」黨員緊跟書記，下級緊跟上級，地方緊跟中央，全國緊跟偉大領袖。

這個信條，同樣是阿Q在未莊時代奉行過的。當年趙太爺的兒子中了秀才，鑼聲鑼鑼地報到莊裡，阿Q立刻手舞足蹈地說，這於他也光彩，並宣稱他也姓趙，和趙太爺是本家。雖說那次沒跟對，挨了趙太爺一個嘴巴。但阿Q畢竟懂得緊跟的意義。再則，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當未莊紛紛傳說革命黨要進城時，阿Q當即宣佈：「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命。」這足以證明：阿Q當年不僅緊跟未莊的形勢，而且緊跟全國形勢了。

由此可見，解放以來，阿Q緊跟歷次政治運動，緊跟偉大領袖的偉大戰略佈署，完全是天賦使然，不足為奇。

統觀阿Q早年的歷史，不可不承認，阿Q既有哲學家的天才，又有政治家韜略。在偉大時代的政壇上成爲一位風雲人物，乃是在實踐中奮鬥的結果，絕非只靠天時和命運。

領導訣竅 阿Q精通

在神州大地，倘若既有馬列主義哲學天才，又有無產階級政治思想，大則可成聖人，中則可成賢人，小也可成完人了。聖人、賢人、完人，無疑是



阿Q居然在賭攤上贏了一次錢。

國家棟樑、社會中堅。國家由聖賢來領導，乃天經地義。

阿Q雖說尚未達到聖人水準，但是在賢人以上，無可爭議。因此國家任何事業都可以領導，是必須相信，而無需懷疑的。

因他終究是農民出身，所以首任是領導農業。據紅衛兵專案資料記載：似乎是國務院農林口。雖說負責農林口，但上任之後，阿Q考慮的不是農林，而是政治。他的天才也不在於農林，而在於哲學和政治。他深知，在神州大地，搞啥都得搞政治。他懂得，搞政治就是高舉偉大思想紅旗；「舉旗」——就是按最高指示辦事。因此他的當務之急，不是研究農業和林業，而是背誦領袖語錄。

偉大領袖關於農業的語錄最簡單，就是「農業八字憲法」。這八個字，阿Q雖然不完全明白，更不完全會寫，但是却背得一氣呵成。

就在他背熟之後，忽一日，一個外國農業代表團，來中國參觀人民公社。按照外交部的禮賓程序，領客人參觀過先進地區之後，由首長接見。代表

團由該國農業部長率領，本應由中國農業部長會見。但因來自友好之邦，出動高一級首長會見，更表親密。於是阿Q便出場了。團長恰巧是一位農學家，對作物栽培，頗感興趣，寒暄之後便問道：

「人民公社的作物，長勢很好。請問你們種植和管理的規程是什麼？」

譯員譯過之後，阿Q泰然答道：

「偉大領袖的農業八字憲法！」

那團長一聽，頗感蹊蹺。點點頭又問道：

「貴國的農業生產也按憲法進行？」

「對！」阿Q傲然相對。

那團長更迷惑了。心想這是一部甚麼憲法呢？只有八個字？於是又問：

「這部農業憲法，只有八個字嗎？」

「不錯！」阿Q更加傲然，接着唱出八個字來：土、肥、水、種、密、保、管、工。

譯員不愧是一位佼佼者，不只譯每個字，還要把含意解釋一番。但他終究不是農學家，又非偉大思想研究家，因此八個字的意思，並非個個都清楚。例如這「密」字，他就忘了，其含意是「合理密植」。急忙請教阿Q。阿Q哪裡知道。但是阿Q明白，譯員不懂不為過，主管農業的首長不懂，假洋鬼子們一定開心，於是他諧音生意地對譯員說：「密就是蜂蜜！」譯員一聽，「密」、「蜜」本不同意義，怎能是蜂蜜呢？種田和蜂蜜有啥關係？他想再問，但一看首長面色嚴肅，立刻悟到自己是當然的假洋鬼子，少惹事生非為妙，無奈只好譯成Honey(蜂蜜)了。團長懵然，無從理解，連問：「你們的種子播下之前，還要加蜂蜜嗎？」譯員只好連答：「Yes！」

接着是那「保」字，譯員忘了，意思是「水土保持」，不得不再問首長。阿Q立刻答道：「保證豐收。」譯員知道不對，但是首長斬釘截鐵的回答，這是不容爭辯的權威，也只有照譯了。團長聽了，雖然不甚滿意，但比「種子加蜂蜜」易懂。

儘管阿Q的回答令人莫測高深，這位團長也還不虛此行，總算學到了新鮮玩藝兒——中國領袖的「農業八字憲法」。這是他半生研究農業，在任何一部農學著作中都未見到的，尤其是「種子拌蜂蜜」。

至於阿Q，回答如何，無關緊要。客人並不知是否正確。種子拌蜂蜜可獲豐收，客人也是初次聽到，能否奏效，要經過試驗才能做出結論。

至於譯員知道阿Q欠妥，這與他何干？他的責任是全心全意為首長服務，職責之一，便是維護首長威信，絕不許有些微放肆，否則五七年的教訓堪慮。

退一萬步講，阿Q的「水準」被揭穿，被傳開，又能怎樣？偉大領袖看幹部，一向重本質和主流。貧農出身，這是本質；高舉偉大思想紅旗，這是主流。阿Q擁有這筆政治資本。一切不在話下！

阿Q進京，這件事本身就是偉大思想的偉大勝利。——偉大領袖的光輝論點，由此得到證明：工農份子完全能領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打破了亘古以來的「讀書做官論」，證明不讀書也能做官。因此偉大領袖對阿Q十分滿意。在中央會議上，偉大領袖稱讚道：「老Q，你幹得不錯！敢對付洋人。不要怕洋人，在他們眼裡，我們也是洋人嘛！」

受到領袖公開表彰，阿Q更加意氣風發。他覺得既能戰勝國內的假洋鬼子，也能戰勝外國的真洋鬼子。他充滿勝利的信心。

阿Q的信心，似乎偉大領袖已經看到，不久便調他去管文化了。

領導農林口的勝利，令阿Q找到一個領導訣竅，這就是：背語錄——按最高指示辦事——高舉偉大思想紅旗。偉大領袖對各部、各行、各業，都有語錄，所以只要掌握這個訣竅，就可以領導各部、各行、各業。阿Q認為偉大領袖比馬克思都偉大，至少能和馬克思平起平坐。這令他對偉大領袖，更加無限信仰，更加無限崇拜。

由於阿Q掌握了這個萬靈的訣竅，因此到任何部門擔任新職，首先背誦偉大領袖關於該項事業的語錄。關於文化的語錄，阿Q早已背得滾瓜爛熟，一直等待外國代表團光臨，以大顯身手。

為啥阿Q到任何部門任職，都要接見外賓呢？偉大領袖有指示，必須叫外國人知道：中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央高幹也是真正的工農份子。

不久，終於有一個文化代表團來訪，似乎是來自葡萄牙。在樣板單位參觀之後，榮獲阿Q接見。阿Q一聽這國名，不禁一怔：媽媽的，這是個啥國，葡萄還長牙？心中叮囑自己：馬上準備好語錄！

一陣閒話之後，進入正題，客人當頭問及中國發展文化的方針。阿Q應答如流：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客人對這兩句詞很感興趣，遂問這項是怎樣制定的。

「這是我們偉大領袖親自制定的。」

阿Q提高嗓門答道，以為一定能贏得幾分敬意，然而出乎所料，客人竟然表示反感：

「貴國的文化方針，為何不由文學家、藝術家共同制定，而由領袖一人制定呢？」

「因為我們偉大領袖的偉大思想，那是……那是……」

一離開語錄，阿Q立刻亂了章法。他本想說：「偉大領袖的思想，必須統帥一切！」但這話到文革後才學會，這時他只聽過幾次，只記得大意，沒記住原文。想來想去，他想說：「偉大領袖的思想，那是能管一切，治一切。」但他覺得不夠生動，沒有力量。左思右想，他終於想到能管一切、治一切的名藥——萬金油，遂脫口而出：「偉大領袖的思想，那是真正的萬金油！」

譯員一聽，不禁暗吃一驚：Q首長對領袖何等不敬！怎能將偉大思想比做萬金油呢？多虧他是一位老手，會用「統帥一切」這四個字。遂嚴肅地對客人說：

「在我們國家，偉大領袖的思想統帥一切。」客人感到氣氛一度緊張，沒敢再問，便轉了話題：

「貴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典籍十分豐富。可是書店裡却很少古書。想買『四書』、『五經』都沒有。」

譯員譯過之後，怕首長沒聽明白，特別強調：「客人問：為什麼買不到『四書』、『五經』？」

阿Q一聽『四書』、『五經』，霍然答道：

「四卷寶書一直不斷出版，已經發行千萬冊，到處都有。怎麼買不到？『五卷』正在編，很快就會出版。」

譯員一聽，答非所問，只好自己向客人說明：「我國當前的任務是普及偉大領袖的思想，所以領袖著作出版最多。古籍並非完全不出，『四書』、『五經』也曾出版，客人需要，可以奉送一套。」

這一番解釋，總算應付過去了。

但客人又問，中國古典戲曲非常精彩，為什麼只演幾個樣板戲？

阿Q明確答道：

「這樣板戲是夫人同志親自栽培，偉大領袖最贊成，所以就演。那些古戲，還沒經過夫人同志培育，先不能演，等培育之後才能演。」

客人一聽，大惑不解。——這又是什麼方針？演古戲還要經過領袖夫人培育？但是客人知道，中國人最忌諱干涉內政，沒敢再問。

這位團長三十年代到過上海，知道夫人只演過電影，沒演過京戲，於是問道：

「第一夫人過去只做過影星，和京戲似乎隔行……。」

阿Q沒等譯完，劈頭回答：

「外行必須領導內行！」

客人一看，主人面色大變，頭上的疤也泛起紅來了，不敢再問，只好禮貌地告辭。

此事很快匯報到夫人耳裡，風顏大悅，當即表

揚阿Q：「擁護樣板戲，立場堅定，觀點鮮明。雖然語言粗俗，正是工農幹部的特色。」

阿Q受到夫人表揚，自是非常高興。他覺得自己不僅是個稱職、勝任的中央高幹，而且也是「萬金油」首長了。

不錯，阿Q確實能管一切，不久便轉任科學院了。阿Q認為管科學比管文化更容易。根據是偉大領袖關於科學的語錄，比文教的語錄少許多。就他所知，只有兩條。一是「科學必須為生產服務」，一是「反對理論至上」。這兩條語錄，阿Q不僅背得很熟，且理解得很透。上任伊始，便下令秘書：制定全國科學改革方案，堅決貫徹這兩條語錄。

第一，科學必須為生產服務。方案規定，科研項目必須和生產密切結合，取締一切脫離生產的科研項目。例如科學院以及大學生物系的脊椎動物研究所，必須以研究馬、牛、羊、豬為限，其它動物，一律不准研究（但鹿不在此限，因「特供」需要鹿茸和鹿心）。鳥類研究所，以研究鷄、鴨、鵝為限，其它鳥類，一律不准研究（但鵝鴨不在此限，因特供需要鵝鴨肉及鵝鴨蛋）。研究觀賞鳥類者，均以修正主義論處。

第二，反對理論至上。一切理論研究，嚴格禁止！甚麼『相對論』、『量子力學』，還有甚麼『哥德巴赫猜想』，這些玩藝兒，抓不着、看不見、嗅不到、全是空口說白話，巧立名目，浪費人民血汗。要錢學森，不要華羅庚；錢學森能造火箭，華羅庚有啥用？叫他改行！

方案還規定：今後的數、理、化教科書，不准再用洋文字母，什麼 $x y z \alpha \beta \omega$ ，統統改成中文字。中文字那麼多還不够用嗎？

秘書完全領會Q首長的意圖，擬定方案，不僅內容完全符合首長指示精神，文字上也表現了阿Q的風格。恭讀給首長聽後，阿Q默默首肯。雖說不懂其中『相對論』之類的名詞，但對方案精神，十分滿意。遂寫上「付印」、「照發」四個字，並在下方劃上一個很大的「Q」字。——這簽字雖然是進京之後才學，但簽得不錯，因為當年就會畫「O」，只在下部加個小尾就夠了。

阿Q的改革方案下達之後，中國科學、各省分院、各研究所以及全國各高等院校，頓時大譁。但這是全國科技系統最高領導簽署的權威文件，誰敢反對？誰敢拒絕？莫忘一九五七年！

不過「忠君愛國」是中國人勇氣的源泉。有幾位當年受到偉大領袖接見的資深科學家，毅然上書，冒險陳詞。但是偉大領袖闖後馬上批示：

老Q的意見，即中央的意見！

老Q的指示，即中央的指示！

阿Q獲悉之後，拍案大罵：「這群假洋鬼子，還反對外行領導！本性難改！」

從此阿Q的地位更加鞏固。那幾名「忠君愛國」的書獃子，多虧受過偉大領袖接見，阿Q暫時饒了他們，沒扣帽子，只撤銷一切職務了事。

文革驟起 阿Q 遭殃

自一九五七年以來，神州政壇上升起的衆多新星之中，最高、最亮、最令人眼花撩亂者，莫過於阿Q了！阿Q自己也覺得，這七、八年的歲月，真可謂如夢如幻，族譜罕見了！

但是，阿Q自幼性格上有個小小特點，就是：得意便忘形，忘形便遭難。比如早年他在賭攤上贏過大把洋錢，腰包一度空前膨脹。當時便飄飄然得意而忘形了。其結局是，忽然賭徒們打起架來，大亂一陣，他的洋錢全不見了，而且身上有幾處很痛——他挨了打。這樣的事例在「正傳」中有許多記載。但是俗云：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阿Q正是這樣。

時至一九六六年，由於連綿晉升，大名遠揚，受過偉大領袖稱讚，又受過夫人同志表彰，阿Q像當年一樣，又飄飄然了。他覺得阿Q二字光芒四射，響噹噹，噹噹響。他覺得自己像春天的風箏一樣，拔地而起，一口氣升到天邊，向下望去，真是高高在上，一切全在眼下。

不料就在這當兒，風雲突變，狂風驟起，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這場運動，非同小可，好似呼啦一聲，刮起十二級颱風。剎時間天昏地暗，一切陷入了災難的深淵。阿Q那風箏錢被吹斷了，他被捲入了漩渦之中，不斷地翻滾，不停地旋轉，幾個回合——他便昏過去了。

「這叫啥運動呀！」阿Q清醒過來時自言自語。是的，這是啥運動？阿Q從未見過這樣的運動。這場運動可太奇怪了！簡直是反常！以往歷次運動，都是偉大領袖發出黨內指示，各地書記掛帥，自上而下，運動群眾；這次運動，却是他老人家發動學生成立紅衛兵，自下而上進攻；以往歷次運動，都是從群眾中抓五類份子，牛鬼蛇神；這次運動，却要從黨員幹部中抓走資派。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幹部是先鋒隊的骨幹，哪兒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怎麼回事？怎麼一切都倒過來了？這真是牛犢向廚師開刀了！

阿Q曾經想過：這大概又是他老人家搞「陽謀」吧？但再一想，不對。五七年是「引蛇出洞」，如今是號召紅衛兵揪出黨內走資派，完全不同。這

究竟是怎樣一場運動呢？

「無論如何，這是偉大領袖的偉大戰略佈署，只能緊跟，不可懷疑！」阿Q提醒自己。

可是他怎能緊跟呢？這運動的矛頭是指向他的！清華大學的紅衛兵，就是要揪科技口的頭號走資派——阿Q！這比當年的趙太爺和錢太爺更厲害，那些封建太爺只是不准他革命，紅衛兵是要揪鬥和打倒他。

但這時的Q首長，畢竟不是幾十年前的阿Q了，而是老黨員、老高幹了，他已經有了堅定的黨性了。他認為向他進攻，便是向黨進攻，向黨進攻，便是反革命！他必須反擊反革命！他決心發揚黨性，緊跟偉大領袖，和紅衛兵鬥下去！紅衛兵誓死保衛偉大領袖，和走資派血戰到底；他也誓死緊跟偉大領袖，堅決反擊紅衛兵。紅衛兵要推翻黨委，揪出阿Q；他便下令各級書記，層層佈署，以生命和鮮血保衛黨，誰若投降，誰就是叛徒，將來永遠開除黨籍！

但是紅衛兵畢竟是偉大領袖的天兵天將，最高統帥是他老人家，阿Q怎麼抵抗得了？就在阿Q做好佈署不久，清華的紅衛兵推翻了清華的黨委，揪出了蔣北飛，蒯司令就揮師向阿Q進攻了。當日科學院便有兩名黨總支書記背叛了阿Q，投降了紅衛兵。三天後，蒯司令的人馬和科學院的造反派裏應外合，推翻了阿Q的各級黨委，逮捕了阿Q和各級書記，把他們統統關進了牛棚。不過為審訊方便，把阿Q單關一間。這一點，阿Q反而感到幾分欣慰——紅衛兵也尊重高幹。

關牛棚對於中央高幹，實在是要命的事。但是阿Q並不怕。在他的履歷中，坐牛棚並非最艱難的歲月。他住過未莊的土穀祠；蹲過紹興縣太爺的大牢。那條件未必比紅衛兵的牛棚好多少。就連小D和王胡在太行山為他和吳媽結婚而建造的新屋，也是泥土地、紙糊窗、土坯炕、炕上舖一張草蓆，老實說還比不上牛棚的水泥地、玻璃窗、木板床。因此，雖然被拉出首長辦公室和高幹住宅，他也並不覺得肉體上怎樣痛苦。

但是阿Q精神上却受到了極大的折磨。他為啥被關進牛棚？百思不得其解。為啥偉大領袖親自點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會燒到他阿Q的頭上？他是無產階級，他有刑場造反的光榮歷史，又是偉大領袖親自選中、親自提拔的工農幹部，他對偉大領袖無限信仰，無限崇拜，怎麼會反對偉大領袖？

然而他的罪狀正是：反對偉大領袖、反對戰無不勝的偉大思想、反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三反份子。戴在頭上的尖帽子和掛在胸前的木牌上，寫着的正是「三反份子」四個大字。這對他是何

等侮辱，何等刺激，何等不祥之兆啊！

當紅衛兵第一次把「三反份子」的尖帽子戴到他頭上時，他拚死命反抗。遂被打翻在地，爬起來還反抗；再被打翻，再爬起來，再反抗。直至頭破血流，筋疲力竭，被紅衛兵揪着——一個摺脖子、兩個撐起雙臂，那頂尖帽子才扣到他頭上。接着，那塊二十多斤重的大牌子也順利地掛到頸上。——他再也無反抗的自由，亦無反抗的力量了。

第一次批鬥大會上，阿Q挨了多少猛拳和飛腳，全沒理會，這些他是嘗過和見過的，算不了什麼。但是會上此起彼伏的那句口號——「打倒三反份子阿Q！」却令他無法忍受。他曾兩次抬頭呼叫：「我阿Q不反對偉大領袖，我不能沒有偉大領袖！」



阿Q被推進一間木做的欄柵裏。

但他的頭被亂拳砸了下去，他的呼叫被口號聲壓了下去。

坐牛棚對一切牛鬼蛇神來說，最可怕者，莫過於「早請示」和「晚匯報」了。早請示、晚匯報——都是文革期間紅衛兵折磨「牛鬼蛇神」的手段。前者是早晨站在毛澤東像前請示一天的改造任務，

後者是匯報一天改造的情形。但對阿Q，却是最好的時刻。在這兩個時辰，他可以站在（或跪在）領袖像前流淚，而心裡默念着：「偉大領袖呀，偉大領袖！我阿Q願意把心扒出來，讓你老人家看看，是紅是黑！」

在牛棚裡，阿Q最怕的是審訊。紅衛兵那套審訊，實在令他腦漿痛。

「阿Q，說！你為什麼反對偉大領袖？」

「我沒反對！」

「沒反對？那為什麼破壞文化大革命？」

「我沒破壞！」

「沒破壞？那為什麼搞黑名單，大抓右派？」

於是一疊黑名單，全是阿Q屬下書記們的傑作，啪的一聲，摔在阿Q面情。阿Q啞巴了。接着便是猛拳、飛腳以及棍棒交叉進行。直至阿Q躺在地上，不再動彈。

這樣的審訊，總共熬過了多少回合，阿Q已記不清了。但其中有一次，却令他終生難忘。那是由於他成了牛棚中最頑固者，紅衛兵認為他是花崗岩腦袋，蒯司令非要敲開這塊花崗岩不可，為此組織了一次「特審會」。蒯司令端坐堂上，幾大金剛分列兩側，管牛棚的幾員彪形大漢站在阿Q前後。蒯司令赫一陣，詐一陣之後，拍案大吼：

「阿Q，你原來是個叛徒！你在刑場屈膝投降，背叛了革命，又偽造歷史混入革命隊伍，你真正罪該萬死！今天，你必須交代你的叛徒歷史！」

阿Q一聽，從頭頂冷到腳根。刑場造反的光榮歷史，是他賴以起家的政治資本，是他的命根子。那是絕對不容否認的。倘若這項資本丟了，他和偉大領袖相連的那根線就斷了。因此，阿Q像觸電一般喊道：

「我那歷史不能抹掉！不能呀，不能！」

他伸出兩臂，似乎要撲向蒯司令。幾員彪形大漢，立即將他制服，造成個噴氣式——大哈腰，兩臂伸向後上方，頭被揪起來，面朝蒯司令。

「阿Q，你這叛徒是鐵定了的！不交代，就休想過關！」蒯司令再拍案驚堂。

阿Q並不順，他要豁出去，和蒯司令拚了！今日的阿Q，已非當年那樣瘦骨嶙峋。而是臂粗腰肥，頗有一點力氣。但是他怎能和彪形大漢們較量呢？一頓拳腳，他又被打倒了。然而他並不認輸，大喊大叫起來：

「我是偉大領袖的人，偉大領袖保護我！」

這一下可犯了天條！這無疑是說，蒯司令是在迫害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這還得了！蒯司令略使眼色，許多隻腳踏在阿Q身上，同時幾根棍棒，在他身上、頭上，大大飛舞了一陣。阿Q在昏迷中，

被拖回他的單人房。

阿Q醒來時，感到頭上像壓着一磐石磨，抬不起來。身如火炙，嘴裡有腥味。睜開眼，看到水泥地上血跡殷殷，那是從他頭上流下來的——紅衛兵的棍棒似乎比趙太爺的竹槓更厲害。

但是今日的阿Q比當年強硬多了，當年挺過了趙太爺的竹槓，今日也同樣挨過了紅衛兵的棍棒。阿Q依然是勝利者，——他那光榮史不容否定。連結偉大領袖的那條綫，沒被切斷。——他的信心更堅定了。他忍着傷痛，咬咬牙：

「媽媽的，等着吧！」

阿Q精神 戰無不勝

阿Q不愧是歷史寵兒，吉人自有天相。

不久，紅衛兵分裂了！清華的紅衛兵、北京的紅衛兵以及全國的紅衛兵，統統分成了派系，並且開始內戰。蒯司令忙於保護他的山頭，再無餘暇顧及阿Q。阿Q雖仍關在牛棚，但牛棚裡殺氣已大大緩和，殘酷的棍棒歲月，似乎挨過來了。

牛棚內棍棒聲收斂了。看來出棚在望，於是阿Q思念偉大領袖的心情更急切了。他盼望趕快出棚，回到革命隊伍，緊跟偉大領袖去幹革命。他覺得偉大領袖也需要他，說不定明天就會下令蒯大爺釋放他——他老人家怎能忘記老Q同志呢？

然而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他仍然蹲在牛棚裡，蒯司令並未放他，似乎也無意放他。於是他又心情苦悶，思緒萬千。腦海裡浮起一大堆問題，翻騰着，糾纏着，像一團亂麻，理也理不清：他老人家爲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劉少奇爲什麼反對他老人家？反對偉大領袖就是反革命，他不知道嗎？他老人家爲什麼叫紅衛兵造反呢？恐怕黨內真有走資派，否則他老人家爲什麼叫紅衛兵開牛棚呢？可是紅衛兵把黨委全砸爛了，這不是反革命嗎？……這局面幾時才能恢復正常呢！

但他又轉念安慰自己：偉大領袖不會錯！這一切都是偉大戰略佈署，不能懷疑，只能緊跟，緊跟才能勝利。

可是說起來簡單，挨起來却難，刑訊棍棒雖說少了，但牛棚終究是牛棚，不是北京飯店；阿Q仍是走資派，並非Q首長。審訊固然停止了，但每天十二小時勞動改造，也够挨的了。所幹的活，都最髒最累：掏大糞、扒下水道、扛水泥袋……。早年阿Q一向遊手好閒，解放後當上書記，再也沒摸過鋤鏟。進京以後鼓起了大肚腩，哈腰都困難。更苦惱的是，勞動時也要掛着那塊「三反份子」的鬼牌子，白底黑字，令他沮喪，傷神敗興。紅衛兵勞改

隊長，看破了他的心理，故意和他作對，不僅勞動時叫他掛着，收工後也不准取下，甚至睡覺也要掛着。後來牌子不時興了，別人的牌子都逐漸取下，唯獨他的牌子不予取下，依舊掛着，這樣突出他，令他更引人注目。阿Q對此曾表示反抗，悄悄把牌子上的麻繩磨斷，結果挨了一頓嘴巴，麻繩換成了鐵絲。

阿Q的牛棚歲月，確實比別人更難熬。

但必須承認，阿Q精神，實在偉大，他絕不服輸，絕不投降。這一點和未莊時代相比，真正判若兩人！當年在未莊，莫說趙太爺和錢太爺的竹槓可以隨時令其就範，就是王胡，只要抓住辮子，把他的頭向牆上猛撞幾下，他立刻就告饒了。現在的阿Q，儘管在牛棚裡住了兩年多，猛拳、飛腳、棍棒，數下清挨過多少，頭上大紅疤增加了好幾塊，但是那股不尋常的抵抗精神，連管牛棚的彪形大漢，也不得不嘖嘖稱讚。雖然稱讚之後，再加上幾拳幾腳。

阿Q這股精神是那裡來的？以後他曾多次宣告，來自「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這是他的勇氣和力量的源泉。早年在未莊，就因爲沒有這個「源泉」，人們可以隨時令他老實就範。解放後當了書記，頭腦裡有了偉大思想，心裡樹起了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從此「無限信仰」和「無限崇拜」，他的精神就起了根本變化，他不再是一個普通人，而是一個「特殊材料造成的人」了。因此即使被拉下馬來，關了兩年多牛棚，他的「信仰」和「崇拜」毫無動搖，所以抵抗的精神和力量一直不衰。

但是，正因爲阿Q頑固地抵抗，所以蒯司令就一直關着他不放。牛棚裡走資派只剩他一人了，把他和「老右派」關到一起。阿Q認爲，這是對他的侮辱，要求落實政策。但是專案組長說，他的問題嚴重，尚未查清。其實蒯司令的人馬早已去紹興和太行查了幾個月，並無任何可資利用的新發現。只因阿Q太頑固，因此不予結案。一直拖到「九大」開幕，（九大——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阿Q坐滿了三年，蒯司令垮了台，這才摘下牌子，走出了牛棚。





回國探親記



江心

(續)

回頭出門時，在大門正中有一幅油畫，畫的是海邊上一個大大的紅太陽，有毛澤東歪歪的題字「江山如此多嬌」。一個女團友站在那裡說：「江山如此多難呵！」女導遊立刻向她瞪眼，她又不慌不忙再補充：「可不是嘛！看到這個大紅日，叫人想起日本打中國，中國夠多災多難了。這個紅日真刺眼！」

我們又作了一次會心的微笑。

故宮的殿宇，莊嚴宏偉，但是可惜年久失修，到處是紙窗破洞，油漆剝落，遠遠不如照片上看到的那麼金碧輝煌；紫禁城內的全部建築物，我們祇看了十份之一，其他的完全沒有開放讓人參觀。我問導遊宗人府在那裡，他竟茫茫然不知宗人府是什麼。

在故宮遺物展覽一欄裡，有宣統皇后的后冠，幾隻彩鳳是銅鑄的。說明中，指這是末路皇帝，連皇后的后冠也沒有黃金鑄造。

這是一個錯誤的說明。

應該是一一末路皇帝，給臣子欺負，那些承造的官員，把黃金偷走，用鍍金造成，日子久了便現了原形了。大殿兩旁那些大水缸，刮下來也有十幾兩黃金了，怎會是皇帝大婚也沒有一、二兩黃金動用？

晚上我們又約了團友到外面吃飯逛街。這一次上的餐館很差勁。吃完出來個個嘔吐。

長安大街，是全個北京市最美麗的街道，我們從東往西走。預備去西單看民主牆。日間兩次經過西單，到處張望都看不到什麼；到了晚上，我們又死心不息，想去湊熱鬧。

我們走到離天安門不遠處，忽然走過來兩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服裝整潔，斯文有禮，看來像個大學生。他們走上前攔着我們問：「朋友，請問你們是不是從外國回來的？」

我們先是愕然，然後是僵持着沒有人回答，最後，我回答了他們：「是的。」

「從那一個國家來？」

「那裡都有。英國美國，香港東南亞都有。」

「你們回來過嗎？」

「回來過。四年前。」

「你們覺得祖國怎樣？」

「你是指那方面的？」

「四年前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好了。好一點點，不是全部好。」

「好在那裡？」

「市面上有東西賣，糧食多了，日用品多了。人民很少破衣襤褸。」

「聽說台灣是很好的，是不是？」

「是。」

「台灣好還是我們這裡好？」

「當然是台灣好。鄧小平也說過，台灣比大陸進步。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教育，任何一方面都比大陸進步。」

「依你們看，中國有沒有統一的希望？」

「當然有，但不是現在。祇要大家朝着好的方向走，那最終不是走在一起了？」我用手沿一個三角形比劃着。

「我們大陸還有什麼值得批評嗎？」

「不夠自白，不夠民主。其實我們海外華僑都關心祖國的。我們最不高興聽到『武力解放台灣』或『反攻大陸』；中國幾百年來，給外族欺侮太多了，打仗也死人太多了，我們不願再看見自己中國人打中國人。早幾年，柴澤民在美國紐約，對華僑演說，便一再強調要『武力解放台灣』，叫台灣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這種話令到我們華僑大大的反感。我們譏笑他說『他好像在說武俠電影的台詞』呢

！」

「北京是不是有個地下城？你可以告訴我們在那裡嗎？」小陳插進來問。

「有是有的，但是關着沒有開放。」他們中一個人回答。

「我們想看看西單民主牆……」

我們已走到一個地鐵站口。梁小姐和朱小姐一把拉了我和小陳向站口走去，然後回頭向他們招招手說：「再見」。

「再見。」他們回頭就走。

回到宣武門飯店前，梁小姐在頓足罵我和小陳：「你們兩個一定是想死了。在這裡也敢談政治！」

「怕什麼呵？我又沒有傷害自己的國家！」我說：「我教你吧，學聰明點，在政府人員面前閉上嘴，裝糊塗。在背地裡什麼也不怕說。這是大陸人的做人訣竅，懂得嗎？」

「你怎知道剛才那兩個人不是便衣？」

「看得出來嘛！這分明是兩個學生，他們想從海外同胞口中探詢一點外間世界的事情；同時，這也是關心國是的好青年，可能就是搞民運的後起之秀。我們應該做做好事，滿足一下他們的求知慾，找個機會跟他們作長談是最好不過了。你真該死！白白失去一個好機會，就算跟他們談不了什麼，也學到一點純北京話啦！」

第二天清晨，我們到二樓餐廳，靜悄悄的，有一個像海外裝束的女孩子，帶了一個青年洋人進來後，逕自走了。

我們跟那個洋人一起到櫃檯付早餐的錢，櫃檯

收銀員說，不到七點不開工，叫我們等等。但是洋人心急說他要趕着搭車去天津。櫃檯小姐不再說話了，一副充耳不聞的態度。洋人急得走來走去，一逕走到廚房門口，往裡面張望，看到大盆大盆的包子已經擺在檯上，他又詢問站在門口的幾個女服務生，可不可以賣一點給他，因為他要趕着去搭車。

三個女服務生向上翻眼，沒有理睬他。不知是聽不懂英語，還是態度驕傲。祇見那個洋人又着急的走到櫃檯去，櫃檯小姐指了指掛在牆上的時鐘；六時五十分！說道：還沒到開工時間！那個洋人無助地看看我們搖頭，氣得兩個眼球鼓起高高的，在那裡跳腳。

好不容易吃完了早飯，這是我們最後一天的旅行了。

蘆溝橋那一帶，是沙石路的荒蕪地，橋下是乾涸的工業污水。風很勁，塵土飛揚，我覺得很冷，頭也痛，跟着大夥沒精打采的走。祇聽見導遊在重覆的講橋邊的石獅子，老黃伯獨自在橋那頭指手劃腳，說當年七七事變，什麼將軍，什麼軍人在這裡英勇抵抗。老袁和幾個青年工人，倒跑過去追問黃伯關於蘆溝橋事變的故事。

我的精神萎頓，頭腦有點幌盪，隱隱聽到老袁說：「這裡是一個很有歷史價值的旅遊區，應該在這裡設一間紀念館，賣紀念品、賣咖啡飲料，和設有洗手間等等才對。」

黃伯壓低了聲音說：「講什麼啦！講起來沒有『老八』的輝煌事迹。哈哈！」他乾笑兩聲：「有時很滑稽的，香港放映那些革命樣版戲，鏡頭上一

北京百貨大樓



味中國人打中國人，看到我們滿心不是味道。是這樣了！哈哈！」

回去市區遊地下城。地下城的進口很隱秘，在大柵欄街上一間布店櫃檯裡邊的水泥地上，有一塊長方形的活動地板，店裡頭有個幹部在帶路，他先在牆邊按一下電鈕，水泥地徐徐向旁邊移開，露出一個進口。走下小石級，一路跟進去都是迂迴的通道。因為抽氣設備不好，建築也簡陋，一路走過去，便覺得空氣不夠，瀰漫着潮濕而窒息的感覺。

領路的邊走邊介紹地下城，說是預備作為核子戰爭時的避難所，但是我估料這僅是給一小撮人避難而已，如果是公共防空設備，入口就不應該這樣隱秘。據說還有醫院、戲院、和溜水場等等，但是我們看不到了。他僅帶我們到一間友誼商店，盤桓了一個小時，又循原路把我們帶回大柵欄街。

遊完日壇和月壇，導遊把我們帶到友誼商度買藥材，友誼商店我們早已逛過，而且每次逗留的時間一定超過一個小時以上。這一次，他是想我們遊客多買一點東西，這是未可厚非的事。但最令我們感到很難過的，就是每次我們進去，店裡的服務員就把原來在瀏覽觀看的本地人通通推趕到外面去，「噓！」的一聲，把一塊大布帘拉上，把我們和他們分隔起來。據說，有些友誼商店還公然掛上牌子——「本地人不許進入」的字樣呢。

在我們海外華人的心裡，對於這種「階級分明」「人身隔離」的措施，感到非常痛心。雖然口裡不提，但是肚子裡却滿是抗議！又不知道那些本地人，是否一生都給作賤慣了而變成感覺麻木，還是敢怒而不敢言？

晚飯是全體到北海公園吃仿膳，四、五十個人在那裡瘋了兩三個小時。吃的菜很差，倒是花錢換回來一點開心。

明天是各奔前程了，這一晚大夥覺得有點依依不捨，於是晚飯後約好了到三個太太的房裡談天。

老袁說，那裡都買不到巴蕾珍珠膏，恐怕回去不能向太太交代，找到一個在建國大飯店做工的朋友，說他那裡的友誼商店有出售，所以他獨自去了。小陳和兩個小姐都興緻勃勃地加入她們的敘談。

她們幾個一坐下來就談論大陸的生活形式，都在搖頭感嘆。大哥說：「你們全然不知滿足，現在我們遊客所過的生活，是人上人的生活了。你們不看見外面市場賣的爛菠菜。真是餓豬都不吃。」

「我就是本着這種心情回來中國看看，如果勉強適應得來我也不走，否則我就回英國做事算了。」朱小姐說。

「我是台山六村姓陳的，我們全家早早已去了美國，我在中大畢業後，因為英文不大好，所以才

留在香港做事。情形不好，我也溜人嘍！」小陳說。

「共產黨真不公平，你們看見啦，這裡爛瓜爛菜爛水果都沒有。香港油蔴地的果菜欄，經常幾百箱發霉發爛的大陸水果瓜菜送上垃圾車。很多八婆呱呱叫『折墮嘍！折墮嘍！』」黃太說。

「這裡也有乞丐的，他們偷偷地行乞。」

「我的姨甥經常帶歐美客遊大陸，他說每個鬼佬都學識一句中國話，你猜那句是什麼？我說當然是『你好嗎』，他說：『不對！』是『沒有啲！』『因為他們要什麼都說沒有。』我也加進去說。

老袁回來了，興高采烈的拿着兩盒子珍珠膏，說是那個朋友買了送給他的。她們問多少錢，老袁說：「才一塊九毛一盒，少少的，領了人家的人情算了。」

我開始發燒，一夜劇烈咳嗽，不會好好的睡上一個小時。早上起來，看到外面飄着寒風冷雨，我穿齊了所有的衣服仍是覺得冷，匆匆下樓去友誼商店買感冒藥丸，他們說沒有；等他們吃過早餐，冒雨走去西單附近，沒法找到一家藥房。

呆在樓下大堂看着下雨，老袁他們塔飛機去了，十幾個青年人同我們一齊等晚上的火車南下。我提議他們去參觀清華大學和中央音樂院。問服務生怎樣去，她說這些地方不是隨便去的。我頭暈得很，不想到外面淋雨走泥濘路，寧願叫他們去，我自一個人坐在那裡算了。

看到一個掃地的女工，把掃完地下的掃帚來掃咖啡檯面。他們回來，我悄悄報告了我的所見，他們罵我說謊。

下午四點，我說火車七點開，他們走得很累，我勉強撐着傘又再到西單附近的食品店去，家家都說未到營業時間，結果在一家清真館買了十幾個用整個紅棗做餡的包子。

六點鐘，僱計程車到火車站，那裡人山人海，問服務生，我們京杭軟臥應該到那裡，她指點我們在大堂的自動電梯上去，電梯上擠到不能轉身，忽然有一個小女孩哭叫着往下跑，但是這種輸送電梯她怎也走不下來，倏地電梯一停，站在下面的女服務生跑上去指着一個男人破口大罵，那個男人一手拖着一個小女孩，一手挽着大包行李，還有兩大包行李在背上。可能沒有第三隻手而不拖那個受驚的女孩子。

如果有看過「皇天后土」這套電影，便知那個女服務員的罵人態度，就像電影裡那個罵老鼠的女幹部一樣了。

那個被罵的男人，把水中的行李放在腳下，漲紅着臉，一言不發再拖住那個受驚的女孩，罵人的仍在那裡罵，不管幾百個人正在等她開電掣，上面

北京地鐵入口



三個女服務員在談笑風生，好像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

我很生氣，悄悄地對外子說：「她們在這裡，不是爲人服務，而是罵人；如果真爲人民服務，不等女孩子受驚，她早早就應該幫着人家帶小孩上去了。如果我能夠擠得過去，我就會過去幫那個男人一把。」

經過樓梯走廊那些地方，滿地泥濘，很多人睡在地上，他們可能是爲着輪車票而在那裡過夜的。在餐廳那裡，很多人捧着個大盆子坐在地上吃飯。

此情此景，就像抗日時代的流亡圖。

到了進口的閘門，閘門剛巧關上。幾個擔着行李飛跑而至的人，給攔着不許進去。他們在交涉要求進去，守閘的不肯開門，那幾個人悻悻然坐下來，用髒話罵剛才弄停電梯的服務員耽誤了他們的時間。

我們遞上車票，守閘員看了，說我們走錯了進口，叫我們坐下來等。

一個女工走過來掃地，也用同一個掃帚掃椅子。大嫂才向我張嘴咋舌聳聳肩。

走了一段很長的路，才看見我們的團友跟在高幹的身後，在接近車廂的門口走出來。大嫂嘀咕：「死八妹！指條黑路給我們走。」

「我們幸運了。否則怎會有機會見到真正的中國人！」大哥說。

車上的這一晚，我發起燒來了，辛苦不堪。外子說：「還想到這裡那裡的。說不定病死在路上呢！」

沿路南下，也沒有看見口號之類，都是些商業廣告。在徐州附近公路上，看見很多人拉木頭車。大哥搖頭說：「把人當騾子用！」

北上和南下，兩次經過長江大橋。北上的在武漢，南下的在南京。兩處相比，南京的大橋比武漢那條大橋雄偉得多，而且也長得多。雖然中國造這種跨海大橋，已經比西歐落後五十年了。但想起造橋的同胞所付出的血汗，不免對他們衷心敬佩。想起那次在台山鄉下用船運車過河的情景，我們中國在交通建設方面仍要急起直追。

第三天的晚上十一點，抵達杭州。也是中旅社接了我們入住西湖邊的華僑大廈。我們也是立刻湧到櫃檯上詢問到各地的火車行程。他們說：「到廣州的，到桂林的，都在十天以上才有頭等票，三等票也得五天之後才有。」我們各自坐下來商議一番。大哥大嫂猛說這次上了香港中旅社的大當。但是已經「流落異鄉」，也要想辦法回家去。我已經病得什麼興趣也沒有了。我們四個決定不如歸去，老黃伯却說，已經抽出身來，又花了錢，他們是無論如何都要去西南一遊。即使坐三等車也在所不計。但青年人都說坐三等車要回廣州。外子說：「坐三等車兩天兩夜，連骨頭也散了。」我說：「就搭飛機回去算了。」大嫂說：「直飛香港她無所謂，如果在廣州降落，她無論如何不搭。」

外子問櫃檯，有沒有機票去香港，他們說沒有。我靈機一觸，摸出護照對他說：「同志，請您幫幫忙，因爲我們已劃好這個星期四回美國的機票，請您給我查查有沒有空位吧！」



北京故宮遠眺

「好的。好的」，他拿起電話問了，對我說，「有。但還不確定，你明天大早下來問。我們是六點辦公的。」

櫃檯那邊，仍有一個像香港旅客的女人，用拳擊打着櫃檯大叫：「不合理！不合理！我要抗議！」我沒有精神去理她了。說了「謝謝！」我們算是放下心頭大石。立刻又走去友誼商店想買藥丸，但是已經打烊。

六點鐘醒來，我拉醒大嫂，草草穿了衣服走到電梯口，電梯的燈不亮，按不動，我們從樓梯走下去櫃檯。櫃檯給了我四張機票。歡天喜地想回樓上。按了電梯，久久不見動靜，我問服務員，服務員說：電梯關了，七點才開。

「我的天！」大嫂哭笑不得。她是氣喘如牛，我是半條人命。兩個人爬上七樓，差點累死了。

初夏的西湖邊，祇有垂柳沒有桃花；牡丹已謝，玫瑰未開，到處是青綠一片，柳浪不聞鶯，三潭無印月。車子走來走去都是沿着湖邊轉。看了靈隱寺，又去看岳王廟。

岳王廟前，有兩個鐵鑄的秦檜夫妻跪像。跪在那裡，永遠向岳飛和世人謝罪。遊人在鐵像上吐得滿是痰涎鼻涕，有很多蒼蠅在周圍飛繞。我對黃伯說：「這個報復方法很不合衛生。」

我們到了大殿，導遊說，現在這個岳飛像是新造的，原有的那個已給紅衛兵砸掉了。

黃伯張眼驚訝說：「有沒有搞錯？岳飛又不是國民黨。」

「紅衛兵也不是國民黨呀！」大哥說。

跟在大哥背後的黃伯女婿說：「你兩個講話很夠幽默。嗯？」

這裡廟宇附近，很多成群結隊進香的女人。她們很容易看得出來，因為每個人的頭髮都別上一條紅綫，手上拿着三枝點着火的香。

轉出市區吃午飯，我和大嫂盡量利用這個時間，到處找商店買藥丸，也想買一些水果，因為實在口腔乾涸到很難受。但是轉了幾條街也買不到。回到車上，我祇得向導遊求助。他說，如果想買水果，要找個醫生寫張證明才買得到。他又說，旅館樓下左邊有一間醫療室。我緊緊記牢了。

車子轉了幾個轉，在一道灰色圍牆外停下來，那圍牆圍着的矮房子，從外面看，像個工廠，或是軍人宿舍之類。導遊說，那是林彪的別墅，現在改爲浙江賓館，專門接待重要人物的。

八點三十分了，仍買不到我要買的藥。上到巴士，我又向導遊求助。

中午到市區吃飯，導遊帶我去買到一瓶枇杷止咳藥。

我糊裡糊塗跟着走，都在西湖邊打轉。導遊帶去龍井山喝龍井茶，我警告那些年紀大的團友，不要喝太多，多喝自己找罪受。

喝茶不到半個鐘頭，幾個人嚷着要找洗手間，我說：「用鼻子去找好了。」

罵我當他們是狗。結果他們都大叫大嚷着回來：「好臭呀！好髒呀！」

晚上在友誼商店買了很多土產，杭州絲織品之類，無意中在櫃檯看到有巴蕾牌珍珠膏，服務生拿

出來說，每盒十九塊。

「哎喲！老袁老花眼，把十九塊看成一塊九毛，人家一個月薪水爲他花掉一半。」她們哈哈大笑。

又回去餐廳門口，見有麻將出租，四塊錢一個鐘頭。

到櫃檯問清楚明早搭飛機的路程，他說飛機八點起飛，在這裡七點要起程，僱計程車要提早一小時預訂。

醒來匆匆整好行李，各人拎着大包小包，走到電梯口，燈不亮。我們找到服務生對他說：「服務生，請您開開電梯給我們下去好不好？」

「不到七點不開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走下去呵！」

「好！好！」大哥很生氣，走到中途停下來罵：「所以廣州飛機場，飛機燒着了，沒有到時候不能開門！」

「喂！請你不要講好不好？我們去搭飛機呀！」大嫂說。

「一次夠了。以後都不再回來！」外子說。

「她呀！」大哥向大嫂撇一撇嘴，「從前回鄉下生氣起來就說以後不再回來，結果又回了幾十次了。這是你的祖國呀！生過氣你又回來了。」

到了樓下，原來有幾個旅客也是去搭飛機的，也在那裡生氣咒罵。

杭州的交通也是混亂得很，計程車腳踏車橫衝直撞。車子進機場，要停下來受解放軍盤問。這種守衛森嚴的情景，也像極了日據時代。

過機場的海關，連一把小剪刀也要抽出來，中藥材超過一斤的，全部納稅。

坐在候機室呆等，等到九點仍未上機，去洗手間，一定要到外面，回來時又要經過海關，大嫂心有不甘，在那裡生氣。

旁邊一個香港青年，說他從北京去西安，曾經等飛機等了一天，他們不報告也不解釋遲飛的事，也不報告什麼時候可以起飛，搭客就是無限期地等待。結果等了一天，原來是等幾個大官員。

到了九點三十分，果然施施然進來幾位大人物，服務員跟着就叫我們上機，宣佈飛機起飛了。

飛機上的午餐是凍餐。凍蔬果容易吃，凍肉和凍飯很難下嚥；即使飛機是舊式，也該有暖爐的設備，想來又是爲了省電之故。

空中小姐的制服只有一件不稱身的鬆寬藍色粗棉布外套，裡面的襯衫是各適其式，甚至有穿羊毛背心的；她們的頭上紮了一個『解放裝』大概是化粧後才把覆額的頭髮掀上去的，於是美麗的臉蛋上露出上半截黃色，下半截白色。一切都顯得那麼簡

陋與外行。

回到香港，也聽一位在香港機場做事的親戚說：「在啓德機場的停機坪上，一邊是中航，一邊是華航。兩邊的機員走下來，絕少打招呼，大家上了餐廳，也是各走各的路。但是我們看起來，覺得華航那邊的人穿着整齊，精神奕奕。而中航那邊的人，穿得土裡土氣，像個『阿福』。即使中共沒有派人出外考察，也會看到外國航空人員的制服是怎麼個樣子。唉！中共那些官員，整天都說出外考察，不知他們做了什麼？」

一個五十年代的極左親戚，當年放棄移民美國而返大陸參與建設新中國，經過三十年長的政治折磨，於去年才獲准出國的。就對我們說：「中共那些官員借名考察，其實是用公款出外旅行，過足資本主義的癮而已。你們那些海外華僑，回去旅行覺得頗爲自由，嗯？這也是鄧小平的統戰計劃之一。他故意任你們自己到處走，也隨着你們說什麼也不加干涉，讓你們回來又洋洋得意對人說，我們在大陸怎麼怎麼。於是就通過你們的口做了宣傳，讓海外華僑覺得：大陸都很自由呀！於是呼你們又中計了。哪！你們就算批評多多，都不過是導遊一個人聽到而已。唉！我們在大陸生活三十幾年了。政府的陰謀我們才最瞭解，認識最真。鄧小平也是很陰毒的！我倆夫婦的一生都毀了，四個兒女也失了學。我不忘自己的國家，但我永遠都不再回去了。今後的希望，就希望兒女到了美國有機會再讀書。唉！可惜年紀都大了！我自己唯望平平安安過完一世算了。」他顯得消極而頹喪。

「老師！」他是廣州某工學院的教授，人人都習慣這樣稱呼他。「恨共產黨可以，不能恨自己的國家呀！」我說。

兩次回國，第一次爲帶孩子去看看他們從未謀面的祖國；第二次回國，有心對祖國看個透澈，却又力與心違。兩次都是走馬看花，不能說有什麼深入的了解。但一切都是有聞必錄。間或因時間過久而忘記不少奇聞怪事，總比外國人寫中國來得真實，沒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如果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覺得中共自始至終都是那麼殘酷專制，荒誕而腐敗，好像完全忽略了人性；而他們那些領導階層自己却又人性得很。

我深愛自己的祖國，更同情生活在祖國的同胞；今天大陸的人民都已醒覺，老年人怨氣冲天，青年人蠢蠢欲動。政府的大屠殺運動，分明是想煞住那股日漸膨脹的反抗之風；不過我認爲，縱能暫時壓住大陸的人民，却無法堵得住海外僑胞之口。

再致鄧小平

—— 方丹 ——

中國土地面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人口十億七千五百多萬，日本面積三十七萬七千平方公里，一億一千萬人（以上統計數字根據一九八一年一月出版的《新華字典》）。按人口平均土地，中國人每人可占有九千八百四十六平方米的土地，日本每人只占有三千四百二十七平方米的土地，每個中國人所擁有的土地等於日本的三倍。

而且，土地和土地還大有不同，在日本，土地之下並無百寶，但在中國的土地之下埋藏着各種礦物，日本是一個土地少，又無資源的「極貧國家」，但是，日本在一無資源、二無土地的情況下，現在變成第一經濟大國——按人口平均值遠遠超過美國。

從土地與人口的比例來說，日本的人口等於超過中國三倍，但日本每人創造的生產價值等於大陸中國人的五十倍。也就是說一個日本人等於五十個中國人，可見人多並不是一個影響生產的主要因素恰相反：人多的確好辦事。問題不在人多人少，問題在人的素質，中國大陸是什麼人？日本又是什麼人？

日本每一個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生產能力——個人頂幾十個人，日本幾乎普及了高等教育，日本的企業管理和企業架構是根據日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自然形成的。最大的特點是一種帶有濃厚宗族家長色彩的「聯合企業」。日本靠什麼成爲世界第一強國？靠頭腦、靠知識、靠團結一致！

我拿日本與中國的人口與土地的平均值進行了一番比較之後，您不難發現，人口多，土地少根本不是貧窮的原因。

也許您會說：日本文化和歷史背景與我中華民族大不相同，所以，人家的「民族素質」比我們強，那麼就讓我們拿文化和歷史背景與大陸相同的台灣作一個比較吧。

台灣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二百零四萬，平均每人只占二千九百九十九平方米土地。台灣和大陸比，土地應從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中減去台灣的面積，不知中共向「聯合國」報的「人口數字」包括不包括台灣人口數字，若把台灣的人口也算在內，理應除去台灣人口，在這種情況下，再求算大陸人口與台灣人口所佔土地的平均值，並加以類比就公平合理了。也就容易從比較中看出社會問題了。

我計算的結果是：大陸平均每人佔九千九百四十二平方米的土地，大陸每人比台灣多佔六千九百五十二平方米的土地。大陸每人所佔土地是台灣的四倍。但是台灣每人平均創造的產值又是大陸人的多少倍呢？按照前幾年公佈的數字，台灣每人創造的生產價值是大陸的十倍！也就是說，一個台灣人頂十個大陸人。同是中國人，同樣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歷史和文化背景完全相同，不同的僅僅是社會制度，和由制度而產生的政治和政權。

因此，把中國大陸的落後歸罪於「人口膨脹」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大陰謀，如果把大陸貧窮落後的原因歸罪於「人口過剩」必然要導致殺嬰兒，必然引起「人恨人」的反常心理，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大陸人口就是從十億降到四億五千萬，仍然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您不是把眼光和注意力放在如何提高人的「創造素質」上，而是放在如何減少人口的野蠻行為方面。大陸只能越搞越貧窮，越搞越黑暗。

「向前看」是大陰謀

人們一直以爲「向前看」是「輔弼派」葉劍英提出來的口號，因爲，無論是華國鋒和葉劍英在「文革」中都是不乾淨的，他們與「毛、林、四」有着直接和間接的多種關係，在「毛、林、四」的罪行中，他們都有份，爲了避免群眾在清查「毛、林、四」的罪行過程中揪住自己不放，所以提出「向前看」，用「向前看」的策略杜絕和防止群眾追查他們自己在「文革」中的劣跡，您要提出賣「二月逆流」嗎？你就是「向後看」；您要捏「助手論」嗎？您是「向後看」；您要提「鎮壓」五的罪責「嗎？你就是「向後看」而「向後看」是「反動的」。因爲「向後看」就是要拖住革命的航船，不要革命向前發展。好大帽子呀！在「向後看」幾乎等於「反革命」的帽子之下，群眾就不敢再對「台上的人」提「文革」中的事。所以「向前看」客觀上起了壓制群眾「揭發批判」的作用。我一直以爲這是一條保「毛、林、四」的計謀，一直以爲是「輔弼派」的「錦囊妙計」！一直以爲是「運籌帷幄者」的傑作那裡知道「向前看」的策略也是您提出來的（見《鄧選》第137頁）。

您爲什麼會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這篇鼓吹「民主」、「解放」的講話

中，又同時提出「向前看」的框框壓制群眾「向後看」呢？您怕什麼呢？出於什麼目的要這麼提呢？原來，在您提「向前看」的策略時正是群眾要求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時期。群眾和黨員緊緊抓住一句口號不放：「不管什麼人，不管他的職位多大，凡是冤、假、錯案都要翻。」這句口號是胡耀邦提出來的，而這是深得人心的。胡站在黨內各派系勢力的中間，成爲平衡黨內各派系勢力的一個人物。胡利用「組織部長」大權，不但把「毛、林、四」搞的冤、假、錯案平了反，而且也把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製造的冤假、錯案「平了反」：解放了一批幹部、群眾。這就成爲他後來調升「總書記」的一個直接原因，和政治資本。

但是：胡耀邦的思想對您也形成了威脅，因爲，在「文革」初期，在「文革」前在您二次復出後，你也製造過不少「冤、假、錯案」，有些已經被「毛、林、四」平了反，作爲政治炮彈攻你。有些還沒平，人民群眾很可能在要求「徹底、搞清文革是非」的情況下，把火燒到你的頭上，而這是你不允許的。你不允許群眾揪住「文革」不放——「文革」不放地等於揪住了你：等於揪住華國鋒、揪住中央所有的人不放，所以，你要用「向前看」這種迷人的，群眾一時尚不知利害的計謀，阻止群眾「向後看」，爲什麼你怕群眾「向後看」？因爲您自己在「文革」中也不乾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您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不但認同了「文革」，而且對林彪也極盡美化之能事：你說：「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經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學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主席請示報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群眾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很高，成爲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爲全國學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樣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向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這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徑。」更別提您在二次復出後向毛作的「永不翻案」的保證了。

您怕「向後看」，華國鋒也怕「向後看」，所以，您用「向前看」不但安撫了華、葉派，而且麻

痺了對方。您一方面煽動群眾用「民主」、「解放思想」和「凡是派」們鬧，一面又拋出「向前看」的「救世圈」，救自己、救自己的同黨；而這也正是華、葉派求之不得的，他們也利用了「向前看」爬上岸來。

「向前看」是不是大陰謀，您心裡再明白也不過了。

「接班人」是「逍遙派」

《鄧選》中幾乎用三分之一的文字講「接班人」問題，足見您重視這個問題，不僅您，幾乎中共所有元老人物都把「接班人」問題當作「共產主義事業能不能繼續興旺發展」的大事。因為「共產主義」本來是一種變權的奴隸主義和封建主義在君即法的社會制度下，才把「傳位」——「接班人」的事，當作一件大事，在民主和法制社會中，根本就不存在「接班人」問題；「接班人」就是「繼承人」，這是君權社會的產物，在法權社會中，沒有「繼承人」也沒有「接班人」，能禪兩屆總統已很不易。西方民主社會的「江山」是靠「民主」與「法制」維護的。絕不存在「人亡政息」的事，「政策」的延續性不是靠「接班人」、「繼承人」來維持，而是靠法制來維持。

在大陸，如果連毛澤東都不能解決「接班人」問題的話，我想任何人也辦不到了！您也辦不到，而且您關於「接班人」的許多講話證明，您辦不到。實際上，您也在「接班人」問題上「冒險」，目前您選了胡耀邦做「接班人」，但您對胡並不信任。現在又在大力培養胡啓立，把胡啓立做為中央最高領導層的「第三梯隊」這是重犯毛的錯誤，如果您相信黨，相信黨中央的話，根本不會產生這種後繼無人的「封建思想」，因為有四千萬黨員的一個大黨，怎麼會沒有自己的領袖？如果為了保自己的「家天下」必然要在生前考慮好「繼承」大計如果相信黨中央，相信黨的事業的話，任何人都不得在生前選「接班人」，這是判斷一個政權是「民主法制」的政權還是一個封建專制王國的試金石。

您早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在高級幹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見《鄧選》196頁）中已埋下伏筆：您在這篇文章中把自己說成是「老傢伙」（見《鄧選》第199頁）大談「接班人」問題，一方面又項莊舞劍地說：選接班人「如果選錯了，那就換嘛，也來得及」，矛頭直對着華國鋒。您這種「換馬」思想在《鄧選》中出現過多次，您的這種思想，在華國鋒未倒台前，人們可以想見，您是針對華而言的，但是華倒台後，您把胡扶上台，在出版《鄧選》時，可以把許多不合當前政治形勢的講話刪去，為什麼又偏偏把這句話留在《鄧選》中呢？不知胡耀邦看到這句話心裡怎麼想，我看這句話，已在為胡耀邦的安危擔心了，這使我想到了阿拉伯的寓言：達摩克利斯頭上的劍。

您關於中共「接班人」的設計；主要依據陳雲的三條（見《鄧選》243頁），對陳雲提出的「接班人」條件，您表示「雙手擁護」並說「我和陳雲同志交過心」，您把接班人的構想從陳雲的「三條」又發展出一個「第三梯隊」。您對接班人的主要思想集中反映在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鄧選》363頁），在這篇講話中，您認為：應該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選拔成接班人，其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大多數還是比較好的。這些人應該好好培養。一步一步，一個台階一個台階走快一點。」

什麼是「逍遙派」？沒有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很難把握這個詞的概念。按說「逍遙」這兩個字是「莊子學」裡的語言，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逍遙派」大多是幹部子弟，黑幫子弟，這些人父母被關，突然從「紅」變「黑」，政治上失去依傍，「紅衛兵」不要他們，「造反派」怕揹包袱，他們從「紅五類」突然變成「黑七類」，始明白「天命難違」，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對未來又失去信心，想做「革命派」人家不要，就只好退出運動，釣魚、讀書、旅遊、偷雞摸狗——我就做過「逍遙派」，「採菊東籬下」，悠哉悠哉，什麼「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什麼「經風雨、見世面」統統見他媽的鬼去了！

應該說，多數「逍遙派」是被迫逍遙，也有不少人看破紅塵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更不少人認為：無論參加那一派都是「群眾鬧群眾」根本談不上革命與反革命。「逍遙派」裡的確有不少臥龍。但也有不少社會敗類。他們利用兩派群眾、武鬥、不上班、不「運動」，玩女人，賭博、營私謀利。「逍遙派」豈能做國家棟樑。

您如果決心從「逍遙派」中選接班人的話，我奉勸您千萬別把宋徽宗選上去！我勸您，如果不是從自己的權力着想，而是從黨和人民的利益着想，您還是應從「五一六」、「紅衛兵」、「造反派」中選接班人——這在感情上是痛苦的，但理智上是正確的！我自已在向您提這個建議時也很痛苦，因為我自己的身上至今留着「紅衛兵」、「造反派」的傷疤！

但是，最徹底的辦法是，根本不選「接班人」、黨和政府，領袖應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設民主與法制的政權之上。「接班人」就像美國總統一樣靠民選，普選產生。上台的「接班人」只對國家負責。一旦新上台的「接班人」違背了憲法，黨和人民就把他推倒。而不是像目前的大陸，「接班人」一上台就首先推倒「憲法」。

您難道不是「三種人」？

您在《鄧選》不斷重複培養接班人「要堅決貫徹陳雲同志講的幾條」（《鄧選》355頁）。陳雲講的「幾條」是那幾條呢？《鄧選》在第120的「注釋」中說：

「這裡指陳雲在《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一文和《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中提出的關於選拔中青年幹部的幾條意見，其主要精神是：從現在起，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他們的年齡應該在五十歲左右、四十歲左右，而且多數應該是四十歲左右的人。四十歲以內的人，他們必須德才兼備，開派性的骨幹分子，打「搶」的分子一個也不能提到領導崗位上來。」

值得注意的是：被您一再肯定的「陳雲原則」在「二中全會」的「決定」中歸納成「三種人」；「整黨」決定說：「在黨內，『三種人』即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

的人，打砸搶分子」都必須「加以整頓」。您「決定」沒有說要清洗「紅衛兵」、「造反派」，顯然經過仔細策劃，不提「紅衛兵」、「造反派」只提「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只提「幫派思想嚴重的人」顯然是怕擴大打擊面，但這種十分籠統的提法，可能不但不能防止「擴大化」反而可能助長擴大化。

請問：什麼叫「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您自己的「幫派思想」嚴重不嚴重？您的「幫派思想」是否是「革命的幫派思想」？是「正確路線的幫派思想」？別的「幫派思想」就是反動的，反革命的幫派思想呢？如何區分？政治標準是什麼？

您一定會說我對您搞「政治誣陷」。那麼就讓我們從《鄧選》中找出您搞幫派、以我劃線、結黨營私的事實吧！

您一面打着陳雲的旗幟清洗「三種人」，一面又以我劃線要把忠於您的幫派分子培養成「接班人」。您「在軍委座談會上的講話」（見《鄧選》363頁）中借提拔第二汽車製造廠副廠長王兆國之機，乘勢把您培養接班人的真正「原則」透露出來。您說：

「前年，我同陳亞顯同志到第二汽車製造廠，有個副廠長陪著我們參觀，我發現這個人不錯。我說他不錯指什麼？一個那麼大的汽車廠，他是技術首幹，工作勝任，這是講能力。他的年齡那個時候是三十八歲，現在四十歲。更重要的一點，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擊的，他是反對打砸搶的，以後一直是表現好的，包括對待所謂『反右傾翻案風』這些問題在內。這樣的人才特別可喜。這樣的人有的，而且容易鑒別。」（着重點為筆者所標）您實際上已在告訴中共的人事部門：選幹部、提幹部要把那些在「反右傾翻案風」時隨着您跑，甚至抵制「反右傾翻案風」的人作為接班人培養，您在此說的「這樣的人」是什麼人呢？說穿了就是忠於您的幫派份子，您是一幫，「四人幫」是一幫，否則，您一個人怎麼同人家爭嘛！

以我劃線選「接班人」不是幫派、不是宗派是什麼？過去「毛、林、四」搞過，都失敗了，沒想到您也走到這條路上來。這真是一個諷刺！您是打上「反幫派」的旗幟在營造自己的幫派勢力嘛！您在上面講的一席話那有一點「陳雲思想」嘛！您在利用陳雲為自己培植勢力嘛！

您口口聲聲要清除「文革」中的「三種人」，其實認真來說，您自己已屬於「文革」中的「三種人」之一。誰清除誰呢？

請問：「文革」從何時算起？如果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算起的話，您在整個「文革」中充當的角色並不輕，您和劉少奇與毛、林、四的矛盾，絕不是「文革」與「反文革」的矛盾，站在反共的立場上來看，您與毛的矛盾，只是鴿派與鷹派的矛盾而已。是權力之爭，既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爭，也不是「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之爭。您在「文革」初期協助「毛、林、四」清洗「彭、羅、陸、楊」也是心狠手辣的。您與劉少奇在「文革」初期自上而下搞「文革小組」，「文革籌委會」，不也是「造反派」？你們在「文革」初期打擊的人難道都打擊對了？

所以，您的「幫派」實際上由以下幾部分組成：①「文革」初期隨着您跑的，後來與您一齊被打

倒被清算的人。②你二次復出後，跟着你頂住「反擊右傾翻案」批判並一齊受過打擊的人，也就是王兆國式的人。③打倒「四人幫」後積極支持您翻案，並緊跟着您的人。④是「二野」軍人，⑤是您在做「總書記」時培養的個人派系。

還有一個「可借用的力量」：就是胡耀邦的團中央系幹部。不過這是一批「文人」，胡在軍隊裡沒有實力。中共目前的政局，表面上是「團中央」領導「黨中央」——中央各部委幹部多出身「團中央」，但實際上是鄧、陳軍人政府，您和陳雲在軍中都有很大實力。

對您打上「反幫派」而又大搞「幫派」的「第三梯隊」行為，中共中央鬭爭的很厲害，「二中全會」發表整黨「決定」不久，北京「人民日報」就在十月十九日發表了一篇分量極重的「本報評論員」文章，題目是：「幹部工作必須堅持群眾路線」該文絃外有音的說：

「堅持群眾路線，說到底是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認識路線的問題。真正知人善任，高明有為的領導，善于發掘、吸取並集中群眾智慧和力量；迷信自己、自恃高明的人，決不會在人才開發方面有什麼作為。現實生活中常有這樣的情況，有些同志嘴上常講要走群眾路線，可是一到選人用人時，就只迷信自己的「慧眼」，大陸現正強迫黨內外學習「鄧選」，當人們用「評論員」的文章對照您選拔王兆國的情況，人們不僅要問：「您是照自己的「慧眼」還是照群眾推荐的呢？您怎麼知道王兆國在「反擊右翻案」時大反「四人幫」呢？是什麼人向您彙報的呢？你調查過群眾沒有？」

「人民日報評論員」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民主推薦」的方法抵制您的長官「慧眼」，呼喚用「民主推薦」抵制您的任人唯派，任人唯親，任人為親——重用「擁鄧派」的行為，亦所周知：「人民日報」的「本報評論員」是什麼角色！過去，毛澤東就在「人民日報」用「本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過不少文章，能用「本報評論員」在「人民日報」上發出這樣強硬的具有政策性、策略性文章的人，我猜，至少是一個可以與您一較高下的政治人物吧？」

「評論員」的文章，顯然激怒了您的「幫派勢力」，於是在十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又發出一篇打着「本報評論員」名義而與十九日「本報一評論員」針鋒相對的文章，正式揭開了中央內鬭的序幕。

廿三日「評論員」文章的題目是：「四根擎天柱——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大意義」這是一篇打着反「左」旗幟行「左」的文章，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情況下把十九號的「群眾路線」批判了。

十九日「評論員」的文章反對「領袖整風」提倡整黨要走群眾路線（這裡講的「群眾」並非「黨外群眾」，而是指「黨內群眾」。「黨內群眾」就是在黨內沒有任何職務的黨員。）然而二十三日「評論員」文章強調：「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黨有過錯誤，但每一次都是依靠黨而不是離開黨（「評論員」是個行文高手，他的本意是「不是依靠群眾」。但這麼寫太露骨，於是把「不是依靠群眾」寫成了「不是離開黨」這麼寫當然就很「技巧」了——一着重點與注釋均為

筆者），糾正了這些錯誤。林彪「四人幫」曾經「踢開黨委鬧革命，如果像當時有些人那樣妄圖『踢開黨委鬧民主』，就只能把四個現代化吹得精光。」寫評論的人可能沒有認真讀您的《文選》，因為，您也像林彪、「四人幫」一樣鼓吹要「解放思想」。請問：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中共您要解放什麼思想，你會說：「我在《鄧選》中提倡的『解放』主要是針對林彪『四人幫』，我是要人們從林、四思想中解放出來。」江青和林彪也會對您說：「我們鼓吹的『踢開黨委鬧革命』是指要踢開修正主義的黨委，要踢開三反分子的黨委，我們並沒有說要踢開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委。而且還可以告訴你，我們要踢開的就是像你這樣的打上紅旗反紅旗的人！」您如何回答？

《「人民日報」評論員反對《「人民日報」評論員，在中共過去黨中央內部鬭爭激烈時曾發生過多次。這一次誰鬭誰呢？

且讓我們擦亮眼睛靜觀中共的整黨好戲吧。

為何對「知識份子」又拉又打？

在中共的政治生活中，「知識份子」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無論是毛澤東或是您似乎一碰到「知識份子」問題就頭痛。是大陸「知識份子」特別刁蠻嗎？恰恰相反，大陸的「知識份子」被全世界公認為「綿羊」！既然如此，中共為什麼又一再把「落實知識份子政策」當作一件大事來抓，而久抓無成效呢？這就不得不從社會制度方面來求答案。

毛澤東領導的中共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農民革命」，只能建立一種封建的農民政權，農民革命的特點只是「改朝換代」而已，絕不可能改變社會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大陸的「知識份子」是不可能與封建領主平起平坐的。封建社會的特點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封建領主靠封建，靠等級差別維護自己的權威和統治。在「政即法」的社會制度下，君權至高無上，絕不可能實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所以，資產階級才提出了「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口號，要改變封建社會。

在封建社會裏「知識份子」雖然一直受統治階級重視，但一直沒有社會地位，在東方漫長的封建國家中，「知識份子」多數都是「孔乙己」（魯迅小說中人物）。在權力社會中，權力壓倒一切，「知識份子」是一個無權的社會階層，所以沒有社會地位。資本主義是法權社會，法權至高無上，「文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商品，所以擁有「文化」，等於擁有商品「文化」越多等於財產越多。在法權社會裏，沒有血統等級的「社會地位」，「知識份子」靠出賣「文化」可與任何有產者平起平坐。在西方先進工業國，因為普及大專教育的結果，人人擁有「文化」，只有「專業人材」和「非專業人材」之分，並無「知識份子」與「非知識份子」之分。在中共大陸，提出「知識份子」問題，本身就證明自己是一個封建王國，而且「落後」的表現。在香港，在台灣，根本就不存在「知識份子」問題，社會和資本家只用「專業人材」沒有聽說用「知識份子」的，也沒有人敢自稱是「知識份子」，只敢說：「我是一個畫家」，「我是一個記者」，「我是一個講師」，「我是一個理髮師」——而理髮師和裁縫的收入遠遠超過一個講師，這些人都受過專門訓

練。擁有「國際性」的專業文憑，難道他們不算「知識份子」？

「知識」太大了，宇宙有多大，「知識」就有多大；沒有人可以認識宇宙，只能認識宇宙的一點。

「知識」並不一定指文字流傳的「文化」。世界上目前還有許多民族沒有文字，只有口頭語言。但是這些民族都有本身的生產經驗和生活知識。他們在某些方面的「知識」遠勝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比如狩獵等。他們的知識靠什麼傳播？靠語言，靠講故事、傳說，把族人的歷史、生活經驗用歌舞、繪畫、口頭文字一代一代傳播。所以，人的經驗也是一種「知識」。

書本知識，文字記錄的知識，只是人類知識的一小部份而已。

什麼是「知識」？顧名思義，「知識」也是又知又識，知是感覺，識是判斷。知識就是又感覺，又思考，是人的一種認識過程，也是一種認識能力；「白痴」和「弱智」就是只能「知」而不能「識」。

宇宙是無限的，人的知識能力却很有限，不管是感性認識還是理性認識，人的認識能力與宇宙相比是太小了。

在這種背景下根本就不存在「知識份子」，也不存在一個擁有「知識」的社會階層。知識是屬全人類的，也是人類共同認識的成果。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國家不可能獨斷知識。

論語中本無「知識份子」這個詞，只有「士」而無「知識份子」，據說：「首創「知識份子」這個詞的是「美辦知識份子」胡適，後來被中共利用，由「知識份子」造出一個「知識份子」階層，由「階層」而引出「階級」，搞出一個「知識階級」來。老毛嘴上說：「知識份子」不是一個「階級」，只是一個「階層」；也用「毛」和「皮」的關係來分析「知識份子」的「社會屬性」，指出「知識份子」是「毛」而不是「皮」，「知識份子」既可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也可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把繼承和傳播文化的人用「知識份子」緊箍咒這麼一套就搞出無數個「知識份子」的概念來。什麼「無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革命知識份子」、「反革命知識份子」、「工人階級知識份子」、「農民知識份子」、「工、農、兵知識份子」、「地主階級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買辦階級知識份子」、「富農階級知識份子」、「先進的知識份子」、「落後的知識份子」、「反動的知識份子」、「黃色下流的知識份子」、「流氓無產階級知識份子」……總之，在中共的政治詞典中，有數不清這種「知識份子」的帽子。「知識份子」就成為一切「專業人材」和「文化人」、「讀書人」頭上的緊箍咒。在中共的歷史政治運動中，「知識份子」就變成一個被打擊的「對象」。中共一旦出現內外交困的局面時就拿「知識份子」開刀；難關過後，又給「知識份子」平反，周而復始，惡性循環。中共治下的「知識份子」變成犧牲，往往成為權力鬭爭的受害者。大陸「知識份子」久經中共玩弄和摧殘之後，已

普遍對中共喪失了信心；大陸的專業人才，在中共的暴政下只能採取消極對抗。您也許發現這才是最可怕的「甘地精神」，所以一打倒「四人幫」，您就打了一張「知識份子」的牌，在「知識」和「科技」也是生產力的論斷下，把「知識份子」，「專業人才」也劃在「無產階級」之中。但您又在自設的矛盾中，認為：「在科學技術人員中也有一部份人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見《鄧選》90頁），您又不想徹底為「知識份子」平反了，還要把他們攔在手中。用「改造」的繩索繼續拴住「知識份子」，您被您自己的理論否定了。

試問「知識」和科技人員既是「生產力」，又何必來工人階級改造一說？科技人員既是「生產力」就表明已是「工人階級」，何有「工人階級」改造「工人階級」一說？

「改造」是「封建」社會的意識，是人治政治的產物。誰改造誰？權大的「改造」權小的？「權小」的「改造」無權的？黨的領導「改造」黨員，黨員「改造」非黨員，黨員「改造」工人，工人「改造」工程師，這就是「共產主義」的人的關係。

大陸的專業人才普遍已覺醒，中共十分害怕，因為中國的文化人有個特點，就是不到活不下去不造反，但一造起反來，也不會輕易收手。「知識份子」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些人不但有追求科學真理的精神；而且有一個科學頭腦；他們不但用科學解剖自然，而且也用科學解剖社會。中共懼怕科學，也經不起科學解剖。為此，您一方面要收買「知識份子」，一方面又不願放棄對「知識份子」的改造。這就使人們要問：您和毛澤東，周恩來算不算「知識份子」？

您口口聲聲說要重視「知識份子」。但在社會實際中又不重視。您把大批專業人才提拔到黨、政、軍各級「領導班子」裡，不但不能用其所學，用其所長，反而等於浪費人才。

因為政治也是一門科學，「政治學」最通俗的解釋就是「管理國家、人民」的科學。是「治國安邦」的科學，也是一種「做官」的科學。搞政治的人也是一種「專業人才」，您和目前的中共把大量的科技人才弄去搞政治、搞行政、去做官，搞他們不懂、不熟悉，又不願意的事，不是「外行」領導「內行」是什麼？不過這一次不是政工人員領導科技人員，而是科技人員領導「政委」了。依然是「外行」領導「內行」的局面，搞得科技人員不能搞科技，搞政治的又不能搞政治，越搞越亂，越「改」越邪。

搞政治的人，不搞政治，輕視政治，政權也就屈指可數了。

要想改變大陸「知識份子」的待遇，看來只有從改變社會制度入手。否則改來改去，「知識份子」總是不能用知識為社會服務，為人民造福，為國家謀利，「知識份子」的知識有何用。

應當看到，您比老毛在「知識份子」問題上有很大進步，您在《鄧選》中雖然堅持「反右是正確的」，但又把「大右派」林希翎放出海外。您在《鄧選》中狠批「苦戀」，但還沒逮捕白樺。如果看不到和不承認以上事實，證明我對您的批評不但不

公，而且是懷有敵意的「偏見」了。

神秘的「二中全會」

您剛在《鄧選》中說要「專心致意地，聚精會神地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見《鄧選》第705頁）竟又大張旗鼓的搞起「整黨」來。這種轉變如果是您自己搞的話，那麼您從前的許諾就變成了一種權宜之計的陰謀，如果不是您自己要把「專心致意地，聚精會神地」搞「整風」，那麼就說明您已無權控制中央，但這是不可能的，你至今仍牢牢把握着中央大權。

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終於在保密的情況下於十月十一日在北京召開，於十二日結束。歷時兩天，閃電閉幕。

會議舉行的如此之短。如此之密，如此之速，可以判定：這是一次「表決會」在會前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到時強行中委（後補中委）表決通過。實際上不允許，也不敢讓委員們進行「廣泛地，深入地」討論。「決策者」們不希望「討論」，只希望「表決」。這就是為這次「全會」蒙上了神秘的色彩，這也就進一步為世人通過「全會」而認識中共的政局提供了一條線索。

在「二中全會」召開前，大陸實行「紅色恐怖」，進行「大搜捕」、「大屠殺」，中共把「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踩在腳下，震驚世界。「中共中央」的瘋狂行為不但在大陸引起黨員的不滿，也使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目瞪口呆。黨員和各級黨委對中共中央目無法紀不但表示極大憤慨，而且打算在「中央全會」上與「中央」的「賭指揮」者「理論理論」。根據我得到的「情報」，「中共中央」本打算推選舉行這次會議，深怕在全會上「挑起大戰」，使「中央」發生分裂，但是「全會」以不提「議案」，只行「表決」的形式召開了，「決策者」們生怕「中央委員」們久留北京會「夜長夢多」，所以採用「閃電表決」的方式，使一切與會人員無法和沒有可能在會議期間進行「串連」和向大會提出任何「質疑」的時間和機會。反映出中共最高當局的神經已十分脆弱，和老毛晚年一樣，處在「中央」會發生「改變」的「假設生活」中。

是「整人」還是「整黨」？

「整黨」、「整風」、「整人」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但凡在中共大陸政權之下生活過的人都明白：在中共的「政治詞典」裏，「整黨」、「整風」、「整人」就是一回事。「整黨」應該是指整黨的機構、黨務、黨的領導。「整風」當然是指整「作風」、「作風」面很大，有思想作風、工作作風，還有什麼「男女作風」……不一而足。若提「整風」的話，本應實行「整風面前，人人平等」信條，不管什麼人。在黨內、在「整風」面前都要脫「褲子」！但這是不可能的，如此，我故意在中共未正式整黨（只是「試點」階段）已在本年八月十三日發出一篇「

整風權」就是黨權」的短文，警諭中共決策者，不可再犯過去「整黨」，「整風」的錯誤，不要「矛頭向下」，也不要「矛頭向上」。應該老老實實，有什麼問題，整什麼問題。但是大權在握的人是不聽良言的，果然在「二中全會」中，搞出一個「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我一看這個「委員會」就知道：中共這次整黨，既不是「整黨」也不是「整風」，而是「整人」。否則，為什麼在「中央」之內又產生出一個「中央」？

奇在，「決定」在結尾時「夜過收場吹口哨」（壯胆）說什麼：「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達到了全黨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保證了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這次整黨就一定能夠使我們黨更好地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去爭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勝利。」如果不是白痴，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政治家都不會作出這種荒唐可笑的類比。因為，中共當今的政局和一九四二年所處的歷史背景完全不同，當時，中共與國民黨實行「二次合作」，四面在國民黨的包圍之中；當時，雖然已是「一個中國，四個政權」：南京、延安、北滿、汪偽，（香港還不算在內），若算香港，中國實乃一個國家，五個政權了），但是，形勢逼得中共黨內部非團結不可，因為，他們是「四面楚歌」的局面。自己又不是「執政黨」，所以，中共無論怎樣「內鬪」都必須「抱成一團」。否則不能生存。中共唯一政策「支柱」是爭取群眾，把生存寄望在群眾的支持之上，「整風」雖然把張國燾整跑，把王實味整死把丁玲等人整「臭」。但是，延安整風，的確把黨內的各個「山頭」削平了，整得各個山頭的「山大王」們都認同毛澤東，整得各個「山頭」與「中央」保持一致了，「中央」在延安整風時已變成毛的代名詞。

延安整風前，中共沒有「黨主席」，只有「總書記」，當時總書記是張聞天——當時黨魁，但中共處在「軍事時期」，黨魁說話沒人聽，軍權就是黨權，所以毛澤東志在必得是軍權。整風前黨魁雖然是張聞天，但黨權、軍權早被老毛在邊會議議奪到手中。中共是「君非君，臣非臣」的政局，延安整風以後，中共政局走入軌道，實行「君是君，臣是臣」的格局。毛澤東正名，張聞天交權。

現在不同了，中共變成了執政黨，不再需要百姓了。「為所欲為」，把百姓視為草芥，「群眾」、「人民」成為「權力主義者」們手中的玩物。一張「牌」，打着「人民」、「群眾」的招牌爭名奪利。中共這次整黨的核心問題就是要「整人」，把一切與鄧、胡派持異議的人先從「中央」整出去，「殺雞警猴」，給省、地、縣各級黨委看。給黨外人士看。

「整黨」是假，「整人」是真。爭權奪利，排除異己，鞏固已到手的權力是真。

架空「中央」

香港公佈「二中全會」開幕——也即閉幕的消息後，接到不少友人來電話與我探討「二中全會」。大家均感到這次「二中全會」「抓不住要領」，我對他們說：要想知道這次「全會」，必須先從「中共中央整黨委員會」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抓住要領，我道破「全會」的陰謀是另立「中央」，表明

鄧胡集團不相信「中共中央」可以完成「整黨任務」——把全黨「整」到鄧的個人崇拜……道路上。所以才又成立了一個「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把「中央」架空了。「決定」在第七項中說：「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在「中央指導下工作」，請問：這個「中央」具體是指什麼？是指中共中央委員會？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因為中共目前有三個「中央」，中央表面上是一個，實際上有三個權力中心，權力最大的中央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另一個「中央」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他們自稱是手執「上方寶劍」的。還有一個傀儡「中央」，就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現在又搞出一個「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等於又成立了一個「中央」，而這個「中央」可以利用「整風」整其他三個「中央」，並在「整風」的過程中把其他三個「中央」（包括其中的人）都「吃掉」。最後很可能把胡耀邦都搞掉（因為胡是你用來殺人的一把刀子，整人得要罪人，收拾不了局面時，就把他拋出去，何況，你現在已把黨魁的「第三梯隊」也選好了。）——另換一個走卒，以平衡黨內各派系勢力。胡的下場可能比林彪還要慘。

這使人想起，「文革」時老毛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事。「文革小組」實際上把「中央」架空了，「文革」本來也是一次「整風」，結果弄得天下大亂。「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實際上也就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變種，「指導委員會」（下簡稱「指委會」）會不會變成「文革」的「文革小組」？那胡會不會利用「指委會」把政治局或中央任何反鄧的人「打下馬」？搞得「天怒人怨」？那就只有通過「整風」的實踐加以說明了。

按照正常情況來說，中央根本無須再成立一個「指委會」來「整黨」，因為「中紀委」的職權就是「整黨」，一直在搞「整黨」的工作。

延安「整黨」、「整風」也沒有另搞一個中央機構，這說明你對「中紀委」不能領導「整風」已大存疑心。「中紀委」會不會利用「整風」把你的大權給奪了？您放心不下，因為「中紀委」的「上方寶劍」是在「三中全會」拿到手的，昨天你聯合「中紀委」的頭子陳雲，用「上方寶劍」奪了華國鋒的權，今天會不會有人用同樣的手法奪自己的權呢？你顯然大起疑心，你一定要在「整黨」前先把「上方寶劍」搶到手，你創造了一個「指委會」，輕而易舉把「中紀委」的權奪了。

您是否已覺得不再須要借用陳雲的勢力？要通過「指委會」改變「鄧選」設計的鄧陳體制？這是一曲非常有趣的戲，序幕剛剛拉開，下面「指委會」會不會借整黨很整「中紀委」？因為在過去的一兩年內，「中紀委」把中共上上下下得罪了。人人都想利用「指委會」先把「中紀委」整一整。顯然「上方寶劍」已握在「指委會」手中了。

赫魯曉夫的重要貢獻是：他打着批判斯大林的大旗而小心翼翼地保住了斯大林路線，他是用犧牲領袖個人名義的手法保住了蘇共在蘇聯、民心中的基本形象。他的策略是保黨，保黨而不要黨的壞領袖，你與赫魯曉夫正好相反，你是打上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大旗徹底改變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你是要犧牲黨的形象而力保黨的領袖。「三信危機」由此而生。

「二中全会」你伙出胡耀邦，開始「垂簾聽政」，「十二大」後拋出《鄧選》，「二中全会」定下以《鄧選》整黨的基調。至此，已可看出你的政治路向，什麼「三項國策」？是一項國策嘛。這個「

國策」就是以《鄧選》來治國的「國策」。是「國策」中的「國策」。但是反對以《鄧選》作為治黨治國的人大有人在，比如：六月廿九日在《鄧選》出版的前一天，「中國新聞」在北京發了一則重要消息，據稱：楊尚昆在「天津視察部隊教育訓練」時「談軍中整黨提出三點意見，強調要和風細雨，不是誰整誰」，學習文件包括《陳雲文稿選編》和即將出版的《鄧小平文選》，楊尚昆顯然要用「陳鄧思想」聯合整黨而不是用你一個人的思想整黨。但你不願再唱二人轉要唱「黃天霸」了。「二中全会」無情地拋棄《陳選》，並重重地打了楊尚昆一記耳光。

「二中全会」後確立了以「鄧選」為圓心的政治軸心，你想建立一個鄧小平的時代，可能意不從心吧。

實踐是檢驗真假的唯一標準，讓我們通過中共的「整黨實踐」，來判別鄧胡集團到底是要通過「整人」達到從中央到地方建立鄧胡集團的陰謀，還是要通過「整黨」搞得天下大亂吧。

「決定」與反「決定」爭鬧激烈

中共「二中全会」剛剛開過、剛剛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下簡稱「決定」），剛剛宣佈「整黨」由「試點」轉入全面整黨，就上演了一曲「決定」與「反決定」的鬧爭。使中共的整黨一開始就陷入了危機。

「決定」說：「整黨的任務共四項：1.統一思想，2.整頓作風，3.加強紀律，4.純潔組織。」具體的「整頓目標」：1.反「三種人」（即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份子），2.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我讀過「決定」三、四遍，通篇找不出一句「要清理精神污染」的話。我在「決定」中甚至根本就找不出「精神污染」這四個字。但是中共整黨一開始就把「決定」拋開，提出「整黨」的另一個任務是要「清除精神污染」。

反「精神污染」與「二中全会」的精神顯然是「對着幹」的。我以一個記者的敏銳眼光和「特別的感覺」，感覺到這是「中共中央」高層鬧爭的一種表現。但我的認識是模糊不清的。只是一種感覺而已。我嗅出氣味不對頭，風向也變了，我立即注視「反精神污染」的一切動向。

我首先查閱報紙，想弄清「精神污染」這幾個字是怎麼提出來的、在什麼時候提出來的、在什麼場合提出來的？由什麼人提出來的？……如果把以上問題搞明白了，「中央鬧爭」的路向也就基本上看清了。

在查報的過程中，我首先發現的一個大問題是：「精神污染」這四個字是由鄧小平提出，但這種提法不是在發表「二中全会」公報時提出，而是在發表「公報」和「決定」之後數日發出來。

鄧小平關於「精神污染」的提法是在發表鄧小平在「二中全会」上「講話摘要」之中披露出來，中共報紙說：鄧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講話，着重提出所謂「精神污染」問題，要求共產黨的文化教育和理論工作者，「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用自已的文章、作品、教學、講演、表演，來教育和引導人民，……堅信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思想戰綫不能搞精神污染」，「當前思想戰綫首先要着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

我看到的只是摘要片斷，並非鄧的「全文」。引人注目之處是把「精神污染」當作「右」，而且

要反右。

「決定」要反左，要反「三種人」；但老鄧要反右，要反搞「精神污染」的人，什麼是「精神污染」他沒有講清，只是講了一個原則。老鄧與「二中全会」顯然是在唱反調，整黨一開始就發生了「大地震」。

緊跟鄧小平跑的是：彭真、李先念、王震、鄧力群。但是「其他人」不講話。

彭真在十月二十三日，對「民主黨派」人士說：「思想理論戰綫文藝戰綫這幾年……確有不少問題，存在着嚴重的精神污染，我們絕不能低估了精神污染的危害性。這也是關係到我們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大問題」。彭真也說不出什麼叫「精神污染」。

什麼是「精神污染」？既然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比「整黨」還首要，那麼黨、黨員、人民、群眾就要求首先說明什麼是「精神污染」，如果不確定「精神污染」的含義和表現，在清查、清理過程中，就無法制定一個「政策界綫」。

第一個出來解釋「精神污染」的是王震，他說：「在思想理論戰綫的隊伍里，確有少數同志在報刊上，在課堂上散佈了不少違反馬克思主義根本原理和四項原則的錯誤理論。錯誤觀點。如在社會主義問題上有人說，我國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或者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農業社會主義，還有人不斷宣傳「社會主義異化」論，說社會主義不僅有思想上的異化，而且還有政治上的異化，經濟上的異化，甚至有人說：「異化的根源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身。」這些觀點，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完全對立的，它的實質是散佈反對社會主義和對共產黨的不信任情緒。……」

王震把「精神污染」集中在「社會科學」方面，王震把「社會科學家」根據自己對「社會」的研究——科學研究——的結論說成是反馬列主義的「精神污染」。不管「社會科學家」對社會的科學的究是否得出科學結論——而「科學結論」就是「真理」——黨棍們把「科學結論」當作是反「馬列主義」的，是「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對共產黨的不信任情緒」。什麼是「科學」？在黨棍們的眼里，「馬列主義」就是「科學」，「社會科學」何言？「社會科學家」何言？馬列的話既是真理，還要「社會科學」做什麼？那不是純粹的「擺設」是什麼？

好在，這一次對反馬列的「社會科學家」不再扣「反馬列主義」的「帽子」，也下扣「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反黨」，而是表明了一頂「精神污染」的帽子。因為再提「反黨」、「反馬列」、「反社會主義」……等於告訴百姓，毛澤東又活了，「四人幫」又上台了。……

我早在今年六月十一日，在香港時報「文化與生活」發表過一篇「共產黨講科學嗎？」，我在該文中說：「科學家從研究科學的角度，得出科學結論，否定了馬、毛、共的主張，客觀上起到「反共」作用，這只能證明馬、毛、共本身的虛假，反科學、反真理。是共產黨反科學，而不是科學家要反對共產黨。是科學與反科學的鬧爭。」。不是擁護共產黨與「反對共產黨」的鬧爭。王震把「異化論」打成「精神污染」，再一次為我的論斷提供了證據。王震也許不知道，首先提出「異化」的不是別人，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本人。周揚、王若水等人不過是發展「馬列主義」而已。

「發展馬列主義」？在共產黨的哲學中，只有領袖——也就是教宗——才能「發展」馬列主義。其他任何人通過科學研究的「發展」都是非法的，

是篡改、是歪曲、是臆割。是「精神污染」。

王震的講話出來後，顯然引起大陸黨內外的不滿，但現在「不滿」也不敢講，因為人人都怕被安一個罪名當作「刑事犯」被拉出去槍斃了。鄧胡大屠殺的目的至此可下結論。「大屠殺的目的」是為了給「整黨」鋪路是壓制黨內外反對派的一種精神阻礙。

有意破壞「決定」的人抓住王震的話大做文章，越「左」越好，企圖把學術問題政治化，攪亂學術與政治的界綫，要打擊一大遍。

在什麼是「精神污染」都鬧不清楚的情況下，「混戰一場」，「決定」名存實亡，「整黨」讓位於「抓精神污染」，大陸又亂了。

什麼是「精神污染」就和什麼是「走資派」，什麼是「赫魯曉夫人物」一樣很難區分。鄧力群說：「精神污染可以分成幾大類。一種是屬於淫穢、野蠻、反動的東西；第二類是藝術表演中的一些低級的東西，不是給人以美的享受，而是給人以醜惡的形象；第三類就是追求個人享受、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等東西。第四類是在寫文章，講演時發表違背我國家社會的制度的言論，而我們的社會制度是在憲法中作了明確規定的。」

鄧力群不知是奉了誰的命出來解釋什麼是「精神污染」，提出「四類份子」，並把第一類當作敵我矛盾，鄧力群的原語是：「第一類是觸犯刑律的問題，必須取締，而其他三類都是思想問題，只能用教育，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鄧力群不但把「精神污染」具體化為「四類」，而且劃出了「四類之間的「政策界綫」。

鄧力群的講話受到世界輿論廣泛注意。

但奇上加奇的是：鄧力群剛剛對世界發表了什麼是「精神污染」，如何區別「精神污染」，並如何處理，照顧高「四類」「精神污染」的人之後，中共又急忙讓詩人艾青，作家鄧友梅、王蒙等人出面，於十一月四日在「全國記協」主辦的「中外記者見面」時立即否認周揚受批判，只說周揚受到「批評」。

艾青說「反對精神污染」並非要搞「二次文革」。

法新社記者十一月四日從北京發出消息說：「中共今天保證，不會把搞「精神污染」的人，同經濟犯罪份子和刑事犯罪份子相提並論。這顯然與鄧力群對美聯社的「講話」不同，「法新社」與「美聯社」幹起來。

值得重視的是：北平「人民日報」在四日頭版發表文章說：「精神污染雖然嚴重，但搞這類文章的人終究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罪犯」。文章特別指出：決不能站在左的立場，無限制地扯到政治上頭，也不能將搞「精神污染」的人與「罪犯」混為一談。

這不但否定了和糾正了鄧力群十月二十八日回答美聯社北京分社社長格雷厄姆的講話，而且重重打了鄧力群一記耳光。並暗示：鄧力群的所作所為是一種「左」的行為——你反「右」，老子就反「左」。至此鬧爭不但公開化，而且白熱化。

第一個問題是：鄧力群的「鄧四類」是怎麼出籠的呢？鄧力群宣佈「鄧四類」是直接通過美國人的嘴講出來的，那麼是否可以這麼說：鄧力群的講話事先與「共書記」商討過？抑或與老鄧的「顧問委員會」討論過？但又不像，因為據世界輿論認為鄧力群是老鄧的「文胆」，如果鄧力群是老鄧的「文胆」，怎麼會招到這樣的「圍攻」？是誰有力量組織黨內的另一幫力量反鄧？

第二個問題是：鄧力群根本不受鄧、胡之命

發佈「鄧四類」的。發佈後被鄧、胡發現，認為是「左」的產物。那麼鄧力群又是秉承誰的旨意向美聯社發話？

妙到不可再妙的是：「精神污染」本是「右」反「精神污染」就是反「右」，但被鄧力群搞了一個「四類」就把反「右」變成了反「左」。因為鄧力群要把「淫穢、野蠻、反動」搞成「刑事罪」，而這是「人民日報」反對並制止的。這麼說來，又要整「中宣部」了。前兩天的政治風向好像是中共中央要整「文化部」，因為「文化部」有朱牧之出來檢討，承認自己在清除「文化部」的「精神污染」方面落了後，但「人民日報」餘芒一轉，一條伙把刀尖對準了「中宣部」，鄧力群自己也難過關了。

要命的是，「人民日報」在四日文章中說：「最重要的政治保證」，是鄧小平去年在中共「十二大」中提出的四項工作：即「機構改革，和經濟改革，建立社會主義文明，打擊經濟犯罪，整頓黨的作風和組織。」根本就沒提「清除精神污染」。

現在已經出現了三種曲調：1.要以「二中全会」的「決定」整黨整黨，2.要以鄧在「十二大」提出的「四項工作」為整黨根據，3.要以鄧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講話」精神整黨。三種人都打着鄧的旗幟，似乎都有理。

這種情況很像毛澤東搞「文革」時的情況，黨內、中央各派系都打着他的旗幟。怎麼辦？反「左」還是反「右」？依靠那些人反「左」？又依靠什麼人反「右」？「人民日報」把鄧力群這麼不提名的一批判，「鄧四類」是不是又被否決了？否決了「鄧四類」，等於又回到起點。什麼是「精神污染」呢？又成了一個疑問，一個空白。鄧力群解釋了一頓，弄了一頭污水，誰還敢出來解釋什麼是「精神污染」？

人們的視野都集中在「精神污染」以及因「精神污染」而招出的事端方面來。早忘了「決定」中要清除的「三種人」了。

反右，反精神污染顯然不得人心，一開始就必須打擊一大遍搞得人心惶惶。「精神污染」是個沒有既定確實含義的詞，怎麼確定「污染」呀？誰污染誰呀？「解放思想」弄出「三信危機」不是「污染」是什麼？提倡「民主法制」煽動「無法無天」，不是「污染」是什麼？「兩個凡是」、「污染」，難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是「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顯然缺乏「科學性」，這種語言頗似毛澤東當年發動「文革」用的語言：容易把人民群眾和黨員帶到與黨「捉迷藏」的險境裡去。比如：「你們要到風大浪中去游泳你們要經風雨、見世面」；「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似的人物抓出來。」「天呀，什麼是「赫魯曉夫似的人物」？「我們」是指「我」還是「我和江青」？「我」又是什麼？中南海算不算身邊？是不是暗示要把中南海裡的幹部通通都揪出來打成赫魯曉夫似的人物？這不是「猜迷底」是什麼？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年輕的人，忠心熱愛毛、熱愛中共的「勇敢分子」們就開始壯着膽子在毛的身邊「試」着揪了揪，越揪越壯，揪出劉、鄧、陶、揪出王、關、戚，揪出楊、余，最後揪林彪，揪江青、連老毛也給揪出來了。

揪「精神污染」就和揪「睡在中央身邊的赫魯曉夫似的人物」一樣，是在作詩作文章，玩「灯谜」，根本就不是一個法制和民主國家應有的政治生

活，這種愚弄群眾、愚弄黨的政治行為：是對民主和法律的嘲弄和踐踏，完全是一種封建帝王的行為。

使人難以理解的是：鄧小平的主張，為什麼在「二中全会」通不過？在「決定」中寫不出？逼得老鄧只能利用講話的機會把清除「精神污染」講出？為何老鄧硬逼着中央幹部首先對他的這一無理主張表態呢？好像：整黨必先整「精神污染」一樣。老鄧與中共「二中全会」的「決定」鬥爭的結果，不看出於什麼理由，都大大有利「文革」中「三種人」；這也許激怒了堅持「決定」的人，下決心公審「文革」大將戚本禹，遲群等人。

顯然：「三種人」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和「精神污染」的提出者及追隨者已經首先在整黨一開始就撕破臉，由密開發展到公開開。到底是什麼原因？什麼背景？是老鄧在「二中全会」吃了敗仗，出於為自己爭面子，硬要和不聽他話的中央委員們賭氣一鬧？還是中共要通過整黨進行另一次權力分配？現在還很難推斷。

不過我指出許多別人深思的現象和蛛絲馬跡。是「三種人」鬧倒「精神污染」？還是「精神污染」鬧倒「三種人」？且看事態的發展。

寫在最後

政治是不講情面的。我相信您下令逮捕我和下令放我，都不是出於私人情面，而是出於一種「政治需要」，那麼我昨天對您的贊美和今天對您的揭露也不是出於私人情面，而是基於政治事實。

我曾在香港「南北」雜誌第八十期和八十七期最美好的詞句來贊美您。盼望您能收拾大陸殘局。我曾說您是一個「沒有野心，光的磊落」的人。但我在本文中通過事實把我自己的贊美否定了。我不是貝多芬，但是我把我心中的《英雄交響樂》撕掉了！我好像自己強姦了自己！

崇拜個人和個人崇拜是概念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我從來不反對崇拜個人，因為：每個人必須有自己心中的英雄。崇拜個人是屬於「人權」的範疇。你願意崇拜一個妓女（茶花女），我願崇拜寶玉；你願崇拜毛澤東，我願崇拜孫中山，這完全是個人的自由。一個人如果沒有心中崇拜的對象，他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古人也搞崇拜。「圖騰崇拜」就是最好的說明。古人崇拜野獸崇拜自然，把野獸和自然力當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崇拜個人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是一件好事。但是「個人崇拜」是「自戀狂」，是精神病。「個人崇拜」是「自己崇拜自己」，並要強迫別人也崇拜自己，這種人不一定不是國家領袖，在一個馬戲班裡，「大明星」也會產生這種精神病。黑社會頭子也會搞個人崇拜；從「病理學」的角度來說：個人崇拜是一種精神病，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個人崇拜」是一種封建帝王思想。他自己把自已當作神，而且也要別人把他當作神供奉！

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都這麼搞，您在打倒「四人幫」總結歷史經驗時也深惡痛絕的反對「造神運動」，但是可能的您大權到手後也落入「個人崇拜」的泥坑。《鄧選》就是您向「個人崇拜」泥坑邁出的一大步。

世界已進入「科學革命」反對「非科學革命」的時代，用「階級鬥爭」的這種非科學的眼鏡已不

能解釋，反映當今的社會矛盾。

馬列主義是封建宗教的變種。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在「專政」的名義下，實行真正的「階級壓迫」，最大的政治特色就是在「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恢復封建的君主政體，君主立憲；君權就是法權，君權與神權結合，把馬列主義變成宗教，馬列就成為共產黨供奉的「神」。您是因為反「個人崇拜」、「反「造神」而贏得人民的擁護登上共產黨的最高權力寶座的。但是，您一上台之後，馬上變成另一個人，您也搞起個人崇拜和「造神」來。這就說明：「個人崇拜」和「造神」絕不是領袖個人品質、修養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必然產物。共產黨的最高權力寶座是一個魔座，誰坐上這個位子誰都逃不出變魔鬼的惡運。我方丹坐上去，也一樣如此——別看我現在寫文章時這麼清醒。歷史一再說明：無論是赫魯曉夫還是你，都不能擺脫共產主義制度的法術。任何人，只要一登上共產黨的最高權力寶座，他就會立即變成自己的敵人。赫魯曉夫以反對「個人崇拜」而登上「個人崇拜」的寶座，你也不能倖免。這不是主義或社會制度造成的悲劇是什麼？朝鮮竟然要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公然上演一曲「傳位的丑劇，而又竟然得到你的支持，這種事再次的教育了世界人民。讓大家看清了「共產主義」到底要幹什麼？其本質又是什麼？共產黨的封建面目都在這個「共產國際」的表現中暴露無遺了。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馬列主義要用「計劃經濟」代替供求經濟和自然消長的自由經濟，馬克斯在反對資本主義經濟時，無法擊破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鐵律，他別出心裁的把封建的「宗法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相提並論。應該承認馬克斯無情地剖析了封建「宗法經濟」。他是一個「爆破手」，把「封建經濟」論批垮。把資本主義經濟批臭（並

未批垮），但用什麼方法取而代之。作為「共產主義」理想的物質基礎呢？他提出「計劃經濟」。在「計劃」的原則下把一切生產資料，生產工具都收歸公有。這裏又出現了一個問題，「計劃」由誰「計劃」？答曰：「由集體計劃」——由「集體計劃」等於沒有計劃，因為任何計劃都不可能在全體紛紜中制定。只能集思廣益。您也許會把我的話接過去說：「不錯，我們的計劃經濟正是集思廣議的經濟」，但是所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中生活過的蘇俄人、中國大陸人、北韓人、越南人、古巴人、東德人都明白「公有的計劃經濟」就是奴隸制經濟的變種。任何經濟計劃都是由君主的意志制定的；「計劃經濟」就是「宗法經濟」的變種，黨魁一句話可以在沙堆上建一個鋼廠，又一句話可以叫全國大煉鋼；前任黨魁搞「公社」，後起的黨魁用「責任田」取而代之；全是人為的，違反客觀，違反經濟規律的「宗法行為」。

糧票、布票的存在不但反映生產低下，生活貧苦，而且就是「宗法經濟」的注腳。「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產生，不但證明農民像農奴一樣，一出生就被永遠附着在土地上，失去了自由，而且注定是祖祖輩輩務農的命運。農民千方百計要把農村戶口改成城市戶口，演出多少人間悲劇。家在農村的幹部千方百計要改變自己親眷的命運，但都被「二中全會」的「決定」倒入「不正之風」內，作為一個清黨內容。是社會制度錯了，還是黨員群眾要改變「社會地位」的行為錯了？在日本，在臺灣，你想當農民還當不成哩。世上有多少國家還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實行真正的「農奴制」呢？

農民根本無遷移自由，這比封建社會還殘酷。在這種社會制度下會產生什麼人，會有什麼人生活，不是很值得「龍的傳人們」為「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和競爭着想嗎？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同是「龍的傳人」，台灣的「龍」、香港的「龍」、新加坡的「龍」就能把台、港、新建成世界先進城市、先進地區？是台、港、新的龍比大陸的龍聰明，還是大陸的龍都變了種，從龍變成蛇了？是社會制度把人變了，還是人把社會制度變了？是共產主義更適合中國還是三民主義？還是什麼別的主義？台灣和大陸的經驗是應該作出結論的時候了。

科學必然要戰勝愚昧，過去宗教殘酷鎮壓了正為信宗教而又用科學反對宗教教義的忠誠教徒，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鮮血畢竟沒有白流。科學的發展，逼得宗教也披上了科學的外衣，出現了「基督教科學宣言書」，科學和人類文明的發展，必將撕下馬列主義反科學的偽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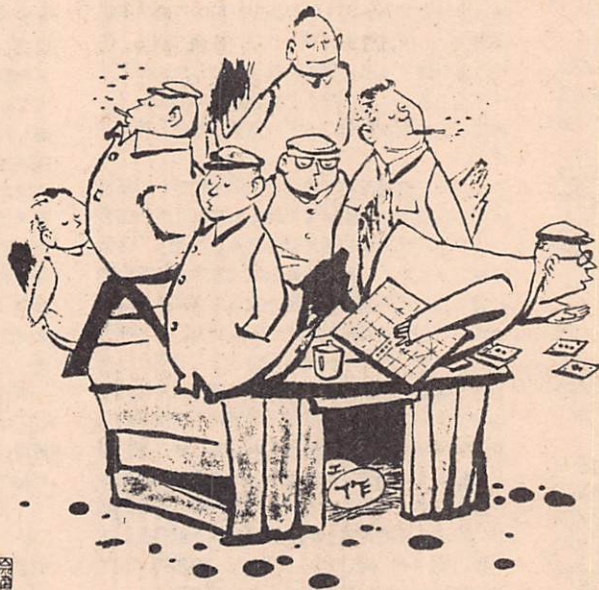
人類是靠勞動靠科學生存發展的，人類不是靠主義生存的，「主義」是為人的生存而存在着。如果要人為主義而生存，主義早就死亡了，早就失去了生命力。因為主義是手段，主義不是目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生存生活；在生存和生活的面前，人的一切行為都是手段，包括科學在內（不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

在科學面前人人平等；科學就是真理——所以在科學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就是我再次向您致信的基本思想。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毛澤東這句話永遠是「真理」。

文章寫到這裏，您也許會問我：「君子蘭還在嗎？」我响亮地告訴您：「君子蘭還在，不過已經很久沒有澆水了！」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九日初稿
十月廿四日改於
香港丹鶴樓 燈下
十一月六日再修定



光占窩不抱窩 徐進(北京)

旅美雜感

· 王魯生 ·

香港何其倒運

最近大陸正在推行防止精神污染運動，中共當政者說這些污染全來自香港及外國。除了其他倒運事以外，香港忽然又變成了精神污染根源，不知香港人聽來有何感想。

筆者不住在香港，所以不必替香港辯護，但中共慣會把罪名往別人身上推，實在是不負責的表現。

大陸同胞那麼易於受精神污染，可說是中共制度的失敗。從建國以來中共就要打倒小資產階級思想，却一直沒能打倒。相反的，人民一有機會就更想過浮華的小資產階級生活。

筆者也知道資本主義的社會有其污濁的一面，但也知道人性都是喜歡享受的。中共如不因勢利導而僅壓制人民的慾望，其防止精神污染運動絕對不會成功。

吃裡扒外要不得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美國華文報紙上報導說「南加州台灣人後援會」宣稱他們要檢舉拿有美國國籍的台灣官員，公佈他們的名字，並向美國政府控告他們。

台灣承認雙重國籍可能是政治及經濟原因。但有些人却藉此機會吃裡扒外實在太黑心。這些吃裡扒外的人很多可能是政府重要官員或有裙帶關係的人。我們希望這些人自動辭職，替自己保持一點面子。

我們不反對有美國國籍的人回台灣做生意或教書，或從事其他自由職業，但如擔任政府官員則令人非常懷疑他們到底是向哪一國盡忠？

追求自由絕非變節，中報不可顛倒黑白

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中報有一篇社論（該文又經中報月刊轉載），社論中把駕機投奔台灣的駕駛稱為變節求榮，實是黑白顛倒，是非不清。

站在中立的立場說，我們希望中共及國民黨在為人民服務上，在民主自由上努力競爭，也希望中國人扶老携幼地向好的一方投奔，這就是中國聖人所說的「近悅遠來」的境界。行仁政的一方就獲得民心。

中報社論作者假如睜開眼睛看一看，就知道一群群的大陸中國人冒生命危險向香港、美國，及其他國家投奔，難道這些人都是變節求榮嗎？他們到國外來可能連飯都沒得吃，有什麼榮可求？

中共的飛行員到台灣，不能以獎金來作為求財的根據，中報更不可一竿子打倒所有的人。

筆者非常中立，在此歡迎所有受不了一方痛苦的人奮勇逃向另外一方。

請出錢出力，幫吳仙標競選

華裔美人吳仙標先生出來競選德拉瓦州副州長，可說是中國人的一大光榮。洋人經常批評中國人不熱心政治及不團結，實在是中國人的恥辱。希望旅美華人群策群力幫吳仙標先生競選，以雪前耻。其實，不問是華裔人士或外國人，只要他們答應替華人謀福利，我們都應該大力支持。

美國是個民主法治社會，如大家不熱心參政，華裔人士便永遠顯示不出自己的政治力量來。



ROBERT SULLIVAN

沙利文之死

殺人犯沙利文 (Robert Sullivan) 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終於坐上電椅，離開了人間。

這是美國的一件大新聞，二十年來他是佛羅里達州第一個被處死刑的犯人。

對我們中國人說，沙利文之死有三種意義。第一，它證明人類的惡性太大，死刑仍然需要。聯邦最高法院雖於一九七二年廢除了死刑，但近來民心轉變，最高法院受迫於民意，只好又恢復了死刑。

第二，沙利文案證明美國仍然愛護小老百姓的性命，沙利文被判死刑後律師一直不停上訴，試盡了所有法律途徑，在獄中拖了十年之久才坐上電椅。不像中國的統治者一樣，經常草菅人命，抓到即便輕率加以處置，從不重視法律程序及人權。

第三，在執行死刑的當天，州長辦公室外圍滿了遊行抗議，搖旗吶喊的人群，州長雖堅不讓步，但也沒下令逮捕這些口出惡言的示威人。這就是外國人所說的：「我雖不贊成你說的話，但却拚命擁護你說話的自由」。這一點實在值得中國當政者學習。

何不以選舉代替整風？

中共最近開始了為期三年的整黨整風運動，對象是四千萬中共黨員。

大多數中共黨員心中都反對這次整黨整風，但筆者却非常擁護。因為當政的中共黨員品質已低劣透頂，實在應該大加整頓。如果中共真能把壞的共產黨員全部整光，中國一定會進入太平盛世。

中共所以必須整黨整風是因為黨員貪污枉法，政治腐化。但站在旁觀的立場來說，整黨整風雖是

一種辦法，但却不是最好的辦法。

我們知道中共行政方面最大的缺點是沒有公平合理的權力轉移制度。官員們一上台便抓緊權位不放，各階層便無法進行新陳代謝作用。這就像一潭死水，不久就會腐爛發臭。補救此一缺點的最好方法就是還政於民，讓人民選舉官員。

藉着選舉，人民便可淘汰不成器的官員，並讓有才能的人們脫穎而出。選舉可說是最公平合理而又民主的政權轉移方式，較中共的整黨整風不知高明多少倍。

「擇善固執」是中國人的美德之一，死抱殘缺腐爛的東西不放則是愚蠢行爲，中共何必加反省？

編者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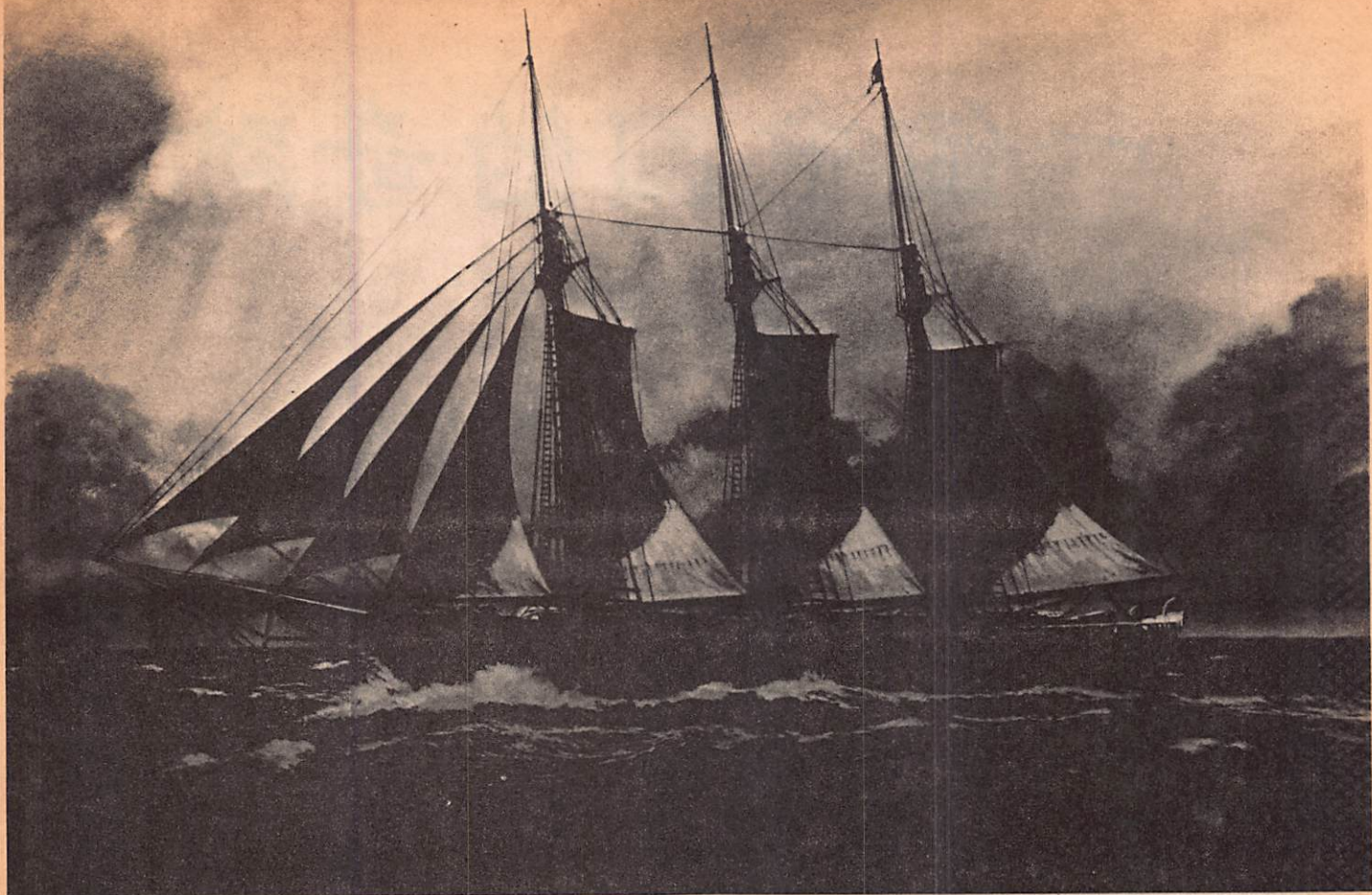
此漫畫原載 1983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報」第 8 版，目前國內的反精神污染運動轉向，領導人紛紛安撫外國輿論和國內知識份子，強辦「反污」的政策界限。請看這幅登在政策喉舌報上的漫畫，矛頭指向什麼？不是很清楚嗎？知識份子和海外學人，看了之後，哪能不寒心呢？

雙手贊成

五體投地



兼愛 英韜



我夢見海上有一艘大船

寄卷

我夢見海上有一艘大船
船上張着一塊
沐過百年風雨的帆
帆上依稀可辨一條
五彩花紋的錦繡的巨龍
龍身上佈滿了
大大小小的破孔
破孔在夕陽裡
一幌一幌的
似天上一閃一閃的
星星

我夢見海上有一艘大船
船裡有一個
盛着血的艙
艙裡擠滿了許多
肥矮高瘦都一樣的人
人都有一張
青色的臉
臉上有一隻眼
三隻耳朵
沒有口
鼻子在急促地呼吸着
空氣中的氧氣
一搨一搨的
像掀離了水面的
魚兒

我夢見海上有一艘大船
船頭安置着一個
銹蝕了的金造的舵
舵一會兒以順時針的方向轉動
一會兒是逆時針的方向轉動
船遂在此岸與彼岸中間的
海上
旋轉顛簸
任一個個飛濺的浪
越它前去
拍在溫暖的岸上歇息

八一、十二、十七 巴黎

一個中國的奇跡

張弄潮

誰叫妳是一塊鋼
一塊剛剛烈烈的鋼，擠在
栽滿着柳的園圃

誰叫妳是一股泉
一股清清白白的泉，淌到
屯積着泥的渠溝

誰叫妳是一隻雄雞
一隻高高傲傲的雄雞，生在
飛舞着魔鬼的黑夜

誰叫妳是一個晴雨表
一個正正直直的晴雨表，掛在
刮打着風雪的窗外

要嗎妳曲爲柳
要嗎妳污爲泥
要嗎妳在黑夜叫
要嗎妳在窗外掉

可是妳，妳寧願死，寧願死
也要保存着自己的
心的剛烈
質的清白
志的高傲
言的正直

假使有來生，妳還是
不作瓦來全
寧爲玉來碎

妳能活着固是個奇跡
其實，妳何嘗不是一個
勇敢的中國奇跡

八三、九 廿五

姓名：英文

中文

NAME

地址：

ADDRESS

零售：每本 \$ 1.5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 9.00

學生訂戶：\$ 7.00

贊助訂戶：\$ 30.00 以上

學校機構：\$ 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航空：\$ 12.00

平郵：\$ 4.80

支票請寄：CHINA SPRING

（美國）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CHINA SPRING'S FIRST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ScheduleDay I: Tuesday, Dec. 27.

Moderator: Jia Feng Liang Wei-shi

(p.m.)
1:00 Opening Address Wong Ming

1:10 One minute's silence for our fallen or imprisoned friends.

1:10-1:30 Guest Speaker Ralph Schoenman
-Director of American Workers Artists for Solidarity.

1:30-2:30 Progress Report: A Year in Summary Wang Bing-zhang

2:30-4:30 Small group discussion on the Progress Report.

4:30-6:30 Presentation by the small group leaders re. Progress Report.

6:30-7:50 Dinner.

7:50-8:00 Reading of letter from Lin Xi-ling.

8:00-8:20 Hong Kong Work Report Feng Bing

8:20-8:40 Japan Work Report Yao Yue-quin

8:40-9:40 Open discussion; the past year's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Day II: Wednesday, Dec. 28.

Moderators: Wu Jian-xian, Lin An-di.

1:00-1:20 Guest Speaker Victor Sawicki
-author, and Founder of The Polish-American Artists Ass.
in USA.

1:20-1:40 Guest Speaker Quei Jun Fei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Society.

1:40-2:40 Repor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Jia Feng

2:40-3:00 Presentation of the China Spring's Manifesto (draft). Liang Dong

3:00-5:00 Small group discussion ^{on} the Situation Report and the draft
Manifesto.

5:00-6:30 Group comments on the Situation Report and the draft Manifesto.

6:30-8:00 Dinner

Day II: Wednesday, Dec. 28. -cont'd.

8:00-8:15 Presentation of the draft of the China Spring Democratic
League's Constitution. Wang Bing-zhang

8:15-9:30 Small group discussion 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Comments on the draft Constitution to be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iat.

Day III: Thursday, Dec. 29.

Moderators: Jin Ling, Sha Lin.

(a.m.)
11:00-11:15 Guest Speaker. Eric Chebali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

11:00-1:00 Open discussion on the Constitution (draft) and amendments.

1:00-1:20 Lunch.

1:20-3:20 Small group discussion on future course of actions and duties;
-emphasizing work in China.

3:20-5:00 Group leaders report on preceding discussion, -followed by
open discussion.

5:00-6:30 Dinner.

6:30-8:00 Adopting the Constitution.

Day IV: Friday, Dec. 30.

Moderators: Lan Jian, Yao Yue-qian.

(a.m.)
11:00-11:15 Guest Speaker. James Seymour
-Director of "Spearhead".

11:15-11:45 Reading of letters from delegates in absentia. Jin Ling

11:45-12:00 Presentation of election procedure.

12:00-2:00 Election of officers.

2:00-2:05 Adopting the China Spring's first International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Manifesto.

2:05-2:15 Letter to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China. Jin Ling

2:15-2:30 Closing Address. Elected Officers

Day IV: Friday, Dec. 30. -cont'd.

2:30-2:50 Break -delegates who do not wish to meet journalists may leave.

2:50-6:00 Press Conference.

AN OPEN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ZHAO ZI-YA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 9, 1984

Dear Prime Minister Zhao:

We extend to you our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upon your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sincerely hope that your visit will further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s and that your visit will set the stage for other beginnings.

Since its inception more than a year ago, the China Spring Democratic Movement has received overwhelming support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From Dec.27 to Dec.30, 1983, China Spring Chapter representatives from Europe, Asia, Australia, and America, many of them students and scholar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et in New York City and brought China's democratic movement to a new height by formalizing the dissident group,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The principal objects of the Alliance a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that rules China by law, and greater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s most of the leaders of the Alliance ar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recognize and praise the economic progresses that have resulted from your administration's pragmatic policies. To lead China onto the road of true prosperity and strength, however, the present totalitarian system must undergo fundamental change.

In view of our common desire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China, we ask you to give the following your fullest consideration and assist us in realizing them.

1. That as the Freedom of Association is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be recognized by your government and be allowed to operate freely in China;

2. That as the Freedom of Publication is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SPRING magazine be allowed to publish, and to be distributed in China; and

3. That as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aforesaid Freedoms are all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be released immediately.

Prime Minister Zhao, while all of our activities are constitutionally sanctioned, we are reluctant to return to our homeland for fear of persecution. We thus ask you to assist us to obta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ull recognition of our group, the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our our publication, the CHINA SPRING. We urge you to consider the truth of these statements, to consider our offers, and to take the one path that promises a future of hope, prosperity, and greatness for our beloved homeland.

Sincerely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Signature of

中國之春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圖片集



1. 中國人權協會主席闕君飛

2. (國際反極權聯盟) 代表 Olga Svintsova

3. 美國亞洲人權協會主席

James Seymour (司馬晉)

4. 年紀最大的代表卜友書教授 (美)

封底：大會第二會場

通訊處：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 BULK RATE ==
== U.S. POSTAGE ==
== PAID ==
== NEW YORK, NY ==
== PERMIT NO. 355 ==

電話：(212) 728-7008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主編：汪岷

定價(零售) 美國： 1.50 美元 加拿大： 2.00 加元 香港： 4.00 港元

